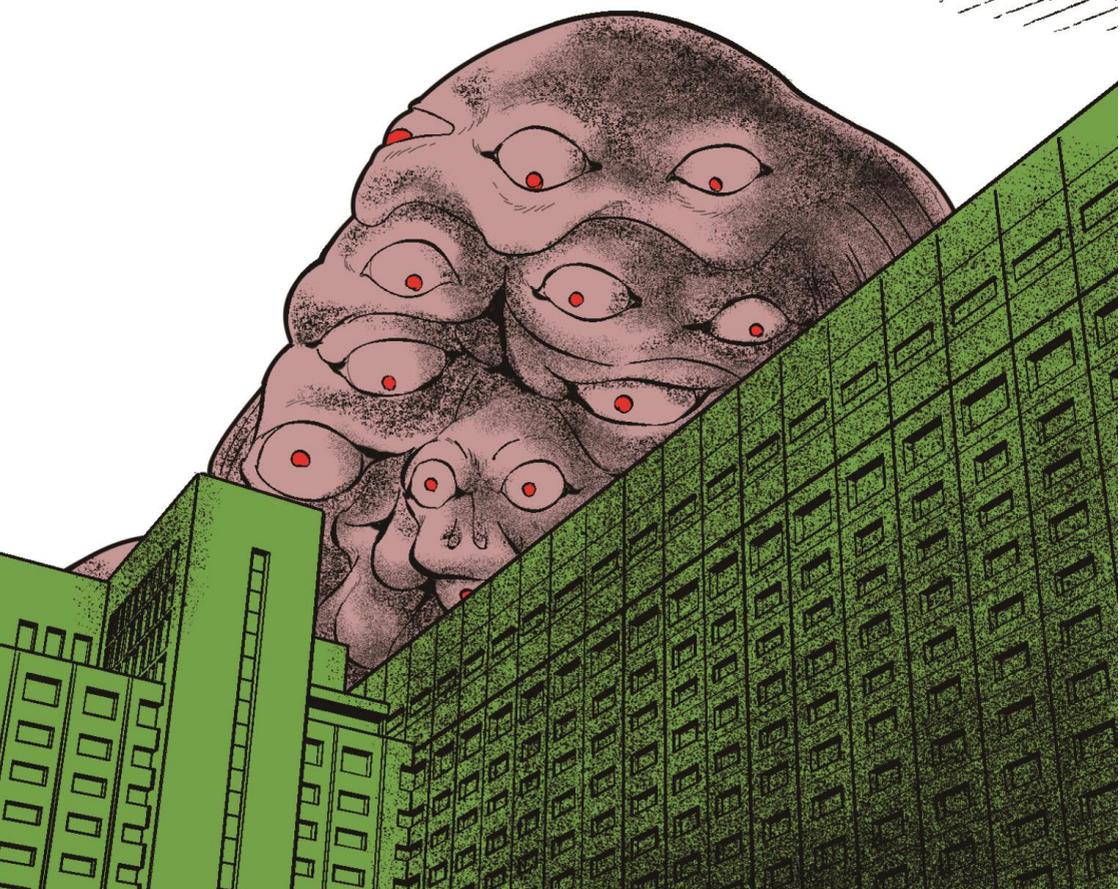


# 既非先知也非孤儿 《尾注》选诗

第一卷：核心理论







既非先知也非孤儿  
《尾注》选译

I

Neither Prophets nor Orphans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Endnotes*

# 目 录

## 第一卷：核心理论

代序：访谈（2024）

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2010）

贫苦与债务：

    论过剩人口与过剩资本的逻辑与历史（2010）

性别的逻辑：

    领域的分离与贱斥的过程（2013）

盘旋待降：

    当前的危机与 2011—2013 年的阶级斗争（2013）

## 第二卷：一部分离的历史

工人运动的崛起与衰落，1883—1982（2015）

### 第三卷：碎片与剪影

布朗诉弗格森案：

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简史（2015）

家庭会被消灭吗？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家庭观念变迁（2019）

前进吧，野蛮人！

全球抗争与我们时代的“非运动”（2020）

世界公社的剪影（2019）

附录：共产化术语简介（2024）



插画：Inko Ai Takita

# 第一卷：核心理论

## 代序：访谈（2024）

一、起源 .....	6
二、《尾注》第 1 期： 二十世纪得失明细的初步材料 .....	13
三、《尾注》第 2 期：贫苦与价值形式 .....	16
四、《尾注》第 3 期： 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不幸 .....	22
五、《尾注》第 4 期：分离的统一 .....	36
六、《尾注》第 5 期：激情与利益 .....	48
七、《前进吧，野蛮人！》 .....	52
八、下一步怎么走？ .....	55
注释 .....	64

## 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2010）

引子 .....	81
共同背景 .....	85
共产化 .....	87
德国争论 .....	96
不完整的马克思？ .....	105
价值理论的（反）政治 .....	111
回归马克思？ .....	113
注释 .....	127

## 贫苦与债务

### 论过剩人口与过剩资本的逻辑与历史（2010）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	147
再生产的危机 .....	154

从再工业化到去工业化 .....	159
去工业化之下的人口:服务业与贫民窟 .....	164
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	169
.....那中国呢? .....	175
结论 .....	177
注释 .....	180

## 性别的逻辑

### 领域的分离与贱斥的过程(2013)

一、生产 / 再生产 .....	192
二、有偿 / 无偿 .....	202
三、公共 / 私人 .....	207
四、性 / 性别 .....	217
五、资本主义的性别史 .....	221
注释 .....	232

## 盘旋待降

### 当前的危机与 2011-2013 年的阶级斗争（2013）

一、广场运动 .....	246
二、高度逐渐下降的盘旋待降 .....	252
三、社会问题的回归 .....	265
四、摆脱腐败的束缚 .....	273
五、构成问题 .....	282
六、结论：不归路 .....	291
注释 .....	295

# 代序：访谈

Introduction: An Interview

2024



本文选共三卷，汇编了英文共产主义刊物《尾注》(Endnotes) 中核心文章的译文。我们的目的，是要向中文读者介绍我们认为是自 20 世纪末以来有关当代全球社会趋势和民众斗争非常有洞察力的理论探索。这些作品的宗旨在于寻找如何能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相关的各种压迫性制度，实现“一切归于大家”的共产主义世界<sup>[1]</sup>，在其中所有人都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与非分类生态的“社会新陈代谢”能得到可持续的重组<sup>[2]</sup>。尽管自 2010 年代以来，《尾注》和与其有关的团体在欧美的激进左翼中影响广泛，其中的一小部分文章也曾有中译版在网上发表，但他们的政治讨论方法和整体视野在华语世界仍然几乎是未知的。甚至这些作者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在中国语境中也可能导致误解，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在保持开放的心态通读之前，暂时放下对这些词汇含义从高中“思想政治”课本那里得到的想象。

2024 年 2 月，我们对《尾注》的两位成员进行采访，

询问了该刊物及其研讨小组的历史、介入无产阶级抗争和左翼辩论的背景，和对我们选译的文章的澄清，用以当作这本文选的导言。为了提高可读性，我们对访谈录进行了修饰，并增加了脚注。作为背景资料，我们应该先来看看这个小组的自我介绍：

《尾注》是由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个讨论小组出版的期刊/书籍系列。小组最初于 2005 年在英国布莱顿成立，主要由《扬弃》(Aufheben) 杂志的前参与者组成，这发生在《扬弃》与法国杂志《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 的一次批判性交流之后。随着迁徙和新成员的加入，我们小组已日益国际化。《尾注》主要致力于从当前条件出发，构思共产主义如何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之为特征的社会的多重统治结构——的可能性条件。因此，我们一直关注“共产主义理论”领域的争论，特别是 1968 年**五月风暴**后法国**极左派**提出的“**共产化**”问题<sup>[3]</sup>；性别问题和**性别消灭**的问题<sup>[4]</sup>；当代斗争、运动和政治经济的分析；**过剩人口**的动态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sup>[5]</sup>；“**种族**”的资本主义形态<sup>[6]</sup>；**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sup>[7]</sup>；二十世纪革命的失败和僵局<sup>[8]</sup>。

我们的访谈是以他们之前参与《扬弃》的回忆开始的。后者是由1990年代初英国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一个读书小组，1992年创办了同名杂志。因此，我们先引用一下《扬弃》的自我介绍也可以提供有用的背景：

影响我们的思潮包括意大利1969-1977年的**自主运动、情境主义国际**，以及其他以马克思著作作为出发点、把共产主义事业从各种列宁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教条解放出来，并以之用来反射阶级斗争现状的其他人。我们也认可“阶级斗争安那其”<sup>[9]</sup>、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左翼**，以及其他思潮中的那些较切实际方面。在发展无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我们需要超越一切这些过去的运动——就像他们也曾超越过之前的革命运动那样。<sup>[10]</sup>

《尾注》对当代资本主义趋势的理论及其对各国斗争的分析如何应用于中国，或者中国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表明有必要修正《尾注》的某些观点，这是我们已经开始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希望中文读者在未来会探索的项目。<sup>[11]</sup>现在，我们只希望这三卷文选能引发一些讨论，并与当地摆脱资本主义刑房的努力产生一些共鸣。

# 与《尾注》小组两位成员的访谈

2024年2月

## 一、起源

**T**（本书编辑之一）：您能先谈谈您在《扬弃》的那些最后促成《尾注》成立的经历吗？

**J**（《尾注》创始成员之一）：《扬弃》成立于1990年代初。它源于反对人头税（poll tax）的运动，这场成功的不缴税运动最终促成了撒切尔（Thatcher）夫人的下台<sup>[12]</sup>。《扬弃》的一些成员是在一个读书小组中聚集起来的，该小组由不缴税运动和布莱顿其他社会斗争的参与者组成。其中一些人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极左**倾向的影响，但他们也对意大利**自主**（Autonomia）传统感兴趣，并从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开始。

在它的自我想象中，该项目是“开放的”，因为它接近于1970年代从“社会主义经济学者联合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中出现的“开放马克思主义”

（Open Marxism）倾向，代表人物包括维尔纳·邦菲尔德（Werner Bonefeld）和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sup>[13]</sup>《扬弃》试图在其理论工作以及与社会运动（如反对人头税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运动）的关系中保持这种开放性。它的一些成员积极参与了这些斗争。《扬弃》会对其成员参与的社会运动进行批判性研究，其中最早的研究之一，是对当时反对修建破坏生态系统的新公路的运动进行的深入分析<sup>[14]</sup>。随后，反公路运动在城市中产生了“夺回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运动，这是一场与狂欢文化和环境保护主义相关的派对 / 抗议运动<sup>[15]</sup>。在 90 年代末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夺回街道”颇具影响力。例如，1999 年在西雅图盛行的“战术多样性”（diversity of tactics）<sup>[16]</sup> 概念就是在“夺回街道”中首次提出的。在这些运动中，《扬弃》的几位成员写出了大量批判性的反思，他们借鉴了精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得出的理论成果，但作为各种形式阶级斗争的带有自我批判精神的参与者，他们又将其应用于非学术领域。

布莱顿当时也是失业斗争的中心，《扬弃》的几名成员参与了在当地建立失业工人中心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布莱顿成功抵制了新工党的“工作福利”（workfare）制度，该制度将工作强加给失业者。<sup>[17]</sup> 在《扬弃》的集体记忆

中，这个失业工人中心是成功的关键，因为他们与在中心工作的人建立了联盟，在公共部门工会里组织了工人，从而由另一面对抗工作福利：从那些将工作福利强加给失业者的人的那一面。

**T:** 《扬弃》在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延续到《尾注》中？

**J:** 这种对理论和斗争的开放取向激励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在 2000 年代初加入《扬弃》，后来又成立了《尾注》。这成了我们的口头禅或组织原则。第 5 期《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一文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sup>[18]</sup>，其中谈到了对新出现的运动持开放态度的价值观，而不是在看到斗争本身所展示的东西之前，就试图强加一些我们认为是好是坏的僵化标准。同样，在理论方面，我们也有一种自觉的折衷主义，愿意借鉴不同的理论传统，在方法上不拘一格。这两点都延续到了《尾注》中。

**T:** 是什么导致了从《扬弃》分裂出来成立《尾注》？

**J:** 分裂的关键因素是《共产主义理论》[以下简称《理论》] 在翻译和出版我们的“颓废理论”系列文章时对

《扬弃》所做的批判在我们之间产生的反响<sup>[19]</sup>，[……]令我们许多人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批判似乎发生在相当深的层次上。他们对我们未加说明的预设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当然，我们也试图为其中的一些预设辩护，但有趣的是，我们以前从未需要为这些预设辩护过。它们一直是小组身份的一部分，很难被质疑，因为这样做就是对此身份的质疑。当《扬弃》的一些老一辈人以《扬弃》典型的方式粗暴地回应时，我们当然感觉到了这一点。例如，该小组参与了围绕“自主主义”的论战，对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利奥波蒂娜·福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以及我们一直借鉴的其他意大利传统理论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是关于《理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不同资源的敌人，他们可以在合作的二十五年里积累的理论集中汲取养分——而我们很难接触到他们的海量工作成果，因为它们是用法语写成的，而且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散文形式。我们很难将确认并声称我们了解他们的错误，因为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扬弃》的一些年轻一代被指派去做这项工作：通读文集并找出其中的弱点。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觉得，“用这种方式与对手团体打交道有点奇怪。也许他们也有对的地方。也许这不仅仅是找到他们的弱点、提出正

确的反击、一劳永逸地打败他们的问题。也许我们真的可以从这次交流中学到东西。”这与一些老一辈的成员产生了分歧，他们似乎对从这次交流中学到东西的可能性不太感兴趣。

平心而论，我仍然会为他们的许多回应方式辩护。例如，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异化理论的。《理论》指责我们没有认识到晚期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异化概念。但我们知道，这种本质上属于阿尔都塞（Althusser）式的说法存在严重缺陷。因此，《扬弃》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回答都是完全有效的，至少在对马克思的解读上如此。但是，《理论》对异化的异议不仅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他们认为，异化的概念让我们保留了无产阶级自我肯定的愿景，即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回归其未被异化的本质。而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断裂。《理论》的论点是，“**纲领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sup>[20]</sup>。因此，即使我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关于历史和当今斗争局限性的论点持开放态度，但在他们看来，我们仍然过于坚持这种纲领性的愿景。它使我们得以保持我们作为活动家的角色，以一种回归无产阶级、回归工人运动的方式，介入直接行动运动、“夺回街道”运动以及《扬弃》参与的其他活动。我们对这些新的斗争持相当开放的态度，并不像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

样对它们不屑一顾，而是认为我们的职责是将它们与工人运动的“指路红线”（red thread）重新连接起来<sup>[21]</sup>。相反，《理论》认为，这条红线是海市蜃楼，我们为识别它所做的努力体现了一种纲领性的愿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条红线已经断裂。

我们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与我们希望对非传统形式的当代斗争形式持开放态度的感觉产生共鸣。《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但同时也拒绝放弃无产阶级理论，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就像后结构主义者希望我们做的那样，或像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穆夫（Chantal Mouffe）那样。这既不是那种对新事物的眩晕式兴奋，以至于让我们忘记那些对理解斗争局限性非常重要的框架，也不是试图在这些运动中看到相同的回归——那种在过去曾有过高潮的工人运动的回归，而为下一波浪潮，我们作为理论家和活动家以某种方式保留了纪念这些高潮的角色。《理论》指出的正是《扬弃》的这种未经反省的自我概念。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批评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想认真对待。大多数老一代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也有一些人感兴趣，所以他们和我们一起离开了。基本上的情况是，年轻一代被毫不客气地逐出了这个团体，然后一些老一辈为此也选择了离开。[...]

**T:** 你能提供一些《理论》的背景资料吗？他们脱胎于法国极左派、后情境派的传统，在中国还几乎无人知晓。<sup>[22]</sup>

**J:** 我在加入《扬弃》前就知道了《理论》。2001 年我来到法国，遇到了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sup>[23]</sup>，他当时也参与了与《理论》的辩论。当时，与《扬弃》不同的是，多维似乎真的对这场辩论和提出的问题持开放态度。这些辩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涉及许多不同的东西。它们涉及规范性的问题：我们思考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理论方法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共产主义世界或看到解放的愿望有什么关系？这种哲学的、元理论的反思，同时也迫使我们以可实践的方式面对个人斗争的现实，以及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引用了理查德·冈恩（Richard Gunn）关于“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好的对话是一切都允许掰开来谈的对话，其中“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oretical questions）和分析性的问题同时都可以得到消化。在这样的对话中，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没有什么不能被讨论。<sup>[24]</sup>

对我们来说，《理论》小组提出了一些问题，《扬弃》的其他人不想回答，但我们觉得应该尝试回答。这就是《尾注》第 1 期。

## 二、《尾注》第 1 期： 二十世纪得失明细的初步材料（2008 年）

J：经过几年的讨论，《尾注》第 1 期是我们将提出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并尝试对其进行初步思考的尝试。在这几年中，来自伦敦和布莱顿的六七个人组成的阅读小组每两周聚会一次，以开放的方式阅读理论和一些更偏时事或应用性的文章。[……] 那一刻，我们感到思考的过程让我们兴奋不已，这是我们这些在学术界摸爬滚打过的人从未有过的体验，因为我们对学术讨论感到厌倦，对行动分子的讨论感到局促，所以这里成了我们的绿洲。很多讨论还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心理和个人问题，包括与《扬弃》分裂所造成的创伤。有时这对我们来说是困难和挑战，但也可能是激动人心的。

这在第 1 期中达到了顶峰，虽然只是发表了我们为阅读小组所做的翻译工作，但也在引言和结论中对其进行了反思，并试图搭建一个新的舞台，让我们从密集的讨论转向写作——只是并不指向某个特定的受众。我记得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曾提出过一份期刊建议，让我们觉得很受启发。我们受到了这些法国团体的启发，

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荒野中创造理论，其中产生了一些颇具洞察力的瑰宝。

**T:** 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尾注》第 1 期吗？本书的中文版从第 2 期开始，因为你们的原创是从那一期开始的，不过在这里总结一下第 1 期中《理论》和多维之间的辩论，以及你们在引言和结论中的评论，会是有帮助的背景介绍。

**J:** 元理论的问题是关于规范性的：理论方法如何能够涉及一种目的论，而这种目的论的来源是规范性的理想或渴望。因此，在《理论》对多维的批判中 [在《尾注》第 1 期中译为《规范历史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质》<sup>[25]</sup>]，这是指多维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本质，它只需要通过历史来实现自身。也许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种自我实现会采取什么形式，而且多维也不是《理论》说成的那种教条主义者，但它的含义是，多维不是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如《理论》声称自己在做的那样）来审视当代各阶级力量的潜力和局限性，他在对斗争的分析中投射了一种正在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的跨历史愿景，而这种愿景已经隐含在马克思 1848 年（或 1860 年代，无论你认为那种构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多维为无产阶级本

质的观点辩护，认为它是关于资本主义阶级力量本质的跨历史真理，暗示共产主义潜藏在这一本质之中。

在遇到《理论》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借鉴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倾向，为类似的观点辩护。与此同时，《理论》似乎有点天真地认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规范框架，他们对客观、中立方法的愿景没有受到他们自己的本质主义的影响。的确，他们的观点带有结构主义的气质。他们没有直接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但显然被他创造的环境影响到了。因此，大多数接触过《理论》的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人，都会闻到一种新结构主义的味道，类似于 1970 年代末全盛时期的那种伪科学的、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

因此，我们受到了他们非规范化方法的影响，但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多维的辩论有一种宽广的气度，这是我们在左派内部遇到的许多其他辩论所严重缺乏的：它涉及一切，革命历史、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思想本质的元理论问题。所以我们发表了那场辩论，因为我们觉得，无论对这场辩论各方有什么看法，这毫无疑问就是我们想要进行的那种辩论。[……] 所以我们出版了第 1 期，因为它是我们所追求的优质理论辩论的典范。[…]

### 三、《尾注》第 2 期： 贫苦与价值形式（2010 年）

**T:** 本书翻译了第 2 期的两篇文章：《共产化与价值形态理论》和《贫苦与债务》。产生这两篇文章以及整个第 2 期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J:** 可以说第 2 期才是第 1 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至于社会背景，2007—2008 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它塑造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解。第 2 期是我们首次尝试通过各种文章来理解 2007 年发生的事情，包括导言《阶级关系中的危机》，以及《贫苦与债务》《关于新住房问题的说明》——所有这些文章都试图用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主题和我们刚刚接触到的新观点来思考这场危机。其中一些新观点是由当时刚刚加入的 [B. 和另一位新成员] 提出的。[B.] 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B**（第 1 期后加入的《尾注》成员）：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很有趣。就像你们有一个在第 2 期之前就有的历史悠久的团体，但我觉得你说得没错，2007—2008 年的危机，以及由

此产生的所有这些 [群众] 运动，使人们走到一起，并对第 2 期的成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许我们应该谈谈与《理论》的辩论和《贫苦与债务》的出版之间的关系。[J.] 你认为我们围绕危机理论重读马克思和我们与《理论》的辩论有什么关系？

**J:** 我得说，我们在共产化问题上，以及用《理论》的语言和它论战上已经走得够远了。[……] 有一种感觉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思考危机和共产主义时拓展我们的视野。《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就是这种感觉的一种表现，它其实就是在说：“这确实很有趣，但还有很多其他传统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其中之一就是德国传统，我们有兴趣看看围绕《理论》和共产化的争论是如何与这些在法语讨论中被忽略的理论倾向相联系的。” [……]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危机本身的性质，它的原初性质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显然处于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历史理论，甚至是经济理论，以及《理论》可能没有接触过的其他关于危机和历史的理论。其中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理论来源是通过 [B.和另一位名为 M.的新成员] 获得的。

**B:** 是的。我们理解《理论》关于这个危机的理论成果其意

义的一种方式，他们有“阶级关系再生产危机”理论，而我们试图证明马克思中存在着思考这一危机的资源，但并没有被《理论》所利用。这与我 [和 M.] 一直在做的工作有关。我们一直试图表明，有一种阅读马克思的方式，不仅仅是关于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衰退，而是关于一种长期的趋势，一种长期转型的轨迹。当你阅读《资本论》第一卷后面的章节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理论，即马克思认为该体系的长期趋势一方面是产生过剩人口，另一方面产生过剩资本，他在第三卷中对此有更多的论述。因此，我们 [在《贫苦与债务》中] 发展了这一整套理论，并将其与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特殊理论联系起来：这种趋势被我们称为“技术棘轮效应”，即随着旧产业的消失，新产业不断诞生，但新产业的诞生使用的是过去产业中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因此，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取代另一个行业，而是这些行业在技术上不断被向上推动，以吸收更少的劳动力和资本。

然后是 [《贫苦与债务》的] 第二部分，我们谈了为什么这一理论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适用——为什么他对 1870 年代的预言未能成真。我们谈到了我们称之为“基础设施产业”（*infrastructural industries*）的历史，即在十九世纪末工业是如何转型的，以至于它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劳动

力和资本，而不是驱逐它们，这是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我们追溯了从 1870 年到 1970 年这一漫长的工业化时期，马克思曾预期出现去工业化，但在 1973 年之后，马克思所分析的这一长期趋势终于成为现实。因此，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却推迟了一百年。与此同时，在这一百年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发生了变化，以适应这个基本预言没有实现的事实。因此，我们认为你现在必须回到最初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所预期的，实际上它正在成为现实——马克思确实是去工业化的理论家，但它才刚刚发生。

这就是 [ 《贫苦与债务》 ]，它以一种阴暗的语调结束：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作为多余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过剩人口将被如何管理。[ 第 2 期出版后，] 我们被错误地理解为认为这些过剩人口将成为新的历史主体，好像我们采取了一种法农主义 (Fanonian)<sup>[26]</sup> 的视角，认为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主体。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对法农的准确解读，但这就是我们被认为在倡导的——一种黑豹党、法农式的视角，将过剩人口视为革命主体。因此在后来的文本，尤其是《一个相同的贱斥主体？》<sup>[27]</sup> 中，我们试图澄清，我们并非宣称有一个新的革命主体，而是试图指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体的

**分解**<sup>[28]</sup>——不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说革命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这种分解是根本性的。与其说无产阶级的碎片之一正在成为新的革命主体，不如说碎片化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

我们提出的部分论点是从《理论》那里得到的，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可能肯定无产阶级或将无产阶级视为革命变革的积极力量的时代。我们的目标不再可能是统一工人阶级和建立工人社会，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分解过程和大量过剩人口的出现，那么这个阶级中仍在增长的部分就会以这种消极的方式进行（阶级分解），[这只会加剧这个阶级的分裂，并阻止任何一部分在任何肯定性意义上占据领导权的地位，从而指向革命]。

[《一个相同的贱斥主体？》]所做的另一个澄清是，我们在[《贫苦与债务》]中从未说过过剩人口不工作，但我们经常被解释为好像我们是在说过剩人口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关系之外。实际上，我们认为，过剩无产者以各种方式被包括在内，只是被显著地缩减了，要么工资较低，要么工作断断续续，要么在非正式行业中做自雇人士。我们展示了甚至马克思对过剩人口的不同部分进行的清晰分析，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这又是如何将他们与“贫民”——根本无法再工作的人——区分开来的。

**T:** 您能否澄清一下,“过剩人口”是指无产阶级的一个特定部分,还是指整个无产阶级的一种普遍状况?

**B:**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将其理解为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些社会中,比如在欧洲,实际上在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也许包括中国,都在努力保护一部分工人阶级,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不至于处于不安全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就业是有保障的,而另一部分人的就业则是过剩的、无保障的。因此,各国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来处理超员问题,即在内部和外部群体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但在其他社会,如美国,以及以不同方式存在的全球南方的部分地区,并没有为此做出的努力,因此超员的状况在人口中更广泛地蔓延开来。当你遇到很多人在找工作却没有足够工作的问题时,社会一方面可以尝试通过政策来解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工人和资本之间的斗争来解决。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在一些国家,超员的形式以更分散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普遍的不安全感、收入中劳动份额的下降等,而在另一些国家,超员则更多地集中在特定人群中。然后,这还会涉及到 [J.] 更为了解的其他维度,比如种

族化。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被特别降低为过剩状态的部分也会以其他方式被种族化或边缘化，例如被识别为特定的种族群体。[...]

#### 四、《尾注》第 3 期： 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不幸（2013 年）

**T:** 虽然中文版不会收录关于种族化的文章（《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谈谈这篇文章，以及收录在第 3 期中的另外两篇文章：《性别的逻辑》和《盘旋待降》。但首先，您能否更概括地谈谈这个问题？

**J:** 嗯，第 3 期的指导思想是，我们从应对危机本身转向应对危机后出现的新斗争。在第 2 期中，只有《梦工病患者的调查》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到了一场斗争，但实际上整期都是在用这些宏大的历史术语和理论术语进行讨论，而第 3 期则是我们试图对危机中出现的政治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政治表现形式相当滞后，但第 3 期也是滞后的。我们是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开始之后出版的。

**B:** 两篇大文章分别是《盘旋待降》和《水涨船高：危机时代英国的抗争》<sup>[29]</sup>。《盘旋待降》是一篇广义的历史性文章，以超脱的方式概述 [不同国家的斗争]，而《水涨船高》则是一篇非常集中、主观地描述 [2011 年] 伦敦骚乱的文章。

对我来说，《盘旋待降》是《尾注》终于结晶为“我们时代的理论”的一篇文章。在之前对危机的分析中，我们一直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过剩人口的倾向，而在《盘旋待降》中，我们试图理解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如何改变斗争的。我想，如果当时我们能够接触到稍长的历史轨迹，我们就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研究这些影响，但在那篇文章中，我们真正关注的是 [2010—2013 年]。而我们特别锁定的目标是，斗争是如何围绕两个群体的不同利益和观点展开的：[一方面，] 有稳定工作的工人，他们的斗争试图抵御被裁员或丧失权利和工作条件等各种进一步损失；[另一方面，没有稳定工作的无产者，他们] 往往以更大的数量出现在斗争中，要求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是说他们有可能失去什么东西，而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包括在内。

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斗争因这些群体需要合作而发生变化的方式，以及为了合作，他们必须克服各自的特殊性

这一事实。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运动中不稳定、无保障、多余的这一部分压倒并改变了有保障工人的斗争。我们认为，在2010—2013年间的所有这些斗争中，存在着一些趋势，暗示着斗争可能的未来，正如《扬弃》和《理论》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在阿根廷〔2001年经济危机后的全国总罢工、暴乱和工人接管工厂中〕首次看到了这种趋势<sup>[30]</sup>。

但这些斗争的问题在于，国家通过危机管理技术，阻止了危机演变成萧条，因此遏制了危机。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论点，最初在一篇名为《紧缩的两个方面》的博客中提出<sup>[31]</sup>。这个想法是，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来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但后来国家开始担心，花这么多钱会危及系统的长期健康，所以国家花费了大量资金来阻止萧条的到来，同时对社会服务实施紧缩。这显然是许多无保障就业、无工会组织的工人所苦苦挣扎的原因，正是他们在经历所有这些削减。根据我们的分析，危机管理在这一时期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意味着，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国家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上。实际上我们认为，考虑到国家所面临的限制性条件，国家的行为是相当理性的，但反抗运动却认为国家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在花费大量资金〔例如救助金融机构〕的同时，却让无产阶级受苦，把危机推到了工人的身上。因此，本应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变成了国家、民主、

代表权等方面的危机。

**T:** 好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性别的逻辑》。几年前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时，[B.] 曾就此做过几次演讲，也许你现在可以总结一下？

**B:** 《性别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理论》关于性别问题一系列文章的回应<sup>[32]</sup>。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有两个基本矛盾 [：一个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另一个在男人和女人之间]。[ 《性别的逻辑》的两位主要作者之一 M. ] 以及我们其他人曾与《理论》就“矛盾”一词的使用展开过争论，“矛盾”一词最终是毛泽东式的，但也是阿尔都塞式的，意指“对立”（antagonism），并试图描述社会中有多少对立或有多少矛盾<sup>[33]</sup>。当然，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要说除了阶级对立之外还有一种基本的对立，很难想象不说种族也具有这种特征。《理论》拒绝了这一观点，但他们不仅否认了这一点，而且似乎对参与这场辩论并不感兴趣。实际上，他们似乎对这种批评相当不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种族主义的著作。[...]

因此，这种与《理论》的非辩论鼓励了我们对这些性

别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 1970 年代以来女性生活的巨大转变。女性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她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终生参加工作，但她们仍然面临着所有这些与性别相关的不利因素：她们的工资比男性低，工作更不稳定，做家务更多，离婚对女性收入造成的灾难比男性大得多，等等。因此问题在于，1960 到 80 年代，从家庭主妇角色中解放出来的女性为何没有获得更广泛的解放。这篇文章关注的问题是，女权主义者思考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主要是在 1960 和 70 年代在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形成的，这些方法的前提是家务劳动是特殊的，与其他形式的工作是分开的。这篇文章的观点是，这种区别存在于第二波女权主义和那个时期各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早期概念的核心之中，但它对我们今天并无用处。在这些较早的理论中，生产与再生产、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公共与私人之间存在着核心区别。公共和私人这两个词的使用总是有点奇怪，因为私人被用来指私人家庭，而公共则包括私营经济。问题是，在 1970 和 80 年代的发展过程中，原本由家庭主妇在家中从事的大量所谓“再生产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在私营经济中通过有偿劳动来完成。在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中，妇女外出工作，获得了专业职位，然后开始雇佣女佣来从事再生产工作，比如照顾孩子，因此现在很多

这种工作都是以市场为中介用新的方式完成的。因此，文章提出了一种更准确的方法，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妇女已成为劳动力市场正式参与者的时代，性别依然存在。[…]

马克思有这样一种观点，工人的报酬低于他们在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因此，在劳动和劳动力之间，或者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这种区别。马克思的意思是，工人的工资足以购买一篮子商品，将工人再生产为工人，以便他们第二天能够再来工作。《性别的逻辑》谈到的问题是，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必须在某个场所发生，即工人的工资可以购买所有这些商品和服务，但它们必须通过家庭生产进行转变，才能真正再生产出劳动力。因此，这种类型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但并不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文中试图通过描述两类活动来弱化早期模式中非常明显的区别：“**直接市场中介**”（DMM）的活动，即用金钱交换工作或产品；以及“**间接市场中介**”（IMM）的领域，其中有许多活动依赖于所有这些市场活动，或者与它们有所互动，但其本身并非直接以市场为中介，因此不涉及用金钱交换工作或商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想法是，间接和直接以市场为中介的活动都是劳动，只不过 IMM 是无偿劳动，而如果所有劳动都是有偿的，那么性别则会更加平等。于

是就有了名为“家务劳动工资”的运动，以实现这一目标<sup>[34]</sup>。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后，很多以前的家务劳动都变成了以市场为中介，这不仅体现在人们开始雇佣女佣在家工作，还体现在他们现在会购买更多预制饭菜、支付托儿费等。还有很多以前是家务劳动的工作，现在通过公共系统、政府中介的育婴所或托儿所来处理。因此，这篇文章对 DMM 工作和 IMM 工作进行了区分。DMM 工作从属于价值规律，是被标准化了的，人们努力改进这种工作，使其更有效率、更可衡量，因为你要为人们工作的具体时间付费；另一方面，IMM 的工作没有工资，是由人们在空闲时间完成的，它不需要有效率地完成，因为没有人直接为此获得报酬，所以它没有同样的限制条件，价值规律也不在这个意义上运作。

甚至连什么算是工作的界限都很难说。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包括刷牙、锻炼、运动或与孩子一起玩耍等事情，因此很难说这些活动中哪些部分是真正的工作，哪些不是。但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或找到确切的界限。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概念语言，让我们能够区分哪些工作是独特的、可衡量的，哪些工作是模糊的、难以界定的。

然后，文章描述了这一领域中发生的转变，许多以前属于 IMM 的活动是如何变成 DMM 的，因此，许多以前与

女性相关的活动，如育儿，现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使其“非自然化”（denaturalizes），因为它们只是有偿工作，而不是女性专门的工作，尽管它们仍然高度女性化。因此，这篇文章试图理解面对这种转变时，性别持续存在的不同方式。为什么性别依然存在？它试图捕捉这样一些方式，即尽管发生了这种转变，许多以前未被市场化的活动被市场化了，但女性仍然被束缚在这些活动之上的各种方式。

**T:** 除了更准确地解释性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运作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变化之外，你认为这部作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B:** [……] 当时，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ylvia Federici）<sup>[35]</sup>就紧缩措施展开了一场辩论，讨论了许多以前通过国家中介职能完成的活动，如教育、儿童保育、医疗保健、老年人护理等，现在都在经历紧缩预算的削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上许多原本不由妇女负责的活动，现在又变成了由她们负责。对此，一些作者开始说：“我们正在赢回这些事情！”——似乎他们对非市场调节活动有正面的构想，他们认为女性重新承担起这些照顾性的角色是件好事。费代里奇与这一阵营有关联，不过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在

书中坚持这一观点。

无论如何，对于《性别的逻辑》一文的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它与这些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的概念上的区分和观念有很大关系，而作者认为它们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女性正被迫回到这些传统角色中。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贱斥”（abjection），即被迫恢复不平等和较低的地位，不得不从事大量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被推回到这种家庭角色的经历。因此，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直接政治含义：反对某些形式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有这些理论比如生态女性主义，都对女性的再生产活动有更积极的构想，声称问题只是社会对这些活动不够重视，现在我们需要改变对它们的态度。《性别的逻辑》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否定了这些活动的积极意义，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工资，也与其他活动一样。

这也是那一期《尾注》中更大的行动的一部分，也就是指出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消除无产阶级内部旧形式的差异和对立。马克思有这样一个观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融化成空气。”这些基于语言、种族、性别的内部对立，随着资本主义巨轮的前进，随着现金关系（cash nexus）的发展，都会逐渐消融。但与这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

《尾注》有志于研究资本主义是如何复制、改变甚至创造新的内部对立的。这是我们政治项目的一部分，如果你可以用政治这个词的话——说无产阶级内部存在这些对立，而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克服，这是非常有争议的。或者用《理论》的话来说，人类的统一只有通过面对并超越“阶级归属”才能实现，所以阶级归属最终也会成为阶级斗争本身的一种障碍。[也就是说，无产者最初是通过围绕“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而团结起来的，但是这种认同及其相应的制度最终会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障碍，因为共产主义需要消灭阶级社会和一切阶级的存在。]《尾注》希望扩展这一概念，指出种族、性别角色、所有这些其他社会类别都可能会——事实上在“广场运动”（the movements of squares）<sup>[36]</sup>的背景下已经发生——成为推进斗争的障碍，因为这些社会类别会使人们相互分裂。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构成问题**”（the composition problem）的更广泛分析的一部分<sup>[37]</sup>。我们试图思考，资本主义再现、甚至强化和激化的无产阶级内部所有这些不同的对立，将如何成为斗争中团结的障碍，成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力量的障碍。

J：但我要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撰写

关于性别和种族的文章时，确实试图得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结论，即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解决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部分原因是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说：“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革命！”但我认为，我们试图避免一开始就得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结论，从而影响我们对此的假设。我们试图就性别在资本主义中的角色提出一个开放的、非规范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在某些问题上与《理论》有强烈的分歧，但这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他们对历史的特殊解读，或者他们对性的特殊解读。因此，虽然 [B.] 所指出的政治结论是存在的，但我们更像是在回顾过去，思考这些结论可能是什么，但在当时，我们并不打算就性别问题提出某种政治路线。

**T:** 构成问题的另一部分，也是另一个被提到的对立是种族问题。两位能否总结一下第 3 期中的《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书中未收录），然后谈谈第 4 期中的《布朗诉弗格森案》（书中有收录）？

**J:** 在第 3 期中，我们试图将种族、性别和阶级作为身份来讨论，并试图思考它们所蕴含的不同类型的身份政治，但与此同时，我们恰恰并不是说它们在任何意义上是相互之

间的结构性镜像。这些概念所指向的社会分化，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我们如何解释它们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在如何克服这些分化的政治结论上，也许也会大相径庭。但重点还是在这里：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语言在今天所表达的政治的形式，及其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或历史逻辑可以解释这些明显的分歧？因此，在谈到种族问题时，我们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克里斯·陈（Chris Chen）的《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中，我们用相当松散的理论术语对其进行了勾勒，然后又在《水涨船高》和《布朗诉弗格森案》中对其进行了分析解读。

首先，我们思考种族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在范围上既不是跨历史的，也不是跨国的。从种族不平等的成因在不同环境下可能大相径庭的意义上讲，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跨国思考。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找不到种族不平等的原因，或者我们可以尝试将某些版本的民族或宗教分裂纳入种族不平等的框架，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将种族、民族、宗教等之间的区别混为一谈。因此，当我们试图解释种族不平等时，我们需要考虑到更多的历史偶然性，所以我们在《布朗诉弗格森案》和《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中关注了美国的特定种族历史，而在《水涨船高》中关注

了英国的情况。诚然，这种历史特殊性通常可以与我们在《贫苦与债务》和其他著作中提出的过剩人口理论联系起来，但这并不能归结为过剩人口理论，因为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剩人口，就一定会出现形式相同的种族问题。种族分化的存在也并非总是反映了过剩人口的动态。例如，十九世纪的美国就完全不是这样：在这样一个奴隶制社会里，种族不平等的逻辑根本没有映射到过剩人口上。从定义上讲，几乎没有过剩的奴隶。如果说我们可以对种族问题进行概括的话，那么种族问题似乎是后殖民、后奴隶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通常是前殖民地的）移民劳工，还是由较长的歧视历史所界定的下层阶级，都可以映射到过剩人口的动态上，而这种动态则成为去工业化和后期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布朗诉弗格森案》中，有一段重要的引文出自1960年代的一位毛派学者，他试图想象去工业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以一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推测使用监禁来管理过剩人口，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的框架内，无法想象利用监狱来管理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化过剩人口问题。对我们来说，这确实很有启发性，因为这表明当时的逻辑还不存在。在1960年代的美国，在就业率相对较高的背景下，这种逻辑是不可想象的。许多人试图将过剩人口

作为美国种族化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框架或描述来思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克里斯·陈在《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一书中给自己提出的挑战，但他所表明的是，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忽视产生种族化的实际历史动力。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讨论过过剩人口理论：《贫苦与债务》《自发性、中介、破裂》《一个相同的贱斥主体？》——但在《布朗诉弗格森案》中，我们将这些内容映射到美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中：美国黑人的经历之中究竟是什么导致过剩人口被编码为黑人？相比之下，《水涨船高》则讨论了英国黑人的经历及其不同之处。然后，在《前进吧，野蛮人！》中，我们将这一切与美国当代废奴政治联系在一起，思考当今废奴政治与早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浪潮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可以被描述为提出了关于种族的一般理论。

**T:** 《资本主义平等的极限点》有时被认为提出了一种特定的种族化理论。

**J:** 是的，这本书很有意思，因为克里斯·陈对种族概念采取了一种“取消主义”（*eliminativist*）<sup>[38]</sup>的方法。他只在引号中使用种族概念，因此对试图在我们的语言中将种族自

然化或实体化的做法采取强硬立场。他建议我们退一步扪心自问：“当我们采用种族概念时是否在复制种族主义？”[……]在他后来的文章中，我注意到克里斯在提到“种族”或种族术语时不再总是使用引号，但在那篇文章中，克里斯通过从根本上拆卸其模架的方法来将种族概念问题化，他谈论的是种族化的过程，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种族”或“种族主义”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他的立场描述为取消主义，尽管他使用的术语是“废除主义”，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试图废除种族概念，而不是像许多种族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把它当作一种可能有自己逻辑的东西，一种可能“有自己生命的东西”。[……]这意味着种族总是在变化之中。种族的界限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作为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的手段，种族总是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政治背景。因此，要提出一种能够解释种族压迫的具体动态的广泛理论要难得多。

#### 五、《尾注》第4期： 分离的统一（2015年）

编者按：第4期中的《一部分离的历史》是按照第3期社论中勾勒的思路对“阶级”这一范畴进行研究的地方

——不是作为逻辑上的“矛盾”（马克思仅在黑格尔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描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内部各群体之间的社会性“对立”，类似于种族和性别，具有基本的结构性位置，但也因时因地而异，涉及身份政治的各种因素。

**B:** 为了解《一部分离的历史》，需要将它放在一个更大项目的构思背景中，我们称之为《昨天——今天——明天》。

**J:** 这个标题是根据 [德国**工委共产主义者**] 保罗·马蒂克 (Paul Mattick)<sup>[39]</sup> 的一篇 [名为《马克思主义：昨天、今天和明天》的] 文章改写的<sup>[40]</sup>。

**B:** 原本的想法是，我们要写的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然后每一部分越来越长，最后“昨天”变成了《一部分离的历史》，“今天”变成了《盘旋待降》，以及“明天”变成了《自发性、中介、破裂》<sup>[41]</sup>。有趣的是，关于“今天”的《盘旋待降》是作为第 3 期首篇文章发表的，关于“明天”的《自发性、中介、破裂》是同一期最后的一篇文章，而关于“昨天”的《一部分离的历史》需要等到第 4 期才能发表（尽管我们在第 2 期中称之为“即将发表”的）——

所以“昨天”在“明天”之后。如果你还记得我在描述《贫苦与债务》时，它的结构是这样的：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将会发生的事情有一个预言，那就是去工业化和过剩人口的膨胀。然后在 1870 年到 1970 年之间，资本主义发生了不同的转变，出现了新的工业化时期，基础设施产业兴起，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从 1870 年到 1970 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工人运动的任何其他经验。然而从 1970 年起，它再次适用。

因此，在《昨天——今天——明天》中，我们的想法是，《一部分离的历史》涵盖了 1870 至 1970 年这一时期，当时马克思是错误的，《盘旋待降》涵盖了马克思所想象的危机的趋势和斗争的重新出现，最后《自发性、中介、破裂》试图描述未来的斗争会是什么样子，以及革命如何能够从斗争中产生，而这些斗争并不具有 1870 至 1970 年期间工人运动所具有的那种制度特征。因此，我们看到了工会和政党的积累和硬化、僵化。我们的想法是，这些东西今天正在瓦解，而明天它们与将要发生的斗争类型的相关性就会大大降低。[...]

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脑中的《尾注》版本——这不一定是《尾注》里其他人对此项目的构想，但至少是我和 [J.] 两人共同的构想——从写作《一部分离的历史》到发

展出这一跨越这些文本的完全整合的理论，是完整的《尾注》理论。它从头到尾都是末日般的，通过类似《圣经》的、弥赛亚式的视野来解释整件事。[……] 我们花了数年时间为《一部分离的历史》收集资料，我们仍在计划将其写成一本书。

我们最终关注的问题之一是，马克思对 1870 至 1971 年这一时期的看法有两点是错误的。一个是关于农民的持续存在。这是他后期发现的东西。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他逐渐认识到，没有必要从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因此阶段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去世后，全球农民持续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要长很多。我们借鉴了塔马什（Gáspár Tamás，现已去世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观点，表明农民的持续存在也涉及旧制度精英（如土地贵族）的持续存在。这不仅给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问题，也给工人运动带来了问题，因为这些旧制度精英往往不想把自由主义的自由扩展到工人阶级。他们希望严格限制对政治进程的参与。因此，工人运动最终不得不为促进自由主义自由而斗争，而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主义自由本应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扩张而自动到来。这是托洛茨基和其他人写过的东西。

另一大趋势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工业化创造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而且比马克思想象的更具可持续性。它似乎开辟了一条通往这样一种思想的道路：被排斥的无产者反抗社会并创造新世界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实际上那个工业化时代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可以让工人融入经济体系。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尽管工业化比马克思所预言的要强大，但它比工人运动所需要的要弱，而工人运动需要的是产生它所追求的那种政治力量。因此，工人运动成为更多工业化和进一步推动工业现代化的倡导者。因此，我们的论述同时借鉴了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sup>[42]</sup>和《理论》并追问：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如何成为如何实现工业化的理论的，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不仅成为这一进程的初级伙伴，而且成为它的实际组织者的。我们追溯了这段历史，文章的不同部分涉及不同的方面，但总体上追溯了工业化时代工人斗争的发展轨迹，以及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对工人战略的影响。

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历史相比——例如我刚刚读了迈克·麦克奈尔的一本名为《革命战略》的书<sup>[43]</sup>，它成为了新考茨基主义（neo-Kautskyian）理论的基础——你在那里和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左派中看到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真正的革命战略是通过左派政党和工人阶级运动的经验来揭示的。人们经常假定的是，存在着这种恒定的静态背景，

我们正在进行着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同样的斗争。因此，我们的目标就变成了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出今天的正确策略。相比之下，就革命战略而言，《一部分离的历史》所做的是向人们展示，实际上每次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一种世俗的变革一直在改变着资本主义，改变着工人所经历的斗争，也改变着工人运动所面临的战略问题。我们表明，任何将革命理论建立在对过去革命活动最成功的分析之上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在结构上是闭塞的——它阻止了这些理论的制定者认识到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T:** 一篇关于《一部分离的历史》的评论将其描述为对工人运动的“身份认同政治”解读。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B:** 是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把阶级的概念说成是与身份不同的东西，身份只是工人表面上的认同，而阶级则是他们存在的深层本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运动是近代除民族主义之外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身份认同运动。正是这些分析所假定的工人身份认同的意义和吸引力，实际上是必须被建构起来的。是的，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一大主张：我们应该把工人身份的构建理解为一种共同的阶级视角，理

解为一种必须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预先存在的本质。

**J:** 不过，这也很有可能被误读。我觉得第 3 期的社论很可能就是这样被误读的，因为有一行我们谈到了这一期的主题：“性别、种族、阶级和其他不幸”。人们可能会理解为，这些都是可以互换的类别，都只是身份的类别。但我认为，《一部分离的历史》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并不这么认为。虽然工人运动应被理解为一场产生了工人集体身份的运动，但这并不是说阶级仅仅是一种身份。[…]

**B:** 是的，阶级也是一种结构性位置。但在政治意义上，它采取的是一种身份的形式，至少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甚至没有说所有时代都是如此。它在工人运动的时期是真的，它是围绕着对阶级身份的肯定而专门组织起来的。我认为这种分析上的区别很重要。

**T:** 社论 [和上面讨论的那些文章] 还说，性别和种族也不仅仅是身份，对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阶级是一种真实的、物质性的位置，而性别和种族只是表面上的身份，但《尾注》的意思是，它们三者既是身份，也是资本主义中的结构性位置。

**J:** 但也是非常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对吧？人们很容易将结构性位置的概念视为可以互换的，而这是我们不会接受的。

**B:** 我们在那里也试图做的一点是（其实我们本打算写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来得及），我们提到了马克思对“矛盾”（contradiction）和“对立”（antagonism）之间做的区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sup>[44]</sup>。尤其是毛泽东主义者，然后是阿尔都塞通过毛主义，都将“矛盾”和“对立”当成同义词，这样就可以谈论“阶级之间的矛盾”。我们与《理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因为马克思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矛盾”一词。马克思是从黑格尔的传统中走出来的，这个传统中，“矛盾”实际上是一个逻辑范畴，所以你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描述为矛盾的，因为它建立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之上。在这一体系的组织核心存在着逻辑矛盾，它表现为社会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 这种系统性矛盾具有一种趋向于[系统]解体的动力，进而转化社会内部的对立。因此，你可以有一个矛盾指导着这个矛盾的社会，但它可以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对立。

我们谈论[阶级、种族、性别等对立之间的关系]的

另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这些结构性特征使工人产生分化，对吗？[……] 马克思明白，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将倾向于消除这些差异，并使阶级成为一个人的经验中最显著的方面。我不知道马克思是否认为存在一种可确认的工人阶级身份，但这被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基础。但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主义改变了工人阶级内部很多分裂和差异的来源，它并没有根除它们。因此，我们认为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工人阶级内部所有这些差异的持续存在和结构性转变。

你可以在第3期的社论、《性别的逻辑》和《一部分分离的历史》的序言中窥见我们与《理论》的关系，总结这种关系的一种方式，我们继续与《理论》对话，试图解决[我们在他们的框架中看到的]问题。

**J:**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然试图在从《理论》那里学到的、我们认为具有启发性的路径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对我们来说，《理论》的启发之处恰恰在于，它将我们从《扬弃》的理论方法强加给我们的一些束缚中解放出来，尤其是《理论》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学方式。新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就是我们在第2期中所说的“移动的矛盾”<sup>[45]</sup>。

而第 4 期中《一部分离的历史》则是关于《理论》应用这些范畴时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试图通过细读资本主义历史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既试图将《理论》历史化，也试图将我们自己的时代历史化，因为 2007 年的危机迫使我们思考生活在一个新纪元意味着什么。但与此同时，《理论》也从他们自己的历史关注点转向更加跨历史的性别概念，以及在他们的关于性别的文章中所表达的“双重矛盾”的观点。因此，我们在第 3 期的社论和《性别的逻辑》中指出，他们正在发展的这一新理论实际上忽略了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他们理论中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它离开了资本主义历史化的领域，而转向了这种更加抽象 [ 的理论，这种理论 ] 更加依赖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T:** [B. ] 你提到了《自发性、中介、破裂》是作为系列的第三部分构思的，包括关于过去的《一部分离的历史》和关于现在的《盘旋待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将这篇文章收录到书中，但既然这篇文章如此重要，您能否为我们总结一下？

**B:** [……] 《自发性、中介、破裂》部分是关于 [ 反驳 ] 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曾被错误地认为（例如在《贫苦与债

务》中)，未来的斗争与过去的斗争不同，大多将采取暴动（riots）的形式。我们被理解为，在从 1870 到 1970 年漫长的工人运动时期，早期的斗争是通过工会和政党组织起来的，但随着这些中介形式（mediating forms）的瓦解，我们将迎来无中介的暴乱斗争。因此，正如我们必须反对过剩人口可以成为新革命力量的观点一样，我们也必须反对暴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无产阶级抵抗的革命原型〕形式的观点。诚然，我们写过关于暴动的文章（例如《水涨船高》），但真正读过那篇文章的人都不可能把它理解为对这种形式的颂扬——它讨论的完全是关于〔暴动〕作为一种〔斗争〕形式的局限性。

因此，《自发性、中介、破裂》分析的是，在没有工会和政党等现有中介形式的情况下，斗争如何组织起来。我们感兴趣的一种思考方式是，斗争如何产生新的策略，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斗争内容。我们感兴趣的是，斗争如何创建组织来推动自身的斗争。我们的分析得出了两点结论：

其一，我们对某种非常简单的博弈论产生了兴趣。有一种叫做“迭代囚徒困境”（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博弈论，〔在这里似乎是相关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工人们想要采取行动，但觉得自己无法行动，因为不知道其他工人是否也会一起迈出这一步。他们不敢独自行动，而

且独自行动也不会有任何结果。这只会让你坐牢或丢掉工作。因此，工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斗争，或者在暴动或其他通常被称为“自发斗争”的形式中，都会面临协调问题，但我们试图将其理解为自由斗争。这不是一种机械的反应。它是一种不可预测的东西，因为它以人的自由为基础，而且有时人们可以就地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通常会在诸如有人被杀或裁员等触发性事件发生时这样做，但并不是每个触发性事件都会这样做。[……] 但是，当人们在这些条件下开始斗争时，他们会学会相互信任。参与斗争的人越多，其他人就越觉得加入斗争是安全的，他们就越来越愿意走得更远。因此，新战术、新组织形式和新内容的发展是随着人们开始相互信任、更多参与而动态发生的。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吉尔·多维的观点，也来自人们在极左传统中思考共产主义的另一个悠久历史，即工人为了在资本主义中开展斗争而建立的组织形式，反而成为了社会革命转型的障碍。一旦斗争达到一定程度，工人为开展斗争而建立的组织就会经历这个我们称之为“党派化”（partisaniz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会分裂，一部分成员试图保留组织，以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展斗争，另一部分成员则试图推翻资本主义，进入新社会。因此，我们试图从理论上分析这些斗争如何在这个新

时代出现，如何发展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及在斗争的高潮，在他们的组织内部，如何出现破裂。

## 六、《尾注》第 5 期： 激情与利益（2019 年）

**T:** 在这本书翻译的第 5 期的文章是《世界公社的剪影》和《家庭会被消灭吗？》，这两篇都是“收录文章”（intakes）[非成员撰写的文章]，也许你可以更笼统地谈谈这一期。为什么它与其他刊物如此不同？

**B:**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都在变老，必须努力生存下去。很多职业变动、疾病和悲剧都拖慢了我们的脚步。这也是第 5 期最终收录较多的原因之一。

**J:** 关于集体写作与我们所说的“收录文章”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在此说一点。实际上，这个词来自《扬弃》。在《扬弃》中，我们会集体撰写大部分文章，因此《尾注》的集体写作过程也是从《扬弃》延续的方面。然后，《扬弃》会有一些“收录的”文章，这些文章来自我们联系到的或联

系到我们的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不是编辑组的成员，但他们希望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

在《尾注》第 5 期中，“无阶级社会之友”<sup>[46]</sup>是我们认识已久的一个团体，可能在我们创办《尾注》之前就认识了。我们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几篇他们作品的英文译文，他们也把我们的作品翻译成了德文。因此，我们有理由翻译并发表他们长期理论探索过程中的这一重要总结[即《世界公社的剪影》]<sup>[47]</sup>，其持续时间与《尾注》类似。

米歇尔·奥布莱恩（Michelle O'Brien）的《家庭会被消灭吗？》以《性别的逻辑》为基础，继续与一位不在《尾注》中、但对我们所做工作非常认同的人进行对话。米歇尔在撰写这篇文章时也大量借鉴了《一部分离的历史》。

第 5 期中的其他文章也有明显的连续性，例如贾斯珀·伯恩（Jasper Bernes）的《革命动机》反映了我们一年来的讨论，包括他早先发表的文章[第 3 期中的《物流、反物流与共产主义前景》]。因此，这些人都与《尾注》进行过对话，有时甚至是几十年的对话。[...]

T: 你们刚也提到了《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这是第 5 期为数不多的集体创作的作品之一。关于这篇文章，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也许与[未发表的文稿]有关，即从实

际意义上讲，今天做一名共产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B:** [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和未发表的文稿中，我们探讨了] 斗争中的低潮理论，当 [斗争没有连贯性，革命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前景时，] 在这样的时期，你如何保持自己，继续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作品的主要观点之一是，斗争必须解决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当出现新的斗争时，就意味着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包括新的策略、新的内容、新的组织形式，从而将事情推向更高的层次。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你是由过去的斗争时代形成的，但你又试图介入新的斗争时代。因此，参与新的斗争，并利用自己的经验以可能导致其动力溢出的方式参与其中，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但总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你从过去汲取了错误的教训，并将其应用于截然不同的现在，从而使你的贡献变得无效甚至有害。因此，我们有一整套关于斗争参与的理论，但同时也在努力让人们明白，未来的斗争将比我们之前经历过的斗争规模更大。与其做一件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来推动斗争，更重要的是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做出贡献，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人们真正做的是他们擅长的、他们喜欢做的、他们可以持续做的事情。因此，文中有很多信息是关于我

们所说的“有限的战斗性”（limited militancy），而不是“无限的战斗性”。与其将自己视为斗争的领导者，不如想想如何才能真正为斗争做出贡献。[…]

**J:** 与此同时，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方面与“社运圈”（activist milieu）<sup>[48]</sup> 打交道，即使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尝试从疗效层面解决其中不好的想法，从而有利于这个圈子。人们对与社运圈进行任何程度的接触以及这是否应该是《尾注》的工作持保留意见。我就是提出这些保留意见的人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尾注》的基础。这是我们为什么会从社运圈离开以及为什么不想回去的原因：我们不想被拖入我们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中谈到的那种不健康的动态中，这通常是安那其圈子的特点，也是一般社运圈子的特点。[……] 当然，我们绝非不参与斗争。但我们认为，一个人能否保持头脑清醒，与他能否避免陷入斗争中自发产生的身份认同有很大关系（琐碎的权力游戏从未远离）。[……] 我们从**工委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sup>[49]</sup> 和我们对于理论的角色理解中，继承了一整套如何避免在斗争中以说教的形式与人产生联系的政治学。[…]

## 七、《前进吧，野蛮人!》(2020年)

**J:**《前进吧，野蛮人!》的形式与《盘旋待降》类似，都是回顾最近的斗争浪潮。当时[新冠]疫情才开始几个月，但我们想强调的是，2007年之后开始的抗争仍有很大的连续性。2019年是国际范围的一个运动高潮，包括香港、黄马甲运动(gilets jaunes)<sup>[50]</sup>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重大社会运动。法国基本上经历了一场不间断的社会起义[从2018年到2020年3月，2020年9月又重新开始，尤其是2023年1月的养老金改革罢工]。因此，我们试图总结这两波斗争，认为大流行病并不一定会改变这些运动的性质。仍然有大规模起义出现，包括印度的大罢工。在拉丁美洲，包括智利和其他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大流行病时期的斗争连续性。因此，《前进吧，野蛮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盘旋待降》的更新，以表明我们仍处于《盘旋待降》中所描述的斗争周期中。它并没有消失。它是斗争的积累，而斗争仍在继续。

我们还试图绘制一张损益表，以扩展之前对这些斗争性质的分析。因此，我们有一些在《盘旋待降》中没有讨论过的关于议会层面的东西要谈，因为当时它们还没有发挥出来：这些斗争如何影响议会政治，尤其是在欧洲，以

及如何在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包括智利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

这篇文章涉及的另一政治问题是新冠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这并不是说应对措施简单地粉碎了一切，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运动的终结——除了香港等少数几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应对新冠的措施确实在粉碎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冠的应对措施被用于镇压目的并不完全成功。它并没有变成福柯式的、无所不知的生物权力，可以完全关闭一切。相反，它只是一场更为漫长的冲突中的一个瞬间，给资本和国家带来了一些帮助和力量，但也为全世界的民众动员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前进吧，野蛮人！》是一种尝试，试图从左翼一些措辞不当、狭隘两极化的辩论中退后一步，只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世界还没有终结！”。《盘旋待降》中的分析仍有可取之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理解这一轮斗争，我们认为这一轮斗争真正开始于 2008 年，并持续至今。这是对时间进行阶段性划分的一种方式，可以更新《盘旋待降》，然后将我们之前未曾讨论过的新的政治形式引入讨论，例如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在美国乔治·弗洛伊德叛乱（the George Floyd Rebellion）中出现的**废除主义**<sup>[51]</sup> 政治，并试图将这些政治置于更广泛的弧线之中。

**T:** 2024 年，你会如何更新现在的轨迹？

**J:** 这是一个有趣的大问题。[……] 我们肯定会强调“更多相同”的方面。《前进吧，野蛮人!》的创新之一是，我们采纳了阿塞夫·巴亚特（Asef Bayat）对“阿拉伯之春”的分析，认为这为思考疫情期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非运动”的概念及其产生的混乱——对统治秩序的混乱，对 2008 年前的政治条件的不断破坏，“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我们能行”（Podemos）之类的“后起之秀”党派<sup>[52]</sup>的崛起，这些都并不持久，对吗？[……] 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政治激烈动荡的时代，在议会层面，我们认为这反映在支持传统议会政治的力量平衡，即工人运动在议会中的悠久遗产，走向了终结。因此，我们进入了这个混乱的时代。这就是《前进吧，野蛮人!》的论点。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政治秩序来重新稳定资本主义政治。我们认为，这某部分是因为再也不存在能够稳定增长的增长轨迹。

因此，停滞是《前进吧，野蛮人!》的核心经济概念。我们借鉴了我们过去在停滞问题上所做的大量工作，以阐明为什么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还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今的政治。停滞是理解我们经济阶段的最佳方式。而混

乱则是这一事实在政治上的表现。因此，每当有新政府上台，人们都希望他们能确保走出停滞的增长轨迹，但他们总是失败。因为他们总是失败，所以新秩序总是崩溃。它永远无法自我稳定。因此，我们看到智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地出现了许多新的左翼政府，但它们都垮台了。现在[2024年]，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看到许多新的右翼政府出现，我们的假设是它们也会崩溃，但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是说新秩序不能自我稳定，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担心国民阵线在法国获胜后会发生什么。这是欧洲乃至世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但更大的赌注是，极右翼找不到稳定混乱局面的办法，因为他们无法提供他们本应提供的东西，而每个人最终都希望从一个本应帮助他们的政党那里得到这些东西：通过某种增长途径实现经济安全。[……]

## 八、下一步怎么走？

**T:** 也许我们可以在采访的最后谈谈《尾注》第6期的计划？我一直以为《尾注》已经结束了，不会再有新的刊物，但最近才知道我错了。

**J:** 似乎很多人都有这种印象！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不会发生，我们可能最终会做一个系列图书。但我们肯定有第 6 期的计划。我们想写一篇关于人口变化的长文，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过剩人口的动态与人口增长下降之间不可预知的互动方式，其对生态和经济的影响。我们几个人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想发表一些文章。

此外，我们还计划更新《前进吧，野蛮人！》，我们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性别的逻辑》的作者也准备了一些新的材料，这是对这篇文章及其接受情况的一种反思。

然后，我们有保罗·马蒂克的文章，其中一部分最近以“卷宗”（dossiers）的形式命名为《年轻的马蒂克：1924—1934 年的早期著作》在网站上发表<sup>[53]</sup>。我们还有许多马蒂克著作的其他译本，来自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sup>[54]</sup>的玛丽写了一篇关于马蒂克早期作品的精彩长文。我们希望将其收入马蒂克著作集。

问题是，每个人都非常分散，忙于其他事情，或者他们已经成为学者，不得不以自己的名义在其他地方发表文章。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但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不做《尾注》的压力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处于停刊状态，因为我们想扩大规模，吸收新的成员，

但要做到这一点一直很困难，所以我们仍在努力巩固我们的新成员。因此，写作和出版的工作似乎仍在我们的掌控之外，但我们也在谈论这套书，它可能是第 6 期的替代品。

**T:** 网站上所谓的“卷宗”系列是什么？

**J:** 第一份“卷宗”是发表在第 5 期中的，关于乔治·切萨拉诺（Giorgio Cesarano）[以及意大利 1970 年代由博尔迪加主义和情境主义圈子出现的“激进批判”思潮的介绍和选译] 的增刊。<sup>[55]</sup>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在这一期中可以开辟一个新的栏目，其中的内容不是自己写的，也不完全属于平时讨论的脉络，而是一种“增刊”。是刊物的一部分，但是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已经印刷的只有那一份关于切萨拉诺的，但后来在网站上也加了一个“卷宗”的栏目，在那里就发表了一份关于乔治·弗洛伊德叛乱的卷宗<sup>[56]</sup>、一份关于 [去年去世的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家] 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的<sup>[57]</sup>、还有那一份关于马蒂克的。

[第一份在网站栏目中发表的] 关于乔治·弗洛伊德叛乱的卷宗，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当时 [2002 年] 正值骚乱两周年，我们既然已经收集了 [朋友写的] 几篇文章，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出版第 6 期刊物，所以我们就决

定先把这些文章以卷宗的形式发在网上。于是这种做法固定了下来，就像是每期刊物出版期间随时可以网上发表的小型杂志。所以我们发布了大量与我们分享的特龙蒂作品的译文，然后我们又做了年轻马蒂克的文本。现在我们即将发表一份关于中东〔包括巴勒斯坦〕的卷宗，计划用几篇新的法文和阿拉伯文的译文章来扩充内容，其中包括穆斯塔法·哈亚提（Mustapha Khayati）、迈克尔·修拉（Michael Seurat）和阿玛迪奥·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的作品<sup>[57]</sup>。

**T:** 说到马蒂克，你之前提到了与《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有关的工委共产主义传统对如何应该参与斗争的理念。这个传统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理念本身，以及它与《尾注》在“实践”方面的关系？

**J:** 我认为我们开始思考工委主义如何参与斗争的时间点是2000年代初，当时〔仍在《扬弃》的〕我们与〔德国工人主义〕团体科林科（Kolinko）<sup>[59]</sup>就**工人调查**计划进行了多次讨论。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参加了他们邀请在呼叫中心开展的调查项目，并参与了“调查是什么？”的讨论。调查是为了（1）发现特定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并了解该工作场

所的关系吗？又或者它是为了（2）帮助其他工人理解这个他们没有参与的特定工作场所发生了什么？还是（3）让已经在该工作场所的人开始与进行调查的运动家交谈，开始质疑他们的工作场所，质疑他们与其他工人的关系，从而可能在该工作场所引发一些事情？因此，你大致上可以有三个版本的调查。第二种，即调查的作用是向其他工人传播关于某个特定工作场所的信息，我们认为这是工委主义的方法。

**T:** “无产阶级的邮递员”，对吗？

**J:** [在 1920 年代初的] 许多德国工委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组织的。他们更多参与实际干预。但在 1920 年代末，围绕马蒂克和来自荷兰的工委主义者，出现了一种采取更激进的反干预主义（*anti-interventionist*）路线的趋势。这种反干预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论革命团体的无能》<sup>[60]</sup>一文，我们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中大量借鉴了这篇文章，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篇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有助于阐明贯穿法国工委主义的整个方法。例如，亨利·西蒙（*Henri Simone*）、《交流与运动》（*Echanges et Mouvement*）、卡约·布伦德尔（*Cajo Brendel*）——所有这

些参加了与科林科关于调查性质的讨论的团体，都持有这种激烈的反干预主义立场。这就是他们的批评：科林科认为调查是一种干预，他们认为调查的目的是改变被调查对象的思想。亨利·西蒙（Henri Simone）等人在讨论中提出的论点是，这与列宁主义相去不远，因为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让无产阶级觉醒”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影响我们思想的工委主义传统是对立的。

[在《尾注》成立之后，]我们的方法变得更像“既不是[版本(2)，邮递员]，也不是[版本(3)，干预主义]”：我们的立场更像是版本(1)：嗯，这就是好的社会学，对吧？完全没有坏处。你了解工作场所发生了什么。你不需要扮演“革命邮差”的角色，你也不一定能改变工人在组织方面所面临的限制，但你会产生非常好的社会学成果。当然，这对科林科这样的团体来说是一种反面的恭维，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学家。但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我们觉得他们的工作非常有用。这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干预，而工委主义版本的调查也只会某些革命形势下才起作用。但这仍然是值得的，因为它能让我们了解工作场所的动态，而大多数当代社会学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提出这一论点的文章实际上发表在《扬弃》上。

我们中的一个人写了一篇名为《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说话》的文章评论科林科的书 [《热线：呼叫中心、调查、共产主义》] <sup>[61]</sup>，其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也没有采取这种工委主义的路线。它没有说“革命者的唯一职能就是把不同的工作场所连接起来”——这是亨利·西蒙的立场。我们与他进行了对话，但从《理论》那里，我们也逐渐认识到了 [西蒙的工委主义] 的局限性。将活动家视为邮递员的概念最终会成为另一种陷阱。在《我们少数不快乐的人》中，我们探讨了西蒙对“自发群体” (spontaneous group) 和“意志群体” (willed group) 的有趣区分。“自发群体”是在斗争中才形成的群体；“有意志的群体”是一直存在的：总有一群自我组织起来的“革命者”。而工委主义者对意志群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施加了很多限制。我们不认为这些限制有多重要。因此，我们并不是在为工委主义者的反干预主义路线辩护，但我们确实认为工委主义者正确地指出了意志团体中非常常见的自欺欺人现象。这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形式就是列宁主义，但你知道，我们遇到过许多也有类似的自欺欺人能力的安那其主义团体。因此，这并非列宁主义所独有。这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团体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征，他们夸大自己的重要性，把自己做的事情想象得比事实要多得多，而且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没有

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从哪里出发的。[...]

**T:** 当你们将自己与科林科这样的团体区分开来时，后者主张第三种、西蒙娜称之为“列宁主义”的更具干预性的调查方法，你们会将其称为一种自主主义的观点吗？

**J:**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产生于 1980 年代德国版本的自主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革命组织的愿景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近年通过 [一个部分脱胎于科林科的名为]“愤怒工人”[的团体]工作，他们在拉拢人们加入并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倾向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对这种倾向非常感兴趣，并谨慎地表示支持。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调查愿景颇为批判，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也曾试图实现这一愿景，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就他们的观点写点东西，我们的批评会少一些。

**T:** 在参与斗争这个问题上，你如何描述《尾注》的观点？你说过成员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听起来似乎每个人都会同意，你们一方面不是反干预的，但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对你们可能会参与的行动的意义抱有幻想？

J: 我可以给你指出《理论》中的一段话，这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经常出现：“直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既不是工人运动的孤儿，也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先知；我们参与阶级斗争的方式是根据它每天存在的形态，以及根据它所产生的理论。”<sup>[62]</sup> 这几乎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它很含糊，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会参与其中，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种参与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我们甚至不排除“愤怒工人”在党建方面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只会提醒他们注意《理论》所指出的双重危险：就是把自己当成给工人阶级带来重要意识的先知的危险，或者成为死气沉沉的组织形式的孤儿的危险，我们不要无休止地从这些组织形式中吸取同样无用的教训。

因此，这两种概念——既非先知也非孤儿——涵盖了我们认为左翼在参与斗争方式上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又不限制我们认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但要意识到，我们的参与并不是让那些斗争克服自身限制的某种关键。斗争本身产生理论——这是最后一句话，也是它变得有点元理论的地方：我们是理论家，因为我们关心理论，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不是理论家，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理论只是从我们内心涌现出来的。我们认为，意识和理论是鲜活的、真实的，存在于人与人

之间的——它存在于斗争之中，并由斗争产生，对吗？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如何认识自己，是最终唯一重要的事情，而我们在写下东西和与其他人交谈方面所做的只是其中非常次要的一部分，而且将永远是其中非常次要的一部分。

### [注释]

[1] 关于“一切归于大家”这一共产主义口号，见《一切归于大家：墨西哥萨帕塔主义作品选译（1997—2015）》（DGT, 2024），以及《毛的中国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吗？》。

[2] 《尾注》的作品还没有专门探讨共产主义生态学，但是在其他话题的讨论也经常提起这一重要方面（如《尾注》第5期的社论和第3期《物流、反物流以及共产主义的前景》两篇文章）。关于马克思对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社会新陈代谢的分析（包括资本主义如何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以及共产主义如何能回复可持续的社会新陈代谢），中译本可见《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及《人类世界的“资本论”》（斋藤幸平著，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3] 在本书中以**粗体**标出的单词可以在第三卷《附录：术语表》中找

到说明。关于“共产化”（communization）思潮，又见第一卷《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

[4] 关于“性别、家庭的消灭”（the abolition of gender and the family）见术语表、第一卷《性别的逻辑》和第三卷《家庭会被消灭吗？》。

[5] 关于无产阶级中被资本对待为“过剩人口”（surplus population）的部分、同时出现的“过剩资本”（surplus capital）以及两者背后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本访谈下文有介绍。细节见术语表、《贫苦与债务》、《盘旋待降》和《前进吧，野蛮人！》。

[6] 关于“种族化”（racialization）见术语表和《布朗诉弗格森案》。

[7] 关于“价值形式理论”，见术语表和《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

[8] 引自“About Endnotes”，endnotes.org.uk。关于二十世纪革命失败的分析，见术语表关于“革命地平线”（revolutionary horizons）的说明和第二卷《一分离的历史》。

[9] 即 class struggle anarchism。本书一般用“安那其 / 安那其主义”来翻译 anarchism，又可译为“无政府主义”或“无治主义”。

[10] 引自“About Aufheben”（2006），libcom.org/about2。关于“自主运动、自主主义”（autonomia、autonomism，“自主”又译“自治”）、“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和“左翼共产主义 / 共产左翼”（left communism）见术语表。

[11] 关于这方面的现有尝试，请参阅《闯》的作品，其中的中文版可见 [chuangcn.org/languages/#Chinese](http://chuangcn.org/languages/#Chinese)。

[12] 1989—1990 年的反人头税运动被称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最高峰有 1700 多万人参与”。详见 Danny Burns 著 *Poll Tax Rebellion* (AK Press, 1992)。1989 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将传统的通过财产税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的“国内税率”制度改为“人头税”制度，即每个成年人无论收入多少，都必须缴纳基本相同的税率。在一个全国性联合会的协调下，出现了许多抗议新制度的地方团体。当工党拒绝支持抗议行动时，这场运动发展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导致了 6000 多次行动，包括几个城市的骚乱，并最终恢复了与旧制度类似的以财产为基础的制度。这场运动在迫使撒切尔辞去首相职务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13] 这里的“开放”一词指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式批判性参与，与较为僵化和教条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1992 年和 1995 年，Pluto Press 出版了 *Open Marxism* 三卷本，由维尔纳·博内菲尔德 (Werner Bonefeld)、理查德·冈恩 (Richard Gunn)、约翰·霍洛韦 (John Holloway) 和科斯马斯·佩尔科佩迪斯 (Kosmas Psychopedis) 编辑，是与这股思潮相关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集 (第四卷于 2019 年出版，收录了更多来自拉丁美洲的稿件)。丛书的简介提出了界定这一广泛趋势的一种方法：“开放马克思主义旨在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概念化为一种斗争理论，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对资本主义统治进行客观、恒定的分析。”

[14] “Auto Struggles: The Developing War Against the Road Monster”,

《扬弃》第3期（1994）。

[15] “‘夺回街道’不仅要打击道路建设，还要打击与之相关的生活方式；其积极分子将这种生活方式视为资本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开始支持反对资本的工作场所斗争，如信号工人和地铁司机的罢工。”引自《扬弃》1994年的小册子“The politics of anti-road struggle and the struggles of anti-roa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No M11 link road campaign”，重新发表于 George McKay（编）*DiY Culture: Party and 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London: Verso, 1998）。

[16] “战术多样性”是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反全球化运动期间在英语左翼激进派圈子中兴起的一个术语，至今仍有影响力。它指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明确的约定，也可能没有），允许联盟中的不同团体和个人采用自身偏好的战术，作为实现联盟整体共同目标的手段，无论这些战术是否冒犯了其他团体的敏感性。例如，本文提到的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抗议活动（这是反全球化运动的关键时刻，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普及该运动，并为未来的抗议活动定下基调），其理念是，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暴力”的抗议者愿意参与一场包括其他采用破坏财产作为战术的抗议者在内的运动，但不允许故意伤害生物。除了这些道德方面的考虑，“战术多样性”还指更具政治性的原则，即不同的团体在撇开哪一种战术更有效的问题后（例如罢工、封锁、街头示威、占领公共或私人财产、公开或秘密破坏财产、写信给政府官员）可以更有效地合作。

[17] 根据《扬弃》在 1998 年的分析，工党在首相托尼·布莱尔（他力图使新自由主义比其前任撒切尔更容易为工人阶级所接受）领导下实施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不仅是对失业者状况的攻击，而且还通过工作替代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工资水平进行了攻击”，该计划也是“重新强制推行职业道德运动的一部分。它是政府的旗舰政策，是‘改革’福利国家原则的核心”。引自《扬弃》在 1999 年出版的小册子 *Dole autonomy versus the re-imposition of work*，该小册子还批判性地报道了到那时为止反对该计划的斗争。

[18] “We Unhappy Few”，《尾注》第 5 期（2019）。

[19] 《扬弃》第 11 期发表了《理论》批判的英文译文和它的理论背景简介“Intakes: Communist Theory—Beyond the Ultra-left”（2003）。

《扬弃》的回复和《理论》的反驳分别发表于第 12 期（2004）和第 13 期（2005）。交流的结论是：“我们原计划为《理论》的回应发表一篇简短的导言，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尤其是结尾处的‘主观臆断’依次作出回应；但我们未能达成一致。此外，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翻译材料来理解具体的理论立场如何与《理论》的整体理论相一致，以及他们提出立场的抽象表述是如何具有理论基础的，或者是如何通过详细的具体分析得出的。”这标志着《尾注》的开始，访谈下文有介绍。

[20] 关于“纲领主义”（*programmatism*），见术语表和《一部分离的历史》。

[21] “那些自认‘革命派’的人，不论自称共产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都花了许多时间检视过去的背叛，并往往是事无巨细，以判定这些背叛究竟何以发生。这些检视有许多试图挖掘历史的指路红线，也就是那些英雄般忠于革命的一代代个人或者群体。他们的存在在本应证明，不背叛是可能的，因此只要掌舵的是正确的群体，或者只要在恰当的时机把错误的群体推到一边去，革命本可以成功。一个人成为共产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以用哪条线编制自己的旗帜为基础的（今天人们挥舞这些旗帜，通常不是以诚挚认同的身份为基础，而是友谊的偶然性使然）。不过，不管升起了什么旗帜，革命分子还是没能看到他们尊崇的团体当时要切实回应的局限——也就是恰恰使他们成为少数派组织的局限。革命分子迷失在历史中，他们参照一个与当下现实不相关的斗争语境来界定自己。他们的界线，画在了早已不再的沙子之上。”引自本书第二卷《一部分离的历史》。

[22] 《共产主义理论》（简称《理论》，缩写 TC）是一个法国团体，于1970年代初从1968年**五月风暴**后**情境主义**等**极左**圈子中出现。他们最初受到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关于**形式和实际从属**的著作的影响，但拒绝接受卡马特的人本主义转向。数十年来，《理论》出版了大量著作，重点是理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这些变化对要消灭这种关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23] 吉尔·多维（生于1947）是法国理论家，他的作品试图融合**工委共产主义**和**博尔迪加主义**两个传统，也在与《理论》等团体的辩论

中反思了五月风暴和 1970 年代工人占领工厂的失败。他最近的著作《从危机到共产化》(*From Crisis to Communization*)已有中译,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文库: [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gilles-dauve-2019/index.htm](http://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gilles-dauve-2019/index.htm)。

[24] “‘好的’对话是好的而不是‘令人失望的’——它不只是喋喋不休地争论事实,也不只是退缩到无实体概念的游戏中——因为它,而且只有它,能够让对话伙伴以一种让每个伙伴的所有事情都发挥作用的方式,相互挑战、相互学习。[……]倘若‘对话’这一概念似乎过于礼貌,无法捕捉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仇恨概念,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什么比严谨的对话更不礼貌了。”出自 Gunn 的“Marxism and Philosophy”,引自“*We Unhappy Few*”,《尾注》第 5 期(2019)。

[25] “Normative History and the Communist Essence of the Proletariat”,《尾注》第 1 期(2008)。

[26]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是马提尼克岛的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和革命家,他的工作集中在殖民化的心理影响和解放斗争上。在这里,“法农主义”一词可用来描述对被认为对资本主义积累“过剩”的种族群体的种族化的政治分析。法农的分析表明,这些被种族化的过剩人口,常常受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压迫和剥削,可能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新的无产阶级先锋。这一理论与类似美国黑豹党的政治结论联系在一起,后者受到法农思想的启发,特别是他强调受压迫的人民需要通过任何必要手段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和

争取解放的观点。

[27] “An Identical Abject-Subject?”, 《尾注》第4期（2015）。

[28] 关于“(无产阶级的)分解”(decomposition), 见术语表和《盘旋待降》。

[29]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Crisis-Era Struggles in Britain”, 《尾注》第3期（2013）。

[30] “Picket and Pot Banger Together: Class recomposition in Argentina? ”, 《扬弃》第1期（2003）; Roland Simone (《理论》成员), “Self-organisation is the first act of the revolution; it then becomes an obstacle which the revolution has to overcome”, 《国际共产主义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pour la Communsation*, 2005)。

[31] Bar-Yuchnei, “Two Aspects of Austerity”, Endnotes blog (2011)。

[32] 例如 Roland Simone 的 “Distinction de genres, programmatisme et communsation” 及两个附录, 《理论》第23期（2010）。附录的英译题为“Gender-Class-Dynamic”和“Comrades, but Women”, 2011年由 Pétroleuse Press 出版。三篇文章的英译均可在 Libcom.org 查阅。

[33] P. Valentine 在 *Lies* 第1期（2012）写的 “The Gender Distinction in Communsation Theory”总结了这一争论: [liesjournal.net/volume1-12-genderdistinction.html](http://liesjournal.net/volume1-12-genderdistinction.html)。

[34] 关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在华语世界的介绍, 见《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副本制作, 2017), 或

[gongchao.org/cn/gongrenzhuyi-ji-qi-pipan](http://gongchao.org/cn/gongrenzhuyi-ji-qi-pipan)。

[35]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生于1942）是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的共同发起人，但她现在更以历史著作而闻名，作品包括2004年出版的 *Caliban and the Witch*，中译《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上海三联书店，2023）。

[36] “广场运动”指2010年代初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包括“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占据公共广场的时间长达数月。《盘旋待降》对此进行了分析。

[37] 关于“（无产阶级）构成问题”，见术语表和《盘旋待降》。

[38] “取消主义”（又译“消除主义”）主张应彻底消除种族概念的立场，认为种族只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生物现实基础，只会压迫那些被种族化的群体。

[39] 保罗·马蒂克（1904—1981）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工委共产主义运动起了关键作用，在1920年代初参加了德国共产工人党。他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在成为职业革命者和作者之前是一名金属工人和机械师。1926年逃亡到美国后，他共同创办了《国际工委通讯》（*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杂志，并撰写诸如《马克思与凯恩斯：混合经济的限制》（1969）、《反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1978）等有影响力的著作。他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反对先锋党模式，主张以工委为基础的分权式共产主义过渡。他还分析了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及它们引发革命动乱的潜力。

[40] 该文章写于 1978 年，发表在他的儿子小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Jr.）编辑的马蒂克文集 *Marxism: Last Refuge of the Bourgeoisie?*（Routledge, 2013）。

[41] “Spontaneity, Mediation, Rupture”，《尾注》第 3 期（2013）。

[42] 雅克·卡马特（生于 1935）是法国理论家，出身于与博尔迪加有关的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传统，但在 1970 年代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在马克思主义共产化倾向（也包括《理论》、多维和《尾注》）和反文明安那其中产生了影响。

[43] Mike Macnair, *Revolutionary Strategy: Marx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Left Unity*（November Books, 2010）。

[44] “对我们来说，谈论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就像谈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一样毫无意义。事实上，唯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提到的那个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 因此，经济是建立在逻辑矛盾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发展为不自由，发展为人实际上不可能成为他们必须成为的人。”随后，第 3 期的社论指出：“‘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概念似乎完全是毛主义的产物。”在一个被翻译成英语的“矛盾”案例中，德语术语实际上是 *Gegensatz*（对立），而不是 *Widerspruch*（矛盾）。引自“Editorial”，《尾注》第 3 期（2013）。

[45] “The Moving Contradiction: The Systematic Dialectic of Capital as a Dialectic of Class Struggle”，《尾注》第 2 期（2010）。

[46] “无阶级社会之友”（*Freundinnen und Freunde der klassenlosen Gesellschaft*）是德国柏林团体，与其他几个反权威共产主义团体合作出版德语杂志 *Kosmoprolet*，2007 年创刊。根据他们的自我描述，“（*Kosmoprolet*）不信奉任何特定的传统，而是从共产主义左翼持不同政见的部分以及将自主与国家崇拜和政党拜物教对立起来的激进运动中汲取历史影响”，该杂志“旨在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体。无论是工会还是左派政府，只有工人自己才能通过集体夺取生产资料并从根本上改造生产资料，创造一个没有雇佣劳动和国家、剥削和统治的世界，从而摆脱苦难。这必然包括家务劳动、育儿和其他主要分配给妇女的领域的革命化”，见 [kosmoprolet.org/de/ueber-uns](http://kosmoprolet.org/de/ueber-uns)。

[47] “Revolutionary Motives”，《尾注》第 5 期（2019）；“Logistics, Counterlogistics and the Communist Prospect”，《尾注》第 3 期（2013）。

[48] *Activist* 又译“（社会）活动家”或“行动家”，这里借用了香港的术语“社运圈”。除了“*We Unhappy Few*”，另一篇分析“行动主义”较有影响力且有中译的是英国极左小册子《放弃社运！》（*Give up activism*，2001），见 [libcom.org/article/fangqisheyun](http://libcom.org/article/fangqisheyun)。

[49] 关于“工委共产主义”（又译为“委员会共产主义”，简称工委主义 [councilism]），见术语表。它是二十世纪“左翼共产主义”传统两大分支之一（另一支为博尔迪加主义 [Bordighismo]），最初源于马蒂克等德国和荷兰斗士由参与德国工人革命经验得出的结论。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工人斗争中工人自我组织的机构（即“工人委员会”

[workers councils], 又称“工人大会”或“苏维埃”[soviets]) 需要成为革命载体, 替代工会、企业和国家机器来指导革命过度, 包括期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任务, 直到反革命力量消失为止, 要形成暂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民主形式。

[50]“黄马甲运动”(又译“黄背心运动”)于2018年10月在法国兴起, 是对马克龙总统提出的燃油税上调计划的回应, 旨在撤销燃油税上调, 增加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的购买力, 并要求马克龙辞职。它主要由来自农村和郊区的工人阶级组成, 包括了抗议、路障设置以及占领公共空间等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 重新点燃了2010年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全球斗争浪潮。运动在新冠疫情初期暂时停止, 但由于疫情对已经脆弱的人群造成了经济冲击, 它在2020年夏季重新获得了动力。细节与分析见“Editorial”, 《尾注》第5期(2019)。

[51]“废除主义”(abolitionism)指的是围绕争取废除警察与监狱的政治理论和实践, 细节见术语表和《前进吧, 野蛮人!》。

[52]“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我们能行”(Podemos)是分别在希腊和西班牙、起源于2010年代初广场运动的新党派。它们吸引了来自活动家背景的领导人, 如希腊的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和西班牙的帕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 两人都具有工人阶级背景, 并且有左翼和社会运动活动的经验。尽管最初曾引起乐观情绪, 但这两个党派最终未能实现其变革的承诺。“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上台执政后屈服于国际债权人的要求, 实施了严厉的

紧缩措施，背叛了许多支持者的希望；同样，“我们能行”2014年在西班牙取得了选举成功，但难以将其基层活动转化为有意义的政治变革，并面临内部分裂和挑战。

[53] 见 [endnotes.org.uk/dossiers/the-young-mattick](http://endnotes.org.uk/dossiers/the-young-mattick)。

[54] 关于社会研究新学院，见 [isr.press](http://isr.press)。

[55] “The Passion of Communism: Italian Invariance in the 1970s”，《尾注》第5期（2019）。

[56] 见 [endnotes.org.uk/dossiers/that-summer-feeling](http://endnotes.org.uk/dossiers/that-summer-feeling)。

[57] 见 [endnotes.org.uk/dossiers/mario-tronti](http://endnotes.org.uk/dossiers/mario-tronti)。

[58] 这一“卷宗”的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了，见 [endnotes.org.uk/Dossiers/waiting-for-the-barbarians](http://endnotes.org.uk/Dossiers/waiting-for-the-barbarians)。

[59] 科林科团体脱胎自德国1980年代的“自主”或“自治”（德语 *Autonomen*）运动，于1990—2000年代带头发掘并更新1960年代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理论与实践，包括一套特别的**工人调查**方法。德国“自主运动”与1970年代意大利“**自主运动**”（意大利语 *Autonomia*）有复杂的重叠关系，也可以说是工人主义与自主运动之间的关系，细节见术语表。

[60] “On the Impotence of Revolutionary Groups”，Sam Moss，首次发表于 *Living Marxism* 第4.7期（1939）。

[61] *Hotlines: Call Centre, Inquiry, Communism*（科林科，2002）的英文版见 [libcom.org/article/hotlines-call-centre-inquiry-communism](http://libcom.org/article/hotlines-call-centre-inquiry-communism)；“We

Have Ways of Making You Talk”, 《扬弃》第 12 期（2004）。

[62] “Intakes: Communist Theory—Beyond the Ultra-left”, 《扬弃》第 11 期（2003），见 [libcom.org/library/beyond-ultra-left-aufheben-11](http://libcom.org/library/beyond-ultra-left-aufheben-11)。



# 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

Communisation and Value-Form Theory

2010

---

发表于《尾注》第2期。

## 引子<sup>[1]</sup>

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sup>[2]</sup>

我们在《尾注》第1期中描述了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法国“共产化”（communisation）理论的涌现。本期将在这个共产化的视觉下操作，但是也高度依赖马克思学的价值形式理论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涌现的“系统辩证法”趋势。<sup>[3]</sup>

马克思很清楚自己方法的特别之处，清楚自己的方法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延续，是因为价值形式的分析。他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里写道：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这些形式<sup>[4]</sup>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家们<sup>[5]</sup>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sup>[6]</sup>

尽管马克思有这样的声明，但是价值形式与拜物教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人类被自己活动的结果所宰制（dominate）这一反转——在1960年代以前阐释《资本论》的过程中没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学”强调的是《资本论》第一章头两部分外表简单的论述：劳动被认定为隐藏在商品价值背后的东西。这一章的后两部分——关于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的部分——则常被当作是对市场的一种或多或少裹搅的描述，于是匆匆带过。因此，马克思虽然将自己的理解与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仔细区分开，这种区分却没有得到探究。<sup>[7]</sup>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们是站

在实体<sup>[8]</sup>的量和价值量角度，而不是在价值形式的质的角度。为了与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资产阶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马克思主义者就倾向于牢牢把持这样一种经典立场，即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而价值是体现在产品之中的劳动。马克思主义者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无法处理社会的还原（reduction）过程的特异性，而这是对比具备量的性质的数量所必需的条件。换句话说，他们同样没有去问，为什么劳动显现在自己的产品的价值形式当中。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说明的那样，只有理解了价值形式的细微之处，我们才能够理解随后的货币和资本形式，或者理解人类活动何以采取资本积累的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之中劳动二重性质的表现：具体劳动性质显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中，抽象劳动性质显现在价值形式之中。虽然抽象劳动在历史上为资本主义特有，但如果无法恰当区分劳动这两个方面，价值形式就会被理解为简单自然的人类劳动如此本身的表现。成为价值的质料或者实体的劳动，我们将之看成生理劳动，这种劳动和自身的社会形式相独立。实体在这里被理解为天然身处于对象之中的东西，但是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和价值的特殊性不仅如此。价值是一种关系或者过程，通过不同的形式展开自己、维系自己——这一刻是

货币，下一刻是构成劳动过程的商品（包括劳动力这种商品），再下一刻是商品产品，然后又又是货币——在这期间，价值在货币形式当中维系与自身商品形式的关系，反之亦然。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是劳动在商品中的体现，也不是一个原地不动的实体。价值是一种关系或者过程，宰制价值的承担者：这一个实体同时也是主体。不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不承认“抽象劳动”是一部分人类活动的社会和历史特有的形成过程，其中暗含的结果，是人类被转换为如此活动无限增长所需的资源，而活动的结果也成为自在的目的。这种将价值视为（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强加于某种天然成立的质料之上的形式的理解，与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组织下同一套产业劳动分工的国家指导版本的展望不谋而合。在这种理解之下，原来在资本主义之下受市场形式制约的劳动在社会主义中会变成有意识的社会组织原则。

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价值形式和拜物教，不过俄罗斯经济学家伊萨克·鲁宾（Isaak Rubin）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在鲁宾 1920 年代写成的开创性著作中，他承认“拜物教理论本身是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系统的基础，尤其是价值理论的基础”，<sup>[9]</sup> 并且作为价值内容的抽象劳动并不是“形式从外部依附的什么东西。不如说，内容本身经过自身发展后，

催生了早已隐藏在内容之中的形式”。<sup>[10]</sup> 不过，鲁宾的作品在俄罗斯被查禁，可以说依然不为人知。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资产阶级批评家认为马克思本质上是李嘉图的追随者，这个事实无需争论。不如说，他们正是以此为基础捍卫马克思的：他正确梳理了李嘉图将劳动承认为价值内容、将劳动时间承认为价值量的思想——只是又加了一些多少左翼李嘉图式的剥削理论。如此看来，劳动就是一种近乎自然主义一般存在于产品之中的东西，而剥削就成为这种产品的分配问题，由此推断出资本主义的“药方”就在工人身上，在于工人通过国家或其他手段让分配更偏袒自己。如果剥削是社会产品被寄生虫一般的统治阶级抽取掉一部分的问题，那社会主义就不一定非要实质性更迭商品生产的形式，而只需要把这种形式接管过来，消灭掉寄生阶级，然后平均分配产品。

## 共同背景

这种解读《资本论》时把形式和拜物教隐匿掉的做法，要到1960年代中期以后——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鲁宾的作品重新挖掘——才遭遇各种不时冠以“价值形式理论”名称的路径严肃挑战。价值形式的细微之处、方法相关的问

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等等，这些争论的涌现与共产化理论登场恰逢同时。价值形式理论和共产化都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典范阐释的不满，因而抗拒“正统”或者“传统”马克思主义。<sup>[11]</sup>对我们来说，价值形式理论和共产化理论之间存在隐含的共通性，使得两者可以建设性地互相启明。我们将在此处考察这两个趋势之间在历史上的并行之处和交汇点。

19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世界层次的资本主义具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极端的社会运动特征：从美国的城市起义到波兰的暴动罢工，从学生运动和“青年叛乱”，到工人的骚动推翻民选与非民选政府。现行获接纳的关系受到了质疑，并且家庭、性别与性、心理健康，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都在社会中也受到全面的质疑。和这些斗争互相纠缠的战后繁荣期出现高通胀和失业率上升，以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告终。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超越和东方国家给出的伪替代性方案，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价值形式理论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化理论两者的出现，是以上述斗争及其所产生的革命希望为前提的。正如这两股趋势出于同一时局一样，它们也与制造它们的斗争浪潮同时消退。70年代的积累危机没有引发斗争的加剧，没有导致斗争向革命的方向发展，而是助长了一次极

端的资本主义重构，使得相关联的运动和革命预期全方面溃败。这种重构导致了上述讨论相对的式微。法国对共产化的讨论在 70 年代初出现，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消退，然后在最近重新浮现。同样，当代对“系统辩证法”的兴趣在许多方面上都是在回归 70 年代关于价值形式的争论，只不过这些讨论在 70 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陷入了相对的沉寂。

## 共产化

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sup>[12]</sup>

共产化理论出现的时候是一种批判，其批判对象是各种继承自第二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革命认知，以及运动中的异议趋向和反对声音。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失败的经验似乎端出了一个本质问题：工人能否或者

应否通过党和国家（列宁主义、意大利共产左翼）还是通过生产节点上的组织（无政府工团主义、荷兰—德国共产左翼）来行使权力？一方面，有人会宣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错失革命机会，正是因为党不在场——或者说正确类型的党不在场；而另一方面，其他人会说正是党和革命的、“国家主义”的、“政治”的概念在俄罗斯失败了，并在其他地方发挥消极作用。

共产化理论的发展者抗拒这样以组织形式来安放革命的倾向，转而瞄准通过革命内容来把握革命。共产化暗含一种态度，就是拒绝将革命视作工人在获得权力之后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的事件：相反，我们应该将革命视作以无中介（immediate）的共产主义措施为特征的运动（比如免费分配生活必需品），这样做既是措施本身的特征使然，也是摧毁反革命的物质基础的一种方法。革命以后，如果资产阶级财产被没收，但是工人依然是工人，依然在不同企业进行生产，生计依然依赖自己与工作场所的关系，依然与其他企业交换，那么，不论这种交换是工人自我组织还是由“工人国家”给予集中指导，都意义不大：资本主义的内容依然，资本家的独特角色或者功能迟早会重新自我树立（reassert）。作为共产化运动的革命则截然不同，它将不再构建和再生产所有资本主义范畴，从而摧毁它们：交换、

货币、商品、不同企业的存在、国家，还有最根本的雇佣劳动和工人阶级本身。

共产化理论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了用另一套组织形式（民主、反威权、工委会）来反对列宁主义的党国模式的做法，还没有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原因在于，这种关于革命的新思考出自当时走到前台的阶级斗争特色与形式（比如毁坏设备、缺勤和其他抗拒工作的形式）以及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运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在拒绝肯定（affirmation）工作，拒绝肯定工人身份是革命的基础。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作品是共产化观点发展的一大刺激。秉持着植根于日常生活转型的总体革命的视角，情境主义国际已经感受到并理论化了斗争所表现的新需求，因此人们在之后承认他们最能预示和表现 1968 年法国事件的精神。

但是，如果共产化的概念从某种角度来看是当时斗争和局势发展的产物，那么法国的氛围使这个概念得以表现的能力也离不开对马克思的回归，尤其离不开诸如《大纲》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下称“结果”）这类体现“不为人知的马克思”的文本的发现和传播。在 60 年代末这些文本公诸于世之前，情境主义国际和其他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已经诉诸《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样的马

克思早年文本。即便情境主义国际和法兰克福学派会运用《资本论》的拜物教理论和物化理论，二者的解读实际上也以卢卡奇为中介，不能视为详细挪用三卷《资本论》后的产物。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总体落在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马克思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今天息息相关，价值形式和拜物教也十分重要，但这两者在上述的实证主义阐释之中都被压倒性忽略了。《大纲》等新文本的公布动摇了传统解读，并且使成熟批判的激进性获得了承认。

因为自身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边缘，那些认同左翼共产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罗斯历史批判的人，反而在解读新公布的马克思文本时站在了有利位置。在法国语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和1968年首次出版的《居中不易》（*Invariance*）<sup>[13]</sup>杂志。通过展现“波迪加主义”的意大利左翼传统遗产在荷兰—德国左翼的经验和在当时正在展开的斗争中的迸发，《居中不易》为解读马克思带来崭新的感觉。曾与卡马特合作的罗歇·当热维尔（Roger Dangeville）将《大纲》和“结果”翻译成法语，这给了法国主流的阿尔都塞式、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阐释迎头一击。卡马特也在《居中不易》上就这些文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评析。<sup>[14]</sup>

卡马特的文本在法国 1968 年后的讨论中发挥的作用，与同时代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ldolsky）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在德国随后的讨论中类似。<sup>[15]</sup>二者都高度依赖用摘录的形式，对当时大部分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文本的意义进行介绍和探索。罗斯多尔斯基提供了《大纲》的详尽研究，而卡马特系统性较弱的论述引用了马克思的其他手稿，尤其是“结果”。尽管卡马特承认罗斯多尔斯基的书存在优点<sup>[16]</sup>，不过二者的差别在于，罗斯多尔斯基最终将《大纲》下降到仅仅是《资本论》预备稿的地位，而卡马特更专注《大纲》和《资本论》其他手稿如何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后期作品中得出的理解。卡马特认识到，马克思在各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不同方法引入和发展了价值范畴，这些方法的意义绝对不光是理论呈现的累进式改善。早期有一些处理引出了新角度，比如价值的历史自动化，将资本定义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还有从属（Subsumption）范畴的重要性，尽管此时的写作不如以后发表的版本清晰。读者会在卡马特解读新近文本时发现，他认识到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包含的后果远比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论》的阐释来得激进。<sup>[17]</sup>

卡马特的作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假设进行了绝妙

的突破，这个突破凸显为卡马特 60 年代中期的评论和他 70 年代初期添加的注解之间的南辕北辙。也就是说，卡马特早先的评论所搏斗的对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但此后的注解里，我们看到这个理论的前提都被他推翻了。<sup>[18]</sup> 卡马特 1972 年的评论结尾是这样呼吁共产化的：

人类未完成的总体性崛起并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同时和资本和劳动对抗斗争，这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与自己的宰制斗争，从而得以将自己这个阶级摧毁，将资本和各个阶级摧毁。一旦在全世界确认了胜利，这样一个在与资本斗争的革命发生之前的庞大过程之中真实地构建起来（按马克思的说法是形成政党），并且在心理层面上完成转变和转变了社会的普遍阶级就会消失，因为它变成了全人类。在它之外没有界别。那时候共产主义就会自由发展。低级的社会主义不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也还原为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本力量所在——的斗争。<sup>[19]</sup>

对大多后来的共产化理论家来说，马克思此前没有公

布的作品成了基本文本。《大纲》和其中著名的“机器论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s)的翻译直接启迪了吉尔·多维(Gilles Dauvé)的共产化论点原型。<sup>[20]</sup> 马克思在这个片段里描述了资本在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驱动之下,如何通过生产中大规模应用科学和知识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至最低。这为通过一个异化的知识系统整体来实现占有创造了可能性,从而可以再次占有这个作为可支配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共产主义就不能理解为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同一类财富的新分配,现在新基础是以可支配时间来计量的新型财富。<sup>[21]</sup> 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与时间之间的新关系,甚至不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多维认为,马克思这样关注时间,是暗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一个极端的断裂,这个断裂“排除了通过累进手段摧毁价值规律、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假想”,故而证明了工委主义者与列宁主义的民主替代方案本身就是不充分的。<sup>[22]</sup>

更早的手稿还在更根本的存在论层面指向更极端的革命概念。早期手稿揭示出对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质问了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野、个体之为个体所具备的既定性、还有我们的存在本身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马克思认为,这些本体论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家或多或少理清了那些把握住资本主义之下生活的社会

形式的范畴。虽然资产阶级倾向于将这些范畴呈现为脱离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马克思承认这些范畴是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上特定的形式。人类活动受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中介这一事实，使人类主体性产生了原子化和无对象的性质。资本主义当中的个体经验是纯粹主体性的经验，而所有对象性都以资本的形式与主体性对立：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

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个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sup>[23]</sup>

如此本体论的考量在《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以下简称《理论》）的作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小组在 70 年代中期诞生于 1968 年后的共产化氛围。对《理论》来说，被理解为共产化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会建立“劳动共和国”或者其他新型的生产资料管理方法的。相反，它是对生产里的异化的社会关系的超越，这种关系构成了在资本主义中所体验到的主体性与对象性的分离。在超越人和人以及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中，共产化超越了人类主体性与“对象化劳动”<sup>[24]</sup>的分离，也就是资本主义之下形成社会现实之基础的主客分裂。《理论》将这展望为马克思在《大纲》描述的各个维度的超越：劳动不再以单独的活动存在着；生产不再与再生产区分并宰制再生产；需求不再与产能分离；个体也不再通过产品交换或者国家形式的中介直面自己的社会性——他们的社

会性变得直接了。作为共产化的革命所解体的既有物的社会形式，也就是作为“对象化劳动”，或者说价值的载体的存在物（物重新变成物），还有个体的原子化的、空洞的、单独分离的主体形式。所以对《理论》来说，也正如对《大纲》里的马克思来说，<sup>[25]</sup> 以前生产那一个“对象性”的瞬间不再宰制主体，而是变成“有机社会躯体”，同时在躯体之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sup>[26]</sup>

## 德国争论

共产化视角的出现源自对马克思的全新运用，这种运用属于再运用和发展对马克思的激进解读的广阔进程的一环。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官方共产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异议和马克思阐释那里不再具有权威。虽然马克思说过“怀疑一切”，不过正统或者传统马克思主义往往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还能回答所有问题。这种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机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还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sup>[27]</sup> 官方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支柱被回归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的呼声所质疑，就如前一代的批

判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随即绽放一样。<sup>[28]</sup>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理论复兴与 20 年代一样，包含了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证知识体系的观点的决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的重新承认——这一举动使得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再次受到质疑。到 60 年代中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阐释的拒斥开始延伸到他的中心作品《资本论》。新解读援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手稿，不仅关注马克思所抵达的终点，还关注他走到终点的方法。人们在法国使用结构主义风潮来重新解读《资本论》；在意大利，特隆蒂（Tronti）和工人自治运动就“从工人阶级的观点出发”；在德国，出现了新马克思解读派（Neue Marx-Lektüre）。

在细究马克思的时候，德语使新马克思解读派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明显优势。“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新文本一般都是先用德语发表传播，然后才是其他语言，所以在德国当然不存在翻译的问题。<sup>[29]</sup>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用过的大量文化资源——也就是德国古典观念论——并不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同样被归为对黑格尔思想的接受问题。由此，虽然马克思的新解读在意大利和法国有强烈的反黑格尔倾向（这是针对此前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风尚的反弹），德国的讨论却能够对黑格

尔—马克思的联系发展出更细致，更启发性的图景。关键在于他们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在总体性的逻辑结构的时候，更仰仗的概念不是黑格尔的某种历史辩证法，而是《逻辑学》的系统辩证法。由此，这种有时候被人贬称为“资本逻辑”（Kapitallogik）的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早期批判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没有与鲁宾和帕舒卡尼斯（Pashukanis）那么多。新马克思解读派不是一个同质的学派，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方法，其中包含了严肃的共识和分歧，却有着某个同样的方向。

德国争论的政治背景是极端学生运动的崛起。这个运动有两极：一极是时常与东德国家有关联，对劳工运动采取“正统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传统主义者；另一极有更强的“反威权主义”色彩，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尤其是理论中能够解释工人为何似乎对革命兴趣不大的精神分析维度——的影响。<sup>[30]</sup>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影响，德国学生运动很快赢得了这样的声誉：论点的理论复杂性相当高。运动的克里斯马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的思想历程就反映了“反威权主义”一极的洞察力但又不稳定和模糊之处。1966年，他受柯尔施的强烈影响，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论”历史化，

认为该理论既不合时宜且“对我们来说十分值得怀疑”，因为该理论“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推迟到了未来，并认为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革命中具有首要的重要性。”<sup>[31]</sup> 不过，他还炮制出“体制内长征”的口号，这个口号成为德国绿党的行动理念（他和另一个克里斯马的反威权主义者丹尼尔·孔一本迪（Daniel Cohn-Bendit）后来也加入绿党）。今天，对他的遗产拥有最强烈认同的是彻底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德国左翼党（国内最左的党）。还有一个理论重要性更高的人物是汉斯·于根·克拉尔（Hans Jürgen Krahl），他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当中发挥领头作用，尤其是在杜契克遭枪击之后<sup>[32]</sup>。克拉尔是阿多诺的学生，将批判理论的许多关键概念带入了运动。但是他同时还是活动家（他和同学占领研究院一栋大楼的时候，阿多诺就曾不光彩地报警抓他），坚持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取向<sup>[33]</sup>。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在转向精神分析、文化和哲学等问题的同时，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拱手相让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发起新马克思解读派的人，正是克拉尔和阿多诺的其他学生——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 George Backhaus）和赫尔穆特·莱切尔特（Helmult Reichelt）。

因此，虽然对共产化圈子来说，他们对新的马克思文

本的激进性的开放态度产生于工委共产主义和其他左翼共产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的背景中，不过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也算是发挥了对等的作用——要知道上述的思潮在纳粹时期就已经受到清洗。<sup>[34]</sup> 工委共产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因为反思德国 1918—1919 年革命失败而发展出来的。虽然工委共产主义与德国革命的关系更为直接，但是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在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相关的思想家卢卡奇与布洛赫的时候，把握到了他们与那个时期更为复杂的被中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具备悖论般的构成：

这些人所代表的思想发展新成果，演变成了一场从未发生过的革命的理论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sup>[35]</sup>

法兰克福学派虽然脱离任何一个工人阶级圈子，却已经在尝试维系一种批判性和解放性的马克思主义，来抗衡俄罗斯为了捍卫以国家为中心的积累而发展的意识形态。学派与工委共产主义的亲缘关系，可以在霍克海默的《威权主义国家》等早期文本那里得到最清晰的展现，反威权主义学生不顾后期保守的霍克海默反对而将其出版。不过，阿多诺 1950 与 60 年代政治性不那么明显的文本依然把资

本主义社会的极端批判作为中心——实际上，其政治性不明显的正是文本规避了无中介的政治有效性这个逻辑。“极左”强调工人阶级自主对抗工人阶级代表和建制，试图以此维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放承诺，对抗劳工运动的实际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却悖论般地避开无中介的阶级斗争和“经济问题”，并试图以此来处理同一个任务。

这就意味着1960年代对马克思的激进再运用必然具备两种形式，也就是延续和断绝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法兰克福学派所启发的触觉敏锐性，以及详尽研究被他们规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转向，二者交汇于巴克豪斯的一起逸闻当中。按莱切尔特所说，新马克思解读派的纲领起源可以追溯到1963年，当时巴克豪斯在法兰克福学生宿舍居住，偶尔看到了当时非常罕见的《资本论》第一版。<sup>[36]</sup>他注意第一版与第二版的差异简直跃然纸上，但他也明白，之所以有可能注意到差异，是因为他已经听了阿多诺关于社会的辩证理论的讲座，因为：

如果阿多诺没有反复提出“在现实自身之中的概念”，提出一个可以追溯到交换的抽象这个起点的实在普遍，同时如果没有对这些范畴的构建，对它们在政治经济学当中的内在关系产生疑问，没有关于已经自

动化了的客观结构的概念，那么这个文本还会一直沉默，正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已经(!)讨论了一百年以后发生的情况那样。<sup>[37]</sup>

围绕《资本论》新解读的争论在 1968 年后明确开始了。他们带到前台的这些问题——其他语言一般要到以后才会在往往深度不足的讨论中涉及——主要有：马克思的方法的性质，以及恩格斯对该方法的理解是否合理；《资本论》范畴的辩证发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批判计划中未完成部分的重要性；“批判”一词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异；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之中，以及一般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抽象本质，等等。

这些围绕《资本论》新解读的争论虽然经常出现咬文嚼字和抽象的品性，却在学生运动的反威权主义一极和传统主义一极的紧张对立中被视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当时，传统主义一极坚持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只需要现代化和调整。<sup>[38]</sup>新马克思解读派为了挑战这个为正统续航的规划，提出要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不折不扣的根本重构。<sup>[39]</sup>

当时关于《资本论》所用方法的主流视角系出自恩格

斯提出的逻辑—历史性方法或者说变体（比如 1859 年给马克思的《大纲》所写的书评，还有《资本论》第三卷的前言与增补）。从这种视角看，《资本论》范畴的前进是紧跟范畴的实际历史发展的，以至于人们认为《资本论》头几章是在描述“价值规律”纯粹运作时的“简单商品生产”这个前资本主义时期。在德国的讨论和随后国际性的讨论中，恩格斯的权威以及依赖这种权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sup>[40]</sup> 新马克思解读派认为，恩格斯的阐释及其任何的变形<sup>[41]</sup> 都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本论》范畴的序列与发展背后的运动。《资本论》中的运动并不是从简单商品生产的非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出发（或者说，一个假想出来的简化模型）再进入到之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阶段（或者说，复杂模型）。相反，这种运动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把握为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呈现，是从抽象往具体运动。赫尔穆特·莱切尔特在《马克思〈资本论〉概念的逻辑结构》里，发展出一个现在被系统辩证法的理论家以各种形式奉为基础的概念：“资本概念的逻辑”，这是一个自我规定的过程，对应的是黑格尔《逻辑学》当中概念的超越自身。<sup>[42]</sup> 按这种视角来看，资本的世界可以从客观上看作是唯心主义的：比如说，商品就是一个“感性—超感性的物”（sensuous-supersensuous thing）。<sup>[43]</sup> 价值形式的辩证法表明

了，社会生活的物质和具体层次是如何从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开始就被价值那抽象的、理念的社会形式宰制的。按莱切尔特的说法，马克思认为：

因此，《资本论》被理解为诸形式的持续变化，而使用价值持续被融入其中和排斥在外。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价值同样具有了不断消失之中的对象这个形式。但是，对象如此持续不断的消失，就是价值本身持久的条件：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无中介的统一性，就是通过诸形式那一直被再生产出来的改变而保留的。如此建构出来的东西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作为使用价值、劳动、与自然的交换等的）感性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被降格为某个抽象过程自我持久的手段，而这个抽象过程就是整个持续变化的客观世界的基础……人类通过满足需要和劳动来再生产自己，他们整个感性世界被一步步吞噬进这个过程，里面的所有活动都是“自在地（in-itself）颠倒的”。这些活动在表象不断消失的同时却立刻成为自己的对立面，也就是一般的持久。<sup>[44]</sup>

这是本体论的颠倒，也是资本的精神对物质生活的占

有。卡马特把握到这一点，因为他承认将资本理解为过程中的价值，理解为从属很重要。如果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价值形式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如果价值和资本构成一种塑造了生活方方面面的强力、总体性的社会化形式，那么要超越它们就不是通过国家操纵来替代市场机制的问题，也不是工人自我管理这些形式的问题，而是要求生活各个空间的极端转型。出自恩格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则相反，认为价值规律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将关于市场和价值形式的理论和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理论分离开，并从此开启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的货币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理念的可能性。

### 不完整的马克思？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性质的一个体现就是将马克思的作品理解成完整的系统，只需要往里面添加往后的资本主义阶段，比如帝国主义的历史分析就行。在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和计划后可以看出，《资本论》是不完整的，这不仅指《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和《剩余价值理论史》等马克思生前未完成、其后分别由恩格斯和考茨基整理出来的文本，<sup>[45]</sup> 还指这些文本只构成了原计划六卷本中

的第一卷，这还没算上关于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及危机”的写作。<sup>[46]</sup> 承认马克思的规划现存的只是一些片段具有无比重要性，因为这就暗示要将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极端开放的规划，且要把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接触的研究领域发展起来。所谓的关于国家之派生（State-derivation）的争论和世界市场的争论，就是在尝试发展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未能系统论述的领域。<sup>[47]</sup>

国家派生争论的参与者利用帕舒卡尼斯的先行作品，把握到“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分离是资本主义宰制所特有的。这暗示着革命完全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人国家，应该将革命把握成对“经济”和“国家”的双重摧毁。这些争论尽管外表抽象，有时候还学术气，但是我们从中开始看到，在德国 60 年代末斗争的基础上批判性回归马克思，可以在我们理解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产生出特殊的，而且尤为激进的隐含意义。

这一点对于抽象劳动，对于这个在德国围绕价值的争论当中上升到概念高度的核心的马克思范畴来说同样成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形式那里，抽象是心理行动，而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主义内部出

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抽象：人们不自觉地在交换中进行的“实在的”或“实践的抽象”。正如莱切尔特的巴克豪斯逸闻表明的那样，启迪新马克思解读派去诉诸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就是阿多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客观概念性这个理念。而阿多诺这个理念与“同一性思维”的提法本身又受到索恩·雷特尔 30 年代与他的通讯的启发。索恩·雷特尔在 1970 年代发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sup>[48]</sup> 其中的理念由此推动了德国在这方面的讨论的进展。在书中，索恩·雷特尔把交换过程中所进行的脱离使用的抽象，不仅视作商品社会当中某类奇异的社会综合的根源，还将它当成抽象概念推理的存在以及独立脑力经验两者的根源。索恩·雷特尔的论点是，康德努力去理论化的“先验主体”只不过是交换而建构起来的物的统一性或者同一性（sameness）的理论表达，同时也是盲目的表达。这样的理念，再加上帕舒卡尼斯关于“法律主体”与商品在历史上如何互相产生的观点，助长了一个批判性检视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包括我们对内在主体性和意识的认知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理解为资本与价值所规定的形式。

对马克思来说，“实在的抽象”最有力的例子是价值的货币形式，而德国争论最为深远的贡献或许在于，他们沿着鲁宾已经铺好的路线发展了“价值的货币理论”。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版有一个重要的文段，将货币描述为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在处理实在世界的存在的时候，将各种特殊性独立地排除在外——“这就像除了分类组成动物界不同属、种、亚种、科等等的狮子、老虎、兔子和其他等等所有实在的动物以外，还存在着作为整个动物界的单个体现的动物一样。”<sup>[49]</sup>私人劳动的产品必须与抽象劳动的这种具体表现进行交换，使得产品的社会有效性在实际中实现。故而作为对象而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是抽象，不是思想的产物，并且它具有的社会客观性是所有人必须俯首帖耳的。

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了这个讨论，并且总体上还是在追随李嘉图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货币不过是一个有用的技术工具，可以为业已存在的商品价值的交换提供便利。相反，德国争论则重新关注价值那种奇异的对象性：价值不依附任何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只存在于商品与其他商品全体的等价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只能通过货币产生。货币在一般化的商品社会之中发挥的如此作用将回馈到活劳动的经验本身。如果说劳动不过是为了货币而执行的一种活动，那么进行何种劳动并无紧要，只是个概率问题。在此前社会里存在的特殊个体与特定形式的劳动之间的有机纽带，现在断裂了。一个能够事不关己游走在各个形式的劳动之间的主体发展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sup>[50]</sup>

因此，作为实践的抽象的抽象劳动，根本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它是所有活动还原为生成货币的活动后的产物。传统观点认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需要消灭抽象劳动：在这种观点里，抽象劳动是概括性（generic）的抽象，是一般的超历史的真理，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的市场形式的外表之下；只要资本家的寄生作用被消灭掉，只要社会劳动的无政府市场组织被（国家）计划取代掉，这一真理就能表明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从批判的视角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形式与规律转变成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相对落后的地区，比如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变成国家领导工业发展这种意识形态以后，《资本论》就成为了“操作指南”。价值形式的理论家则相反，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价值的货币理论，不是

“有关社会财富的分配理论，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之下，有关社会总体性的构建理论。”<sup>[51]</sup> 于是，问题就从分配的方面转移到超越劳动形式、财富形式和生产方式本身。

其他国家受《大纲》和鲁宾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启发，问出类似的问题，并找到类似的答案（有一些知悉德国的争论，但也有独立探究的）。譬如，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被当时追随阿尔都塞的雅克·朗西埃重新关注。阿尔都塞已经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与李嘉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领域做出了完全的断裂，但他没能指出价值形式的分析是断裂的关键，因为他抗拒价值形式里的“黑格尔主义”。但是，朗西埃注意到“在根本层面区分马克思和古典经济理论的，是对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分析（或者是对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的分析）。”<sup>[52]</sup> 另一名反黑格尔派科莱蒂（Lucio Colletti）<sup>[53]</sup> 也承认这一点，并且他将这一点带进了他和纳波莱奥尼（Claudio Napoleoni）在意大利关于价值的争论。争论的结论与价值形式理论家的很接近。德国争论的内容要到70年代末才翻译成英文，此前在英文界讨论里分量最大的是鲁宾的作品。<sup>[54]</sup>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是这些争论的一个中心论坛，而会上最主要的争论，集中在受鲁宾启迪的抽象

社会劳动价值论和传统的具体劳动价值论之间。前一个阵营和德国争论的情况一样走向了货币价值论，但是在理解《资本论》诸范畴的系统性关系的时候，他们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相关性的讨论与欣赏则少得多。<sup>[55]</sup> 在没有翻译莱切尔特和巴克豪斯的情况下，英文界少数追随德国、希望重建《资本论》<sup>[56]</sup> 的人——即康斯坦茨——悉尼（Konstanz-Sydney）学派（人们称之为“价值形式学派”）——在当时被大多数与会者视为过度偏激。正如近期的迹象所显示的那样，眼下讨论的核心是要求更加激进的重构，这正是系统辩证法的一大特征。

### 价值理论的（反）政治

价值形式理论的批判意味在于，它质疑所有以肯定（affirmation）无产阶级是价值生产者为基础的政治认知，且它承认马克思的作品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批判。价值形式理论在重构马克思的价值形式辩证法的时候展现出社会生活过程如何从属于，或者说“被形式规定”（Form-determined）在价值形式之下。这种“形式规定”的特点，在于反常地认为形式比内容优先。劳动不仅是在自身被对象化到资本主义商品中之前就存在的非否定

(positive) 的基础，有待通过调整形式的表达，从而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里解放出来。而且在根本意义上，作为原初的社会中介的价值在劳动之前就存在，从而比劳动优先。正如克里斯·亚瑟 (Chris Arthur) 所说：

从最深的层次来看，使用“简单商品生产”模型这个传统的失败之处，在于关注人类个体的时候将其当作价值关系的始作俑者，而不是认为人类活动客观地镶嵌在价值形式之内……然而事实上，价值规律是通过资本为中心的系统的**有效性强加到人们身上的**，这种使商品生产服从自己的资本就是增殖的目标，就是 (马克思所指出的) 真正与我们对峙的主体。<sup>[57]</sup>

我们用劳动生产资本这一说法虽然似乎是真的并且在政治上很有效<sup>[58]</sup>，更精确的说法其实是：在这么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我们作为劳动的主体是被资本生产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只是因为价值形式将劳动设定为自己的内容。如果社会不再受异化的社会形式宰制，且不再以抽象财富的自我扩张为取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的强制劳动就会消失。抽象劳动这个范畴将与价值一起消失。<sup>[59]</sup> 个体和个体需要的再生产将以自身为目的。

没有了价值、抽象劳动和工资的范畴，“劳动”将不再具备受首要的社会中介所规定的系统性作用，而这个中介，就是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价值形式理论在谈及从其出发的革命的理念的时候，其实和共产化是一个方向。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超越不能仅仅停留在“劳动的解放”上；相反，这里唯一的“出路”是消灭价值本身——消灭将抽象劳动设定为财富的度量的价值形式。共产化是要摧毁商品形式，同时在个体之间建立无中介的社会关系。如果将价值理解成是社会中介的总体形式，那么对价值的大扫除就不能半途而废。

虽然少有价值形式理论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得出如此激进的政治结论，不过这个事实本身并不打紧：对我们来说，如此激进的政治（或反政治）结论正是上述分析的合逻辑的结果。

## 回归马克思？

价值形式理论承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隐藏基核”，这暗示了马克思在 1867 年已经将价值把握为社会中介的总体化形式，而这个形式必须从整体上去超越。

所以，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那段肯定劳动、认同国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历史，其实是错误阐释马克思的历史。正确的解读所指向的是对价值的彻底否定，但上述观点认为这种解读也被有意无意忽视了。不过，如果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暗示了现代意义上的共产化，那他本人显然也没有意识到！

实际上，马克思对自己价值理论的重要性持模糊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理论在“科学上的”重要性，但为了回应读者理解理论细微处面临的困难，他似乎愿意妥协，以便他著作的其余内容获得接纳。<sup>[60]</sup> 马克思除了愿意将著作普罗化和“隐藏他的方法”，他还允许恩格斯（我们已经看到，恩格斯就是其中一个难以在这方面理解他朋友著作的人）写作各种书评来降低人们对价值与货币的关注，以防“偏离了主要话题”。马克思似乎拥有这样的立场：

价值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生产理论的逻辑前提，但对于理解这个理论的含义，尤其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的含义来说，价值理论并不是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近年的讨论全面采纳了这种显然完全属于马克思的态度（对照马克思对库格曼太太的建议），<sup>[61]</sup> 他们做到这一点是通过设置这个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

论对马克思的阶级剥削理论来说是否必要。<sup>[62]</sup>

马克思似乎接受了这一点：对他的作品进行多少带有左翼李嘉图主义的解读就足以满足工人运动的需要。他的政治著作有一个假设：强大的工人阶级团结在愈发同质的工人身份周围，将通过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党，把日常的斗争延展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推翻。马克思为了反对当时拉萨尔的社民马克思主义，确实写出了尖锐的《哥达纲领批判》，强烈攻击纲领对劳动的肯定和前后不一的政治经济学前提。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表这个批判。再者，就连他在批判里提出的想法（随后由恩格斯发表）也绝不是毫无问题的。这些想法包含了一个过渡理论，认为使用劳动券等方式的话，资产阶级法权会依然在分配中主导地位；此外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描述更接近资本主义而不是吸引力更大的第二阶段，而且他没有给出机制来解释如何从某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sup>[63]</sup>

认为“德国争论”忽略了他们自己从马克思的批判之中得出或者发展出来的激进立场同马克思自己的政治学存在脱节，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70年代末处理这个脱节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区分两个马克思：一边是“深奥的马克思”，他有一个极端的价值批判，将价值理解为总体化

了的社会中介；一边是“浅显的马克思”，他的意旨在于支持当时的工人运动。<sup>[64]</sup> 他们认为浅显的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激进潜力被误读的基础。德国背景下的一个强劲趋势是逐渐抛弃“浅显的马克思”而偏好“奥妙的马克思”。在这里，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无意识的自动主体这个理念，替代了他似乎同时拥有的另一个理念——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这样来看，阶级斗争并不是被否认了，而是被当成是“系统内生的”——就是在范畴之内运动的意思——而要消灭范畴就要另寻出路。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工人运动的认同就是错的，事后回想，工人运动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谋求解放的运动，不是消灭这种社会的运动。最能代表这种趋势的是“危机”（Krisis）和“出口”（Exit）两个讨论小组的“价值批判”。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虽然没有用到深奥/浅显的区分，不过他在70年代初就在法兰克福发展了自己的理念，而他的论点本质上是同一个立场。他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当中认为马克思提供的是“对资本主义中劳动的批判”（深奥的马克思），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从劳动的角度出发的资本主义批判”（浅显的马克思）。有趣的是，除了远离阶级以外，普殊同从自己的理论中得出的结论，在政治上可以将他划为“极左”，甚至与共

产化的论断共通，这一点他做得比大多学术界的价值形式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确。<sup>[65]</sup>

并不是所有受新马克思解读派影响的人，包括身处广阔的批判价值形式导向的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人，都如此远离阶级斗争。英文界的讨论如果采纳“货币价值论”或者“抽象社会劳动价值论”，一般不会那么抗拒阶级分析，不过，他们也不会复制在德国涌现的那种对传统左翼设想的批判。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虽然在向英文界马克思主义引入德国讨论衍生出来的批判概念方面作出了最大贡献，却采取坚决捍卫阶级斗争的视角。<sup>[66]</sup> 不过，大部分关于新马克思解读派的记载依然认为，他们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抗拒马克思将历史使命赋予无产阶级的做法，并且在德国左派那里，怀疑阶级斗争已成为主流。但是，如果这一类观点否认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能动性（agency），那问题当然就变成了消灭阶级社会从何说起？德国讨论当中各式颇难遂意的主流回应似乎认为，这是批判正确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说，将革命看成获取正确意识的问题。这样对正确意识和批判的关注却使事情似乎变得讽刺了起来：你们就算一路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却还是保留了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分离的列宁主义问题。

我们已经强调了新马克思解读派如何标志了对法兰克福

福学派的发展和改进。阿多诺的社会辩证理论——就其关于个体的背后的系统自我再生产、主体-客体颠倒、以及存在着实在的抽象这三者而言——是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然而阿多诺自己没有对《资本论》及手稿展开详细的探讨，他相当依赖其他人的研究。<sup>[67]</sup> 新马克思解读派证明了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是正确的，这种正确不是体现在哲学和社会理论的一般领域中，而是体现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资本论》所选择的领域上。不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似乎没能跟上自己的学生所作出的理论进展。<sup>[68]</sup> 两人死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在哈贝马斯那里完全沉沦为资产阶级理论，而新马克思解读派壮大了批判的马克思理论的潮流。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马克思解读派的成交不如阿多诺。阶级范畴在巴克豪斯和莱切尔特的作品里没有什么地位，他们认为革命问题不在自己的学术专攻领域之内。讽刺的是，尽管阿多诺持有无产阶级完全融入这样的理念，反倒是他在这些主题上有更多的话要说。对立这个概念是阿多诺的作品一大特色，并且他所指的是非常正统的阶级对立。在阿多诺诸如《社会》(*Society*, 1965)、《对今日社会冲突的评论》(1968)和《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Remarks on Social Conflict Today*, 1968)等论文里，他显

示出对阶级对立和剥削这些现实的“正统”（褒义的“正统”）关切。在他和乌苏拉·耶里施（Ursula Jaerisch）合著的《评论》里，他抨击社会冲突这种提法是对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的“实证主义式”扁平化，尽管客观上社会冲突要通过阶级社会的发展（融入）才可能产生。虽然阿多诺并非有意给出定论，但是在他看来，当代社会的中心依然是阶级对立。这一点可以体现在阿多诺一次讲座的笔记里，而巴克豪斯承认这个笔记启迪了新马克思解读派。阿多诺在讲座中反复强调，“交换关系是由阶级关系提前形成的（präformiert）的”；工人接受一定的关系的唯一原因是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阿多诺与巴克豪斯自己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阿多诺大部分焦点在于这一个事实：虽然交换不光是幻象，但是“交换过程的表象（Schein）要到剩余价值的概念当中才能找到”。<sup>[69]</sup> 尽管巴克豪斯与莱切尔特对马克思文本的挖掘更深，阿多诺在某种程度上却显得“学术气”更弱而“政治气”更重，也更靠近马克思对剥削与阶级对立的关切。

从这个角度看，克拉尔同样与他的继承者完全不同。如他死后出版的作品集<sup>[70]</sup> 标题全文表明的那样，克拉尔的长处不仅在于对价值范畴的中介性和阶级斗争表现出兴趣，还在于采取了相当历史性的视觉，这一点是莱切尔特

和巴克豪斯本质上在咬文嚼字的作品大部分时候所欠缺的。克拉尔之后，新马克思解读派内部对系统重建的关心压过了所有历史关切。巴克豪斯、莱切尔特和诸如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下一代的价值形式理论家的举动，相当于把马克思的作品里面一切带有“不科学”的历史哲学或革命理论味道的东西全部驱逐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找出什么机械应用理论的方法，而是要承认，阿多诺与克拉尔给出不同回答的问题没有远去。系统必须历史地把握，历史必须系统地把握。

和所有简单回归阿多诺立场（或者回归克拉尔还没翻译过来的作品）的做法相反，这里的重点是把握住阿多诺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观态度。这是阿多诺在尝试坦诚面对自己那个时期的矛盾与僵局，而不仅仅是他无能为力。同样，回避克拉尔提出的问题、德国讨论之中对“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情绪、尝试用其他方法打下革命理论的基础，这些现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偏差。就算这些做法似乎没有达到信服的替代方案，它们至少也指出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历史记录并没有明显表明，工人运动指向的共产主义方向被理解为价值、阶级、国家等等的终结——事实上刚好相反。阶级斗争是系统内生的这个论点把握到了在资本内部斗争的困境。“深奥和浅显的

马克思”这个理念——将马克思的批判与阶级斗争脱钩的愿望——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异端，还是似乎针对工人阶级无法履行“历史任务”这个问题给出了可信的解决方案：工人运动本身就从来不是真正革命的，而真正革命的视角就在马克思的“深奥”版本那里。不过当然了，这样脱钩会使我们拿不到可信的替代方案来实现这个愿景。

很明显，价值与阶级分析理论最终不能相分离。价值范畴和阶级范畴是互为影响的。将资本理解为“系统辩证法”层面的运作以后，<sup>[71]</sup>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关系是内在的。这既体现在“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的最后发展”，<sup>[72]</sup> 又体现在价值关系是活劳动与对象化劳动分离的产物，也就是阶级的产物之上。不过，虽然除了被迫产生价值、还因为价值变得越来越多余的阶级，在其他地方寻求消灭价值最终将徒然无功，许多价值批判家包藏着的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怀疑还是应该受到直视。我们认为《理论》小组正在做这一点。

《理论》的理论核心是承认无产阶级和资本的互惠性影响，或者说互相相关。这个核心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某个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其斗争何以消灭这个社会。《理论》作出的贡献比较重要的一点，在于拒绝将某种革命人

类本质赋予无产阶级在其阶级和资本主义本质之下，同时又不丢掉阶级矛盾的中心性。他们的回答不如说是将阶级关系把握为在斗争周期之中历史地发展着的，但是同时又一直带出系统性的结果。有一点对《理论》很关键：“共产化”不是共产主义和革命“在过去一直是什么，本应一直是什么”，<sup>[73]</sup>相反，共产化的概念历史地出现在斗争的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而共产主义与革命在这个周期的完结时显现为别的东西。

对《理论》来说，从马克思贯穿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经典工人运动属于他们所说的“纲领主义”的斗争周期。<sup>[74]</sup>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和从中出现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愿景有一个基础，就是工人在资本—劳动关系之内能够维系的自主和积极性。这个时期的革命，可以描述为通过肯定关系中的一极来消灭关系本身的一次不可能的尝试。社民与斯大林主义的悲剧，以及安那其主义在西班牙的经验，都是运动在高潮时期所设立的目标与方法之间的矛盾的产生，这些矛盾反过来又是当时阶级关系的构成的产物，即资本与阶级互相对立的产物。弗朗索瓦·达内（François Danel）对这个情形的总结如下：

既然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种关

系之下阶级斗争的发展——没有直接带来雇佣劳动的消灭而是将其一般化，于是无产阶级将最终目标从运动抽象出来，而让革命——夺取权力——依赖于客观条件（生产力发展）和主观条件（无产阶级的意志和阶级意识）同时成熟。因此，无产阶级将共产主义展现为一个纲领，而完全达成纲领就展现为一个不可能的过渡的终极表达，这个过渡就是无产阶级重新占有和主导价值的运动，而雇佣劳动按理说会在货币替换成劳动券的那一刻开始“日渐枯萎”……可见工人运动质问的不是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而只是由资产阶级来管理生产。问题变成了工人要么在作为意识承担者的党领导之下，从寄生虫阶级手中夺取生产机器、消灭该阶级的国家，以便建立新国家，要么通过行业工会或者工委等机关，从下到上自行组织生产，来削弱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但是，从来没有人质疑价值规律或尝试消灭规律——价值规律是对积累的强制，因此是对剥削的再生产的强制。这种剥削的具体化既体现在机器和作为自在资本的固定资本那里，也体现在资产阶级或官僚这些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剥削阶级的必然存在那里，他们二者是剥削再生产的集体代理人。<sup>[75]</sup>

这个纲领式革命的决定性失败给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留下了一笔遗产，就是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拥有了一定权力，但是再也没有了此前自主的革命性肯定的方面。这正是革命理论的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局面。随后在 60 与 70 年代催生新理论生产的各种斗争，不论情境国际等组织对斗争有什么期望，都没有超越纲领主义。事实上，这些斗争具备了矛盾的性质：反文化的乌托邦主义和“抵抗工作”，日常生活的问题，这些种种都合流到（许多情况下还依赖）更为纲领主义的运动的强度那里去。正是在这种矛盾和这些斗争之下，共产化的理论以及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崛起。这些对资本有利的斗争结局标志着这个周期以重构告终：阶级在资本主义内部拥有积极自主性和肯定的可能性会在重构中被压制。《理论》恰恰认为，这种溃败创造了阶级关系的一个新构成，使得人们不再把阶级的存在体验为肯定行为带来的积极性，而是以资本形式出现的外在限制。正是这个构成使得对共产主义的新理解与马克思的新解读变得必要起来。

从共产主义理论潮起潮落的角度出发，是有可能将上述的“回归马克思”阐释为 1917、1968 年等等革命浪潮的平行现象的。但是，正如共产化的视角在先前革命时期的边缘异端趋势之中没有出现一样，早期的各类批判马克思

主义也没有 60 年代出现的理论走得那么远。卢卡奇、鲁宾和帕舒卡尼斯所展开的概念与上升中的工人运动有关，表现了资本—劳动关系中的某一种构成。早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还有第一个价值形式理论家马克思，他们的作品都有矛盾和局限。随着纲领主义走向终结，后来一代人的写作则得以超越这些矛盾局限。<sup>[76]</sup> 纲领主义的肯定性无产阶级规划在早期必然失败，原因不仅在于我们的共产化视角，还在于这种规划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这一点很重要）。不过，这种规划还是给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赋予了“运动的空间”。这个空间到 60 年代末就已经被耗尽了。对二十世纪的“第二股革命浪潮”（Second Revolutionary Wave）理论家来说，展现在眼前的一个明显问题，是抗拒将社会主义视为工人在计划经济中获得自己劳动的真价值这种理念和实践。

对马克思的批判解读可以把握到对价值的革命性否定所涉及之物的激进性。我们总说要超越我们自己，其实也要超越“外在”的东西。《理论》的贡献在于去把握早期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结构何以和为什么没有引起上述的超越。在马克思的时代和历史上的工人运动期间，资本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通过肯定劳动、价值和阶级，而不是通过否定它们来安放革命的。《理论》的作品提示道，价值形

式理论所暗示的激进“出路”可以由资本—劳动关系本身的历史演化所规定，而不是某种与历史无关的正确意识、四处自由悬浮的科学观点或者批判视角的产物。阶级关系的历史视角补全了价值形式理论。用系统辩证法和价值形式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可以详细说明这种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社会关系何以受形式规定等等，从而启迪共产化的视角。系统辩证法和价值形式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性质，也就是说，拥有“以前的革命呈现为纲领主义之后，共产化变成超越这种纲领主义的充分条件”这一段历史的阶级关系究竟是什么。共产主义必定要消灭历经时日演化而成的多层次关系，但是要消灭这种关系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去构建价值，且价值不再构建我们。我们自己时代的激变正是我们认识这个时代的唯一方法。

怀 谷 译

Sikako 校

## [注释]

[1] 我们承蒙德国的同志在草拟本文的时候提供有益的评论，尤其是 Kosmoprolet 的 DD 和 Felix。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五卷，第 99 页，注 32。[《尾注》引用的 Ben Fowkes 《资本论》译本作“历史的和过渡性的特征”。——译注]

[3] 这里有一个绝对没有穷尽的作者名单，包括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汉斯·乔治·巴克豪斯（Hans George Backhaus），里卡多·贝勒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Michael Eldred，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汉斯·于根·克拉尔（Hans Jürgen Krahl），Patrick Murray，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赫尔穆特·莱切尔特（Helmut Reichelt），Geert Reuten，Ali Shamsavari，菲尔顿·肖特托（Felton Shortall），Tony Smith，Michael Williams。

[4] 《文集》作“一些公式”。——译注

[5] 《文集》作“政治经济学”。——译注

[6] 《文集》第五卷，第 98—99 页。[《尾注》在这里引用了流行于英语世界的《文集》：Lawrence & Wishart 于 1975 年出版的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其中《资本论》第一卷版本为 1887 年的英文第一版。虽然该版本与《文集》不同，但《尾注》修改了部分表述（应是参考

了其他版本)，导致最终的行文与《文集》非常接近。为了体现《尾注》的理论主张，我们将《文集》中有出入的表述修改为《尾注》版本，并附上说明。——译注]

[7] 与此同时，马克思本人似乎承认自己的价值形式分析存在问题，这促使他给出了至少四个版本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版及附录，还有《资本论》第二版各自对价值的展开存在明显差异，并且绝对不能假定后出版本是对此前版本的全方面改进。诚然，后来稍微流行一些的表达都是马克思发展出来以解决连他身边的人都看不大懂的困境。这些表达丢失了一些辩证法的精细，更偏向左翼李嘉图主义对马克思论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日后会在工人运动中占多数。见汉斯一格奥尔格·巴克豪斯，“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Thesis Eleven 1* (1980)；赫尔穆特·莱切尔特，“Why Marx Hid his Dialectical Method”，收入维尔纳·邦菲尔德等编著的 *Open Marxism* 第三卷（Pluto Press 1995）。

[8] 英文原文在此使用的是 *substance* 一词。在翻译这个词的问题上译者和校者进行了一些商榷。译者引用原文德文翻译，依照马克思文献的翻译传统将其翻译为“实体”。校者认为这种翻译就文本本身是准确无误的。但是，如果将文章置于价值形式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的李嘉图传统的明确反对批判的语境中，校者认为也可将其理解为“物质”，因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将“物质财富”理解为是社

会生产的实体，而对于这一实体的（平衡“健康”的）交换和分配设计也是各种政治的出发点。而对于这种理解，价值形式理论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此提出这一点，仅供读者参考。——译注

[9] 伊萨克·鲁宾,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Black & Red 1972), 第 5 页。

[10] 同上, 第 117 页。里卡多·贝勒菲尔已经指出, 罗莎·卢森堡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之中又一个密切关注价值形式的例外, 参见他的 *Introduction to Rosa Luxemburg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2009), 第 6 页。

[11] “正统”已经具备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卢卡奇作过一次有趣的尝试: 他说正统独独指的是方法, 希望以此重拾正统的意义。或许是为了摆脱“正统”可能具有的模糊含义,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了“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来指代自己希望推翻的马克思典范阐释。我们在这里将交替使用正统和传统马克思主义。

[12] 《文集》第八卷, 第 139 页。[“物质交换”在原译文中为“物质变换”, 按《尾注》引用的 Martin Nicolaus 英译修改。——译注]

[13] Invariance 杂志并无正式中文译名。杂志取这个名字的初衷在于表达波迪加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纲领不可变的想法。译者结合自身对波迪加主义传统的理解把握采用“居中不易”的译法, “不易”在此为“不变更”之意。——译注

[14] 雅克·卡马特, *Capital and Community: the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Works of Marx* (Unpopular Books 1998), 初发表于 *Invariance Series I no.2* (1968)。

[15]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1977), 德语初版于 1968 年。

[16] 不过, 卡马特批评罗斯多尔斯基“没能走到这么一步去宣示我们相信是根本性的东西: 资本是过程中的价值, 是正在形成的人”。见雅克·卡马特, *Capital and Community* (Unpopular Books 1998), 第 163 页。

[17] 这样一种解读《大纲》的方法在后来得得到奈格里的认可。确实, 有人认为奈格里的早期作品有点卡马特的影子。使人意外的是, 不论自治运动的政治有多矛盾, 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 1978) 本质上还是在论述共产化。

[18] 卡马特是这样评论早前“共产主义的形式统治”想法的: “今天这种分期法失去了合理性, 与此同时, 共产主义的实现如此迅速, 远超此前的想象。我们终于可以点明, 共产主义既不是生产方式, 也不是社会……” 同上, 第 148 页。

[19] 同上, 第 165 页。

[20] 吉尔·多维, *Sur L'Ultragauche* (1969), 英语首次出版时题为 *Leninism and the Ultraleft*, 载 Jean Barrot (Gilles Dauvé) & François Martin,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Black &

Red 1974), 第 104 页。

[21] “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文集》第八卷，第 200 页）有趣的是，莫伊舍·普殊同对“价值形式”进路所具有的激进政治后果从不讳言，他将这些片段看作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基本，见《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2] 吉尔·多维，*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Black & Red 1974），第 61 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二版第三十卷，第 253—254 页。

[24] 还有与自然分离。自然对资本来说就像人类一样，纯粹是抽象财富扩张的源泉。

[25] 不过，《理论》并不主张共产化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见下文关于“纲领主义”的讨论。

[26] 《文集》第八卷，第 208 页。

[27] 关于将“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见米夏埃尔·海因里希，“Invaders from Marx: On the Uses of Marxian Theory,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 Contemporary Reading”，*Left Curve 31*（2007），第 8—83 页。这样一种界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方法似乎源自人道马克思主义者伊林·费彻尔（Iring Fetscher），而莱切尔特和普殊同都出自其门下。见其作品 *Marx and Marxism*（Herder and

Herder 1971)。

[28] 那个时候的杰出作品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鲁宾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及帕舒卡尼斯的《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这个新时期的一个特点是重新发现此前时期的许多文本，以及对问题意识的深化。

[29] 正如克里斯·亚瑟注意到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几乎所有引用《资本论》所说“具体化的”(embodied)劳动，译文对应的德语是Darstellung，英译更合适的翻译是“表现了的”(represented)。见 *Reply to Cri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05)，第 217 页。

[30] 其中包括对弗洛伊德和第三帝国的兴趣，加上阿多诺针对当代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的严厉攻击；另外包括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以及学派对“威权主义人格”的分析。

[31] 鲁迪·杜契克，“Zur Literatur des revolutionären Sozialismus von K. Marx bis in die Gegenwart”，SDS-korrespondenz sondernummer 1966。

[32] 1961 年，杜契克走出柏林选帝侯大道的 SDS 大楼时被约瑟夫·巴赫曼 (Josef Bachmann) 埋伏枪击，当时他高呼“你这肮脏的共产主义猪”，事后枪手承认他的行动受马丁·路德·金一周前被刺杀启发。

——译注

[33] 1970 年，克拉尔在车祸中罹难。他的著作与讲话在死后出版了合集《建制与阶级斗争》(*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尚未译成英文。

[34]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对柏林 SDS 部分成员产生影响的威利·胡恩（Willy Huhn）。他加入了 1920 年代末由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重组而成的“红色战士”（Rote Kämpfer）组织，在 1933 / 34 年被纳粹短暂拘禁过，随后转向理论工作，创作了包括重要的社民批判《社民的国家主义：论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前史》（*Der Etatismus der Sozialdemokratie: Zur Vorgeschichte des Nazifaschismus*）在内的作品。不过，工委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要在运动高潮过后才能获得相当的再发现和出版。

[35] 他接着说：“这个意识形态运动的悖论般的条件，可以帮助解释运动对上层建筑问题的关注为何几乎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为何在物质与经济基础本应成为运动重点的情况下却明显缺少关切。”见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Humanities Press 1978），第 12 页。对比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开篇首句：“人们一度认为哲学被废弃了，却因为人们在那一刻意识到哲学消失了，哲学存活了。”见 *Negative Dialectics*（Continuum 1983），第 3 页。

[36] 《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尤其是关于商品和价值的第一章结构和行文展开，与第二版存在重大差异，而第二版是此后改动不大的各版本以及其他语言译本的基础。

[37] 赫尔穆特·莱切尔特，《马克思的新解读》（*Neue Marx-Lektüre: Zur Kr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Logik*，VSA-Verlag 2008），第 11 页。

[38] 直到 1968 年，SDS 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极在本质上一直是改良

主义者，提倡合法过渡到社会主义，但 1968 年后，走到前台的是反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斯大林主义。这个时期有许多此前是“反威权主义者”的人放弃了对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参与组建“K 小组”（K 对应德文共产主义者 *Kommunist*）。

[39] 见米夏埃尔·海因里希，“Reconstruction or Deconstruction? 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ies about Value and Capital, and New Insights from the Critical Edition”，收入 Riccardo Bellofiore 和 Roberto Fineschi 编著的 *Re-Reading Marx: New Perspectives after the Critical Edition*（Palgrave Macmillan 2009）。

[40] 见同一期《运动中的矛盾》（*The Moving Contradiction*）。[本文选没有收录。——译注]

[41] 比如格罗斯曼提出了连续近似的理念，将《资本论》呈现为一系列随着现实的层次一步步增加而越来越复杂的分析模型。

[42] 赫尔穆特·莱切尔特，《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Suhrkamp Verlag 1970）。这种对应有多种紧密依然饱受争议。见 Chris Arthur, Tony Smith 和 Robert Finelli 在 *Historical Materialism*（11.1 卷、15.2 卷、17.1 卷）的争论。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和迪特·沃尔夫（Dieter Wolff）以后会在德国以不同的方式批判资本与精神“异体同形”（homology）这种理念。

[43] 这是博内菲尔德对《资本论》所说 *sinnlich übersinnlich* 给出的

更精确的翻译，这个词在英文版中的翻译并不好。详见他的译后记“Social Reality as Appearance: Some Notes on Marx’s Conception of Reality”，收入维尔纳·邦菲尔德和科斯马斯·佩尔科佩迪斯编的 *Human Dignity: Social Autonomy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5)，第 31 页。

[44] 同上，第 46 - 47 页。

[45] 苏联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时候能够质疑考茨基的编辑决定，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如此同等对待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作出的大幅修改。原稿（以德文）发表以后，人们发现恩格斯进行了重大改写和疑点重重的编辑决定，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文献提出如此质疑，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深恶痛绝的。见米夏埃尔·海因里希，“Engel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收入 *Science & Society*, vol. 60, no. 4, 1996, 第 452—466 页。

[46] 罗斯多尔斯基曾有激烈的观点，认为《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被融入了全书的新计划，但即使我们赞同他而非莱博维茨 (Lebowitz) 和肖特尔 (Shortall) 的反观点，剩下的三卷显然还是未竟之业。

[47] 国家派生的争论见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和 Karl Held and Audrey Hill, *The Democratic State: Critique of Bourgeois Sovereignty* (Gegenstandpunkt, 1993)。世界市场争论几乎没有内容被翻译出来，不

过可见 Oliver Nachtwey and Tobias ten Brink, 'Lost in Transition: the German World-Market Debate in the 1970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6.1 (2008), 第 37—70 页。

[48] Alfred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gesellschaftlicher Synthesis* (Suhrkamp 1970); 英译本: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Humanities Press 1978)。[南京大学出版社在 2015 年出版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 1989 年的版本, 属于 1970 年版的修订和增补版。——译注]

[49] 《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二卷, 第 47 页。

[50] 《文集》第八卷, 第 29 页。

[51] Michael Heinrich, 'Invaders from Marx: On the Uses of Marxian Theory,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 Contemporary Reading', *Left Curve* 31 (2007)。

[52] Jacques Rancière, 'Le Concept de Critique et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s Manuscrits de 1844 au Capital', in Althusser et al, *Lire le Capital* (RUF 1996), 第 128 页; 英译本: 'The concept of 'critique'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Ideology, Method and Marx*, edited by Ali Rattansi. 第 114 页。

[53] Lucio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Verso 1979), p 281.

[54] 令人意外的是, 鲁宾的重要性在德国争论当中却被低估了。他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到 1973 年才(从英语)翻译成德语, 而且论

拜物教的第一章还被遗漏了。见 DD, ‘Sachliche Vermittlung und soziale Form. I.I. Rubins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Theorie des Warenfetischismus’, Kritik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Eigentum, Gesellschaftsvertrag, Staat II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10)。

[55] 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巴纳吉 (Jairus Banaji) 的先锋著作: ‘From the Commodity to Capital: Hegel’s Dialectic in Marx’s Capital,’ in Diane Elson, ed.,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CSE Books 1979)。

[56] 比如: Michael Eldred, Critique of Competitive Freedom and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State: Outline of a Form-Analytic Extension of Marx’s Uncompleted System (Kurasje 1984)。

[57] Chris Arthur, ‘Engels, Logic and History’ in Riccardo Bellofiori, ed., Marxian Economics a Reappraisal: Essays on Volume III of Capital, vol. 1 (Macmillan 1998),第 14 页。

[58] 比如 Mike Rooke 就批评克里斯·亚瑟和系统辩证法,因为它们“物化了辩证法”并且失去了“劳动辩证法”具有的意义。“Marxism, Value and the Dialectic of Labour”, Critique Vol. 37, No. 2, May 2009, 第 201–216 页。

[59] 阶级社会之外的“劳动”,也就是与自然进行交互的人类需要(“人的无机的身体……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文集》第一卷,第 161 页),不是人的本性的外在强迫,而

是本性的表达。比方说，要通过活动获得食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出规定就不是强迫。。

[60]相关讨论(涉及到巴克豪斯)见 Michael Eldred, *Preface to Critique of Competitive Freedom and the Bourgeois-Democratic State* (Kurasje 1984), xlv–li。。

[61] 马克思提议由于内容困难，他朋友的妻子可以跳过《资本论》第一部分（关于价值和货币部分）。Eldred 在这里指向一个事实：许多马克思的读者——比如被斯拉法和阿尔都塞所说服了的读者——认为这样理解马克思是正确的方法。。

[62] Michael Eldred, 同上, pp. xlix - l。

[63] 见 R.N. Berki, *Insight and Vision: The Problem of Communism in Marx's Thought* (JM Dent 1984) chapter 5。。

[64] 虽然这个区分很可能出自巴克豪斯，但是按 Marcel van der Linden 所说，是 Stefan Breuer 炮制自 ‘Krise der Revolutionstheorie’ (1977). Marcel van der Linden, ‘The Historical Limit of Workers’ Protest: Moishe Postone, Crisis and the “Commodity Logic”,’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42 no. 3 (December 1997), pp. 447–458。。

[65] 普殊同和多维一样，利用“机器论片段”去动摇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概念。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李嘉图式的，追求的是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消灭。他认为苏联早已是资本主义的了。他和《理论》一样，强调对象性和主体性的历史

构成。不过涉及当下的实际立场的时候，他指向了改良，并大力声称自己的分析“不意味着我是激进派”。Moishe Postone and Timothy Brennan, “Labor and the Logic of Abstraction: an interview”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8:2 (2009), 第 319 页。

[ 66 ] 譬如见 Werner Bonefeld, “On Postone’s Courageous but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Banish the Class Antagon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2.3 (2004)。

[ 67 ] 除了卢卡奇和索恩·雷特尔之外，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用到的《大纲》摘录还仰仗了 Alfred Schmidt。见 Michael Eldred and Mike Roth,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 in *Thesis Eleven* no. 1 (1980), 第 96 页。

[ 68 ] 见 Helmut Reichelt,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to Value-Form Analysis”, *Thesis Eleven* no. 4 (1982), 第 166 页。

[ 69 ] 巴克豪斯对阿多诺 1962 年讲座所做的笔记收入了 *Dialektik der Wertform* (ca. 1997) 的附录。

[ 70 ] *Constit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On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proletarian emancipation* (Verlag Neue Kritik 2008). [书名译为《建制与阶级斗争：论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和无产阶级解放》。——译注]

[ 71 ] 见同一期《运动中的矛盾》(*The Moving Contradiction*)。[本文选没有收录。——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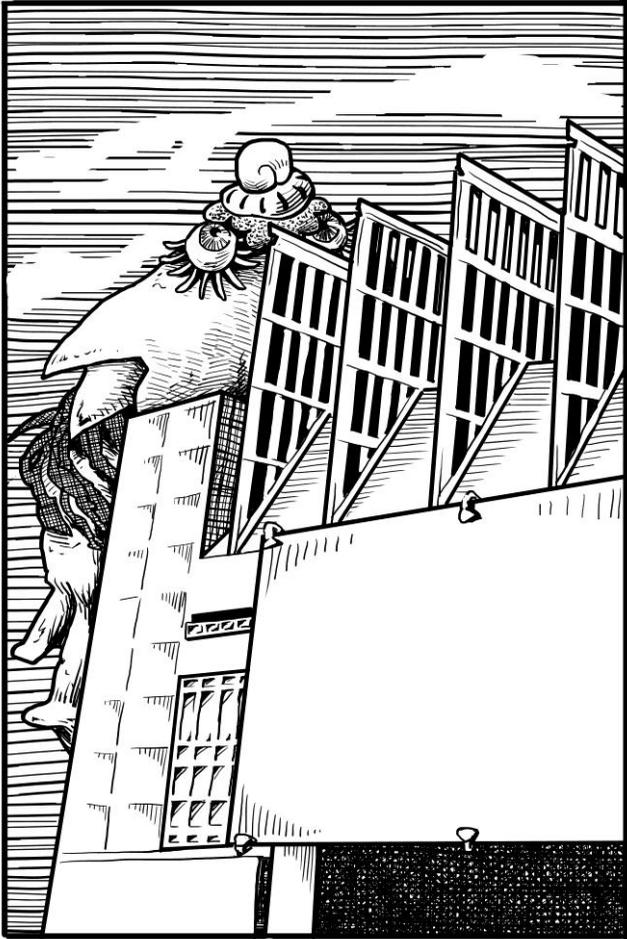
[72] 《文集》第八卷，第 195 页。

[73] 《共产主义理论》，“Much Ado About Nothing”，载《尾注》第 1 期（2008），第 192 页。

[74] 这是多维与《理论》在《尾注》第 1 期中争论的一个重大概念分歧。

[75] François Danel, *Introduction to Rupture dans la théorie de la révolution: Textes 1965–1975* (Senonevero 2003)。

[76] 比如说，尽管鲁宾提前设定了或者直接启迪了晚得多的价值形式理论，但是他有一些范畴——比如“生理平等劳动”这种超历史范畴，还有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社会平等劳动”——可以看作他认为的在那个时候如何安放革命，他自己身处的国家计划机关情况如何的一种表现。即便最当代的价值形式理论家并不明确否认革命的纲领式概念，他们对劳动的肯定抛弃程度之大也远超早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价值形式理论的“革命性”后果，只能在（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发展形势允许以后才能够产生。





贫苦与债务  
论过剩人口与过剩资本的逻辑与历史

Misery and Debt  
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Surplus Populations and Surplus Capital

2010

---

由《尾注》与亚伦·贝纳纳夫 (Aaron Benanav) 共同创作，  
发表于《尾注》第 2 期。

我们往往透过老一代的周期理论来阐释当下的危机。主流经济学家四处搜寻复苏的“绿苗”，而批判性的批判家只去问是不是还要再久一些才能“恢复”增长。确实，如果我们从商业周期理论甚至长波理论出发，就会很容易假定泡沫破灭后就是繁荣，规律得跟钟表一样，而经济下行总是为反弹式上行“铺好道路”。但是，将来一旦这团乱码解开了，我们有多大可能看到资本主义的新黄金时代？

我们可能首先想起来，上一个黄金时代（大概 1950—1973 年）的奇迹时光所依赖的不仅是世界大战和国家开支大规模增长，还有人口史无前例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事实证明，农业人口是“现代化”征程上一个潜在的武器，因为他们为新的工业化浪潮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来源。1950 年，德国有 23% 的劳动力被农业部门雇用，法国有 31%，意大利 44%，日本 49%。到 2000 年，他们的农业人口都不到 5%。<sup>[1]</sup>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发生大规模失业的时候，资本的处理方法是将城市无产者驱逐回土地那里去，

还会将他们输出到殖民地。资本在迎来殖民扩张的极限的同时消灭了传统核心地带的农民，因此也消灭了自身传统的复苏机制。

与此同时，把那些早已被赶出农业部门的人们吸收进去的工业化浪潮，在 1970 年代迎来了自己的极限。自那时起，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雇用数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下滑。过去三十年来，制造业雇用数下滑了 50%，这个幅度相当于这些国家总雇用数的 1%。就连新兴“工业化”的国家，比如韩国和台湾的工业相对雇用数，也在过去二十年出现了下滑。<sup>[2]</sup>同一时间，非正式行业的低工资服务业工人数与贫民窟居民数出现扩张。在那些相较萎缩行业的需求而成为多余的人看来，这两者是唯一的出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危机趋势，并不局限于经济活动的定期下行这个范围。这个趋势将自己暴露得最猛烈的地方，是工作生活的永恒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征性区别——也就是好收成了可人们会挨饿，人们对产品有需求了可生产资料一动不动——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一刻。这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在货品丰富的情况下，岗位稀缺的情况被持续再生产出来。正是这一场危机的动力，这一场劳资关系再生产的危机的动力，成为本文探讨的对象。<sup>[3]</sup>

##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资本的结果尽管复杂，却只有一个本质性的前提条件：人们必须缺少直接渠道，去获取他们认为是生活必需的货品，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只能通过市场的中介实现。由此才有了“无产阶级”这个词本身，起初它所指的是罗马城市里的无地公民，他们没有工作，于是先被国家配发面包和竞技场驯服，最后成为了雇佣兵。但是，无产阶级的条件在历史上并非普遍：纵观历史，全球的农民都能直接使用土地，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夫或者牧人，即便他们几乎总是被迫将一部分产品交给统治阶级也是如此。由此才有了“原始积累”的需求：把人们与他们最基本的再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然后产生出对商品交换的全盘依赖。<sup>[4]</sup>在欧洲，这个过程是在 50 和 60 年代完成的。在全球范围内，这个过程现在才开始接近完成，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局部和中国是例外。

将人们与土地相分离，这个起步一旦达成就无法休止。为了让资本和“自由”劳动能在市场时时碰面，这个过程必须恒久重复下去。一方面，已经出现在劳动市场的资本需要大量的人缺少生产资料的直接使用权，而这些人希望

用工作交换工资。另一方面，已经出现在商品市场的资本需要大量的人已经获得工资，而这些人希望用金钱换取货品。缺少这两个条件，资本自身的积累能力就受限，既不能大规模生产，也不能大规模出售。1950年前大规模生产的规模在英美之外受限制，正是因为市场的规模有局限，也就是说，因为存在一个巨大的，可以说自给自足的农民阶级，他们并不主要依赖工资生活。战后时期发生的事情就是全球剩下的农民被趋势性消灭，他们先是无法自给自足，后来只能拥有土地，自己在上面工作，已经算不上农民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单再生产”一章那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这个结构性特点。我们会将这个概念放在生产-消费的整个周期当中，并阐释为资本与工人关系的再生产。<sup>[5]</sup> 简单再生产的维系不是出于“习惯”，也不是因为工人拥有了虚假或不充分的意识，而是因为物质强制。这就是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也就是这么一个事实：他们总的来说只能购买一部分自己生产的货品：

[资本]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

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sup>[6]</sup>

所以，资本的积累不是生产领域或者消费领域的组织问题。过分强调生产或者消费往往会对产生片面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也就是“生产过量”或者“消费不足”。雇佣劳动架构起整个再生产过程：工资将工人分配到生产中，同时分配工人的产品。这是资本的不变量，独立于地理或历史的特殊性。再生产如果崩溃，创造的既是生产过量的危机，也是消费不足的危机，因为两者在资本之下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从简单再生产结构的展开前进到危机理论，因为简单再生产就其本性而言同样是扩大再生产。正如劳动必须回归劳动市场来补充工资基金，资本也必须回归资本市场，将自身利润再投资到生产的扩大之中。所有资本都必须积累，否则就会在同其他资本的竞争中落后。竞争价格的形成加上行业内可变成本的结构，两者导致行业内部的利润率出现离散，这又会相应驱动以效率提升为目标的创新，因为通过将成本压低到行业均值以下，企业要么可以囤积超级利润，要么可以用降价赢得市场份额。但是，成本下降无论如何都会导致价格下降，

因为行业间的资本流动会导致行业内利润率趋同，此时寻求更高利润的资本发生运动，供应（和价格）因此上下变动，导致新投资的回报在行业内均值上下波动。资本的这种恒久运动还把减少成本的创新扩散到各行业，从而建立了利润力（profitability）的规律。这个规律迫使所有资本将利润最大化，而不论自己身处的政治和社会参数。相反，如果利润力下降，那为了重建积累就只能进行“资本价值的屠杀”和“释放劳动”，为利润力重建条件。

只是，这个增殖过程的形式主义概念没有把握到马克思的分析所落脚的历史动力。利润力规律本身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因为规律还需要新工业和新市场的出现。利润力的升降充当了资本家阶级的信号，表明特定行业已经发生创新了，但是，重点是假以时日，产出的构成——相应也包括雇用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曾经占据大部分产出与雇用数的工业增长放缓了，而新工业在两者中的份额正在增长。我们在这里要考察需求有哪些决定因素是独立于供应的决定因素之外的。<sup>[7]</sup>

需求会随着一定产品的价格而变化。价格高了，产品就只有富人去买。随着节约劳动的过程创新积累起来，价格就会下降，将产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在这种转变的转折点下，创新会使一定产品的市场巨大地扩张。这种扩张

的伸展超出了现有企业的产能，价格下降的速度就比成本下降慢，导致一个时期的高利润力。于是资本涌进行业，把劳动也捎带上。不过在某个节点，市场就到达极限了，也就是说，市场饱和了。<sup>[8]</sup> 此时创新使总产能涨超了市场规模，价格下降的速度比成本下降快，导致一个时期的利润力下降。资本就会离开行业，驱逐劳动。<sup>[9]</sup>

这个经济学家称为工业“成熟”的过程已经发生过许多遍了。农业革命首先在早期现代的英格兰爆发，最终触及了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极限。劳动过程创新——比如将零星的土地持有整固，废除敞田制，按照自然优势来区分土地使用——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下，意味着劳动与资本都被系统性地赶出了农村。结果英格兰迅速城市化，伦敦成为了欧洲最大城市。

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动力就在这里发挥作用了。工人被迫抛出农业以后，不是任由他们在城市永远懒散的。他们最终被承担了英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制造行业，特别是在不断增长的纺织业从羊毛过渡到棉布的时候。但是要再次说明，劳动过程的创新，比如珍妮纺纱机、走锭细纱机和蒸汽动力改善，这些意味着纺织业也开始抛出劳动和资本。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中的行业，它们占总雇佣劳动和总积累资本的比例出现下滑，这就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行业铺

好了道路，比如化学、通信、电力和以引擎为动能的商品。正是劳动和资本这种根据级差的利润率反复出入的运动，保证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延续下去：

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 膨胀 ] 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sup>[10]</sup>

从这个角度看，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条件的持续再生产。由于利润力下降而无法在某行业上再投资的资本，将往往在劳动市场寻找被其他行业抛出的可用的工人。资本和劳动的这些“自由”量此后会在利润率更高的扩张中的市场寻求雇佣，又或者在全新的生产线上联合起来，为尚未存在的市场制造产品。由此越来越多的活动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增殖过程，商品也从奢侈品市场扩散到大众市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商业周期理

论里描述了这个过程。<sup>[11]</sup> 他注意到，旧行业的收缩甚少顺利平和，通常伴随着工厂倒闭破产，因为在竞争性的价格战之中，资本会试图将亏损相互转移。当多行业同时收缩的时候（这种情况不少见，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一套相互联系的技术创新），衰退就成为必然。熊彼得将这种资本与劳动的脱节称为“创造性毁灭”。“创造性”不但指毁灭受创新的刺激，还因为毁灭为新投资和创新创造了条件：在危机之中，资本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折价后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可见衰退犹如森林大火，为新芽的成长铺好了道路。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类似熊彼得周期性增长理论的东西，只不过往里面加了工人的抵抗（可能还有生态的极限）作为外部制约。因此，马克思主义将危机理解为自我规范的机制，同时还补充了一个信念，坚信危机为劳动获得权力（或者修正资本主义的生态毁灭趋势）提供了机会。在这些时候，“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只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没有包含诸如“内在”动力和“外在”局限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动力正是彻底透过这个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而将自身彰显为自己的局限，这种彰显不是通过繁荣与破灭的周期，而是通过资本自身的积累条件的长期性（secular）恶化实现的。

## 再生产的危机

人们通常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笔记中寻找长期性衰退的理论，这些笔记由恩格斯编辑整理成《资本论》第三卷的13—15章。在那里，利润率在各行业趋同的趋势，再加上所有行业的生产率的上升趋势，被理解为利润力在全经济体范围的趋势性下降的原因。几十年争论的中心就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增加”，在这一点之上才有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以及各种趋势与反趋势相互交织的情况。不过，参与争论的人通常忽略了一点：资本的这同一个构成还支撑了另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通过周期性危机与长期性危机趋势表现出来的，可以解读为马克思对上述论述有更多思考后的重新构建。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sup>[12]</sup>

这一章紧接关于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三章内容，一般被人们解读为开放性较弱。读者只关注马克思第一部分的论证如何阐发工资率的内生决定因素。马克思在那里表明，通过对某种程度的失业进行结构性维持，工资被限定在符合积累的需求的水平。失业人员的“产业后备军”随着劳动的需求增加而收缩，相应导致工资增加。工资增加随后会侵蚀利润力，导致积累放缓。随着对劳动的需求减少，

后备军会再次增长，此前的工资增长也会消失。如果本章的论证只有这个，那么“一般规律”就只不过包含了简单与扩大再生产理论的一个脚注。但是，马克思正要开始展开自己的论证。如果失业人员往往被资本主义的循环重新吸入，成为产业后备军，也就是说依然失业，但对劳动市场的调节来说必不可少，那么他们同样往往超出这个职能，重新确认自己是绝对多余的：

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sup>[13]</sup>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与自身的增长天然相伴，这个规律就是：资本在工人群众当中生产出相对

多余的人口，这些多余人口往往成为常备的过剩人口，对资本的需求来说绝对多余。<sup>[14]</sup>

马克思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即便马克思描述的趋势在失业性复苏、贫民窟城市和工作不稳（precarity）一般化的时代当中越来越明显，这个问题也不是直接明了。马克思在第一卷法文版里有更清晰的论证。他在那里注意到，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积累就必须越快去继续维系就业，“社会资本的增长本身会成为新的技术变革的源泉，而这些技术变革又会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这不仅仅是特定的高度集中的行业的特点。随着积累的继续，“大量增长”的货品拉低了利润率，加剧了各行业的竞争，促使所有资本家去“节约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就在这种高压下集中起来了；它们体现为使全部大的生产领域里的资本构成发生革命的技术变革”。<sup>[15]</sup>

那么新产业呢？新产业不会收纳闲置的就业吗？马克思透过商业周期的整个运动内外，辨认出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向，这将导致新行业与旧行业的劳动需求同时下降。“一方面，在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sup>[16]</sup> 这就是“一般规律”的秘密：

能节约劳动的技术，具备在行业内外一般化的趋势，导致劳动需求的相对下降。除此之外，这些创新还无法扭转，要是利润率恢复了，这些创新就不会消失（我们确实会看到，恢复利润力的条件通常是在新产业或者扩张中产业那里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于是劳动需求的相对下降没有了节制，带来剥离资本积累的风险，继而变成绝对下降。<sup>[17]</sup>

马克思不是从价值规律的抽象分析中简单推演出这个结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 13 章试图为这个趋势提供经验证明。在那里，他提供了英国 1861 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数据表明从雇用数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所引发的新产业“也不是很大”。他给出的例子有“煤气厂、电报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这些都是高度机器化和相对自动化的流程，它们的雇用数总共不到 10 万人，相比之下，纺织业和金属业的劳动力超过 100 万人，由于引入了机器，他们正在经历萎缩。<sup>[18]</sup>只看这些数据就能明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刚刚出现的时候，它们对劳动的吸收远不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多。马克思在 25 章进一步提供了数据证明，1851—1871 年间，雇用数只在尚未成功引入机器的旧产业那里继续大规模增长。可见，马克思所预期的这个长期性走向，也就是劳动需求先是相对下降然后绝对下滑，是出自他当时能获得的证据。

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危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所说的定期的生产危机、消费危机甚至积累危机。从这些周期性危机涌现出来的是这样一种长期性危机，是劳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的危机。如果扩大再生产表明了工人与资本被萎缩的行业赶出以后，会到新行业或者扩张中行业另谋出路，那么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要预示的就是假以时日，无法将自己重新安插到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工人和资本会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无产阶级在趋势上会变成自己再生产的过程的外在因素，这个“自由”的工人阶级不但脱离了再生产资料，还脱离了工作本身。

马克思认为，这种危机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人们被还原为工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成为工人，因为他们一旦工作就会损害自身存在的可能性的条件。雇佣劳动离不开资本积累，也离不开节约劳动的创新积聚，这些积聚假以时日会减少劳动需求。“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sup>[19]</sup> 似乎节约劳动的创新所引发的货品丰富一定导致岗位丰富。但是在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货品因此才会丰富——只能表现为岗位稀缺，表现为多种形式的不稳就业。<sup>[20]</sup>

马克思对一般规律的说明，本身是对 23 章开头的论点进行的再说明和戏剧性展开。他在那里有点武断地写道：“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论点意味着资本的扩张使产业工人阶级的扩张成为必然。但是，无产阶级不等同于产业工人阶级。根据马克思在本章结论的论述，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在过渡之中的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工人阶级是具备被排除在工作之外的趋势的。这种阐释的支撑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提供的唯一的无产阶级定义，就在上述论点的脚注里：

“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sup>[21]</sup>

## 从再工业化到去工业化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对解读《资本论》的影响已然明了，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遭到忽视，因为在“贫困化命题”的名义之下，这个规律在整个二十世纪屡屡被人采用和抛弃。人们认为，马克思的失业率增长、工人人口的贫困化因此加剧这个预期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互相矛盾：马

克思死后，产业工人阶级既增长了规模，生活标准也有提升。不过，除了这些趋势通常被过分宽泛化以外，近期出现的趋势反转也使贫困化命题更有说服力了。过去三十年，我们见证了产业工人的相对数量在全球出现停滞。低薪服务业部门在高 GDP 国家已有一席之地，而在低 GDP 国家，贫民窟居民与非正式工人则出现难以匹敌的爆发。<sup>[22]</sup> 那么贫困化命题终究是不是正确的？这是错误的问题。问题应该是：这个命题在什么条件下成立？

马克思在 1867 年就常备的过剩人口有过写作。只是他描述的趋势，是新产业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对旧产业机器化后抛出的资本与劳动在比例上吸收得少一些，而这个趋势在现实中和他预见的不同。我们在下图可以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在他的时代在英国是正确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早期的上升中产业——比如化学、铁路业、电报业等等——无法填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雇用数下滑。结果，制造业雇用数的增长率出现稳步下降，在二十世纪初还似乎固定为绝对下降趋势。马克思没预料到的和 1890 年代的实际情况，是出现了同时吸收劳动和资本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得以将增长率的下滑推迟了半个世纪多。这些新产业以汽车和消费者耐用品为主，它们的增长依赖了二十世纪的两项进展：国家在经济管控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



图 1：英国制造业雇用情况（1841—1991）

来源：Brian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Europe, 1750—2005*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消费者服务转型为消费者商品。<sup>[23]</sup>

马克思在 1860 年代写到的新兴产业——煤气厂、电报业和铁路业（我们只会再加一个电力）——在当时已经开始向消费者供给。只不过，这些技术所产生的消费者服务起初只是给富裕精英保留的享乐，后来与向产业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提供的服务相比，也只居于次位。铁路业出现的时候是采矿业内部用来节省劳动的创新，后来才延伸到其他产业。铁路业成为消费者服务，要到全国性的铁路基

基础设施在国家支持的卡特尔发展之下实现扩大的时候。即便成本下降，通过铁路实现的机器化交通也向越来越多人开放，但是这个消费者服务依然保留了起初在产业内部作为“流程创新”而使用的时候许多特点。客货两用的全国性铁路在建设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资本与劳动，但是在随后相对自动化的流程那里，并不需要那么多资本和劳动进行维护。<sup>[24]</sup>

在国家道路资金的补贴之下，突飞猛进的汽车业最终将机器化交通这项消费者服务转变为一种货品，可以供个人消费购买。产品的这种分类和复制，也就是节省劳动的流程创新转变为吸收资本与劳动的“产品创新”，意味着这个产业能够随着市场扩张而吸收更多资本和劳动。电报业向电话的转向也是类似的情形，电子制造业到消费者电子产品也一样。在这些情况之下，某种集体消费的服务（通常从产业内部的中介服务脱胎而出）转型为一系列可供个人购买的商品，由此开辟的新市场随着成本下降和产量增加而相应成为大众市场。这就为二十世纪的“大众消费主义”提供了基础，因为即使生产率的增加减少了生产的相对成本，这些新产业还是能够同时吸收大量的资本和劳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工人、越来越多的工人获得稳定的就业。

不过，正如在这过程背后支撑着的史无前例的国家赤字所表明的那样，资本并没有内在一致的趋势，能够允许产品的每一代持续出现创新，从而抵消节省劳动的流程创新。相反，产品创新本身的目的通常就是流程创新，致使手段只能加剧了起初的问题。<sup>[25]</sup> 汽车和消费者耐用品产业在 1960 和 70 年代开始抛出资本和劳动的时候，微电子等新行业即便在几十年后也没能吸收这些过剩。诸如上文所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种种创新，是涌现自产业内部和军队内部的特殊流程创新，要到近期才转型为多样的消费者产品。从产生新就业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向的难处不仅在于监控软件市场很难，还在于微电子产业所产生的新货品，它们吸收的资本和劳动量有变小的趋势。诚然，电脑本身不仅降低了劳动门槛（限制在全球少数工厂的微芯片产业，机器化程度高得难以置信），还通过迅速增加自动化的程度，具备了降低各行业劳动门槛的趋势。<sup>[26]</sup> 所以，电脑产业的崛起并没有如熊彼得预料的那样，复活了某个停滞的产业部门并恢复扩大再生产，而是正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助力了去工业化和积累规模的减少。

## 去工业化之下的人口： 服务业与贫民窟

去工业化开端于美国。1960 年代，美国制造业的雇用比例就开始下降，到 80 年代就变为绝对下降，但是，这个趋势很快普及到其他大多数高 GDP 国家，甚至到了被人们看作“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sup>[27]</sup> 低薪服务业的爆炸性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制造业雇用的下降，不过，服务业证明了自己没能替代制造业，成为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过去四十年，美国和欧洲的平均 GDP 增速按周期来算是越来越低的，只有 90 年代末的美国是例外，当时实际工资停滞，工人逐渐依赖信贷来维持生活标准。

如果正如我们所说，增长中的生产率将资本和劳动从某些行业那里解放出来，这两者又在新工业或者扩张中工业那里重新组合的时候，扩大再生产能产生动力增长，那么这将对理解服务行业的增长有重要影响。服务业从定义来看，几乎就是指生产率除了实现边际增长外难以为继的那些活动。<sup>[28]</sup> 急剧改善服务业效率的唯一已知方法，就是将服务变为货品，然后用历经时日效率越来越高的工业流程生产。许多制造业的货品以前实际上就是服务业：碟子以前是富裕人家的仆人洗的，现在洗碗机执行的效率更高，

生产洗碗机所需的劳动也越来越少。那些依然是服务业的活动恰恰有这样的趋势，证明在货品的世界之中不可能找到它们的替代者。<sup>[29]</sup>

当然了，资产阶级的“服务业”概念的不精确早有盛名，其中包括了上至所谓“金融服务业”，下至神职人员和酒店清洁工，还有某些外包的制造业岗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尝试将服务业的范畴同化为非生产劳动范畴，但是如果反思一下上述的划定就会明白，服务业更接近马克思“形式上的从属”概念。马克思早已批判过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形而上理解（将前者理解为生产货品，后者不生产货品），代之以两种劳动的技术性区分：一种是作为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而执行的劳动，另一种是在该过程之外，以无中介消费者为目的的劳动。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部分认为，理论上所有非生产劳动都能成为生产劳动，因为这样做只意味着这种劳动已经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增殖过程。<sup>[30]</sup> 不过，形式上从属的活动只在绝对剩余价值的意义上是生产劳动。要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话，必然要转化生产的物质过程，使其便于快速增加生产率（协作、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和机器<sup>[31]</sup>），这就是实际上的从属。罗索恩（Rowthorn）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讨论“技术停滞的服务业”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马克思

的一个劳动过程概念，这个过程只是形式上从属，尚未实际上从属。

因此随着经济增长，“服务业”的实际产出也有增长趋势，但是增长的途径只是增加雇员，又或者加大现有雇员的工作强度，也就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而非相对剩余价值。这些行业里有多数的成本几乎全部来自工资，所以为了让服务业继续低廉又获利，尤其是购买服务的人本身就是穷人的时候，工资就必须压低。因此才有了美国的麦当劳和沃尔玛，又或者印度和中国的大批非正式无产阶级。<sup>[32]</sup>

今天某些圈子认为，高 GDP 国家的去工业化要怪在低 GDP 国家的头上，而另外一些圈子认为，低 GDP 国家的去工业化要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头上，这些政策是服务于高 GDP 国家利益的。这可谓一种特异的分析失败。事实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同一场全球转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二战后的时期初叶，有许多国家转向了“福特制”，也就是在来自高 GDP 国家、政府赞助的“技术转让”条件之下，才得以可能进口的规模生产的方法。人们通常将福特制理解为国家性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以资本与工人共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这个“共识”为基础的。但是，福特制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以制造业内部的贸易国际化为前提的。1950 和 60 年代，欧洲和日

本在国际贸易的复兴当中受惠最多，这些国家的资本针对国际贸易而生产，因此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规模经济，从而超越了自身国内市场的限制。到 60 年代中期，巴西和韩国等低 GDP 国家的资本也在做一样的事情：它们在快速扩张的国际出口市场那里即便只占领到一小部分，也实现了远超自己的本土市场能够实现的增长。所以说在 1973 年前的时期，贸易国际化是与所有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高速增长相联系的。

1973 年以后，情况变了。制造业市场开始饱和中，少数国家能为整个世界提供制造品逐渐成为现实（现在一家中国企业就可以为供应世界过半的微波炉）。因此接下来才有了劳资关系危机，也就是生产过量与消费不足结合起来的危机，这场危机以全球的利润率下降为信号，失业和不稳雇佣的形式从此花样百出。随着一直以健康的全球增长率为基础的劳资关系协议破裂，工资也停滞了。所有国家里的资本更依赖国际贸易了，但是从此以后，某些国家里的资本的扩张只会以其他国家里的资本为代价。低 GDP 国家虽然还没赶上高 GDP 国家，却参与到同一场国际危机里去了。“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sup>[33]</sup>只不过将它们向新的不稳定的国际框架过渡加速了。去工业化，或者至少是工业雇用停滞，于 1980 和 90 年代在正

在工业化的国家当中几乎普遍出现了。<sup>[34]</sup>

对依然是农业国、或者依赖传统出口或资源出口的国家来说，危机来得还要绝望，因为“传统”商品的价格在需求下滑的情况下出现崩溃。我们在这里同样必须回顾长期的趋势。二战后时期的初叶，农业发展从根本上增进了廉价食物的普及度。第一，二战后合成肥料由去动员化的军工厂制造，这样提升高收成种别的谷物土地的生产率就成为可能。第二，引擎机器化提升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这两种技术都适应了热带气候的生产。所以，朝鲜战争催动农产品价格上升，全球的农民被高价拉入市场后，这些价格几乎马上就持续下降。因此1950年代，低GDP国家早已开始退出农业。这个结果，不仅是因为农民按照市场可行性被区分和驱逐，还是因为人口本身在大量增长（增长靠廉价食物和现代药物维系）。家庭人数扩大意味着传统的继承方式会粉碎土地所有，同时随着资源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人口密度的增加也会拉扯到生态极限。<sup>[35]</sup>再次重申，1980和9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迫负债国撤销农业补贴，这样做只不过是已经岌岌可危的农民再用一记闷棍击倒。

所以必须清楚一点，去工业化不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引起的。世界上大多数产业工人阶级如今生活在“第

一世界”之外，但是全球大多数人口也一样。低 GDP 国家产业内工人的绝对数字更高，但相对自身人口来说并不高。即便农业雇用数崩溃了，相对工业雇用数也依然下降。正如高 GDP 国家的去工业化锁定了退出制造业和服务业无法取而代之两种情况，低 GDP 国家贫民窟的爆炸式增长同样锁定了退出农村和工业无法吸收农村过剩的情况。世界银行曾经暗示，世界各地的过剩人口增长不过是过渡性因素，而现在他们被迫承认这个状况是持久的。有超过 10 亿的人口无休止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两地的贫民窟之间，勉力维持生计，搜寻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临时工和散工。<sup>[36]</sup>

### 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我们已经描述了资本积累在长期如何导致旧行业抛出劳动和资本，这两者又如何在新行业和扩张中行业重新组合。这是资本的动力系统，同时又成为资本的局限。既然资本无论能否找到投资的生产性场所都会被抛出，那就会出现这个情况：系统里堆积的不仅有资本不再雇用的过剩劳动，还有这些“过剩”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描述了这些现象。<sup>[37]</sup>我们在本文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人口过剩现象，因为马克思的

读者大部分存在忽视这一点的趋势。我们会在这个末尾部分检视资本过剩现象近期的一些表征，因为过剩资本的历程既是过剩人口历程的中介也将其扭曲。不幸的是，我们在这里只能稍稍触及一下这个主题，更为详细的处理要留待《尾注》第3期。

美国在二战中毫发无伤，成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小的农业人口（从雇用比例来说）和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据估计，美国当时承担了世界过半的产出。<sup>[38]</sup> 美国还在战后涌现为出类拔萃的全球债权人，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还有最多拖欠自己巨额债务的盟国。在这些条件之下，大萧条以来一直蹒跚前行的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美元建立为国际储备货币，只有它可以直接受黄金支撑，其余所有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固定汇率系统由此创建，不过也允许定期调整）。一方面，欧洲各国的货币与美元锁定以后，在重建阶段临时减缓了预算平衡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推动重建而为自己的资本出口保证了市场，而这反过来推动了欧洲购买美国货品。这样一来，欧洲的预算赤字就通过美国资本出口获得填补，跨大西洋的贸易持续失调也在实际层面写入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但是，这个失衡很快就会蒸发。

在美元通过直接外国投资（通常是军事投资）、贷款和信贷流入的背后，欧洲各国和在欧洲营业的美国企业一直在进口美国的资本品，借此扩大欧洲的生产产能。这个过程同样发生在日本，朝鲜战争就发挥了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不过美国补贴没有在日本出场）。所有这些都受到美国的鼓励，此时美国在推动自己的大规模生产和分配技术转让到全球各地。不过到 1960 年代，许多国家自己的产能已经发展到不再需要依赖美国进口的程度了。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当中还有一些开始和当初依赖的美国生产商互相竞争了。这种竞争首先在第三市场上演，然后在美国自己的国内市场。美国的贸易顺差随后在 60 年代中逆转，标志着全球制造业产能的构建正在接近极限了。从此以后，竞争出口份额将成为零和博弈。

虽然在战后繁荣期的时候，美元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使得逆差国实现快速增长，但目前阶段的变化就意味着美国的资本出口愈发推高通胀。<sup>[39]</sup> 美国对越战的预算赤字螺旋式上扬只能加剧通胀问题，因为美元似乎无法避免贬值以后将有侵蚀储备的风险，继而所有国家的支付平衡会把固定汇率制度拉扯到极限。结果，一方面许多央行开始以美元换取黄金（迫使美国在 1968 年实际上中止自由兑换黄金），而另一方面，以海外美元存款形式积累起来的过剩美

元，开始对出口基础型的经济体构成投机压力。一旦美元贬值，这些经济体将蒙受最大的风险，其中既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所以自己的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和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制造品进口相比，存在贬值的风险；还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因为本身货币兑美元要重新估值，它们的出口市场有被削弱的风险。美国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善意忽视”赤字的政策以后，就用美元贬值的威胁，向世界各国强加新的浮动美元储备货币本位，实际上将稳定美元的职责转移给外国央行，让它们被迫用过剩的美元买入美国证券，维持自身货币兑美元的价值。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都不再面临预算约束了，可以高筑债台和随意发行美元的同时，明知道外国别无选择，只能将美元重新回收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回收快速取代黄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国政府债务。<sup>[40]</sup>

回收后的过剩美元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极大的推动，成为这个市场当中货币市场的波动性突然高企的关键因素，因为过剩美元既是这种波动性的原因，也是对冲这种波动性的唯一资源。不过，未来三十年全球经济还被过剩美元转变了样貌和塑造了增长形式。这个“巨大的货币池”因为远远超出了全球投资需求，因此变成了国家与消费者债务和投机金融泡沫等扩大的源泉。从后一个意义来

说，过剩美元已经成为在地球游荡的幽灵，无论是哪一个国民经济体，只要不幸吸引到它们的注意力，就会堆积出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sup>[41]</sup>

这个泡沫和破灭的链条开端于 70 年代末的拉丁美洲。回收后的石油美元大量流入（受美元实际的负利率刺激）产生了一整个系列的风险金融创新（包括臭名昭著的“可调整利率借贷”）。当沃克尔（Volcker）<sup>[42]</sup> 意外重新上调利率的时候，这些创新全部崩溃了。将美国经济从随后的通缩拯救出来，使里根的加码凯恩斯主义开支计划得以进行的，正是从日本回收的过剩美元。不过美国感谢日本一片善意的办法，是在 1985 年广场协议中将美元兑日元贬值，把日本经济送进更大比例的资产价格泡沫里。1991 年泡沫最终破灭，这又相应引发了日本曾经出口制造业产能的东亚经济体一系列泡沫（日本当时是为了应付日元升值）。这些经济体，再加上其他本身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拉丁美洲经济体，随后都因为 1995 年的反向广场协议、美元重新估值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先后内爆。不过这样只是将泡沫转移回了美国，这时候美元升值所创造了美国股市暴涨落得个互联网泡沫破裂。2001 年，这个泡沫翻个身成为楼市泡沫，当时美国企业的债务需求盘子最终证明不足以吸收全球的过剩美元。如果说最后两个泡沫大部分局限在美

国（虽然楼市泡沫还延伸到了欧洲），那是因为美国的规模和偿还优先级的特权，所以它是在任何一段持久的时段内能够承受这些过剩美元流入的唯一经济体。

如果我们将这个现象放在上文所说的去工业化和停滞的背景之下的话，预示要以下这一点就很合理了：这个现象就是大风吹游戏。世界各地的产能再混入上升的生产率，它的扩散使全球的过度产能持续恶化。于是，超额产能如果要保持流动，就只能经由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断将这个累赘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通货膨胀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要吸收过剩，就只能在极低的短期利率及其产生的虚构财富这两者的基础上大举借债，而利率一开始上升，投资热情消减，泡沫就必然破灭，一个接一个。

许多人将这个现象称作“金融化”，这个含糊的说法暗示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或者商业资本的宰制加强。但是“金融崛起”的说法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既蒙蔽了金融资本的源泉，也蒙蔽了即便金融认为维持自身的回报率越来越难的时候，这个部门还继续增长的原因。关于前者，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描述过的过剩美元池，还要看到这个事实：非金融部门的停滞已经逐渐将投资需求转向了首次公开募股、企业合并和买断，这些为金融公司产生了费用和分红。关于后者，生产投资的机会贫乏，再加上扩张性的货币政

策，两者使得短期和长期利率都处于不正常低位，金融为了获得同样的投资回报，就被迫主动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风险率上升（金融以此衡量利润力下降）相应被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创新”掩盖，而这些创新倒塌的时候将需要国家政府定期的援助。

1997—2009 年高 GDP 国家史无前例的增长疲弱、整个周期里家庭收入和就业零增长、几乎完全依赖营建和家庭债务来维持 GDP，所有这些都证明，金融形式之下的过剩资本无力重新与过剩劳动结合，无力促进扩大再生产的动态模式。<sup>[43]</sup>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泡沫产生了全国铁路系统。连 1980 年代的日本泡沫也留下了从来没有充分利用的新产能。相反，过去几十年两次以美国为中心的泡沫，只在越来越无线的世界里，在经济上与生态上都无法持续的大片住房区那里，产生了一坨通信用的电线。“格林斯潘看跌”，这个“泡沫内繁荣”的刺激手段，失败了，它只不过表明将更多的债务注入早就债务缠身的系统那里，回报只会黯然。

……那中国呢？

对我们目前的论述提出的一个常见反对意见，就是指

出中国显然是全球停滞这个图景的例外，特别是停滞和全球去工业化与就业不足的趋势存在关联这一点。当然，中国在这些年变成全球的工业动力机，但是做到这一点不是通过开辟新市场或者创新新的生产技术，而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大力构建自己的制造业产能。<sup>[44]</sup>人人都假设这种扩张一定为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带来历史性增长，但是这直接就不对了。最新数据表明，按净值算，中国制造业在1993-2006年间没有创造任何新岗位，制造业工人总数徘徊在1.1亿人左右。<sup>[45]</sup>这没有乍一看那么意外，原因有二。

1、过去三十年，新南方工业体的工业化，首先以处理输往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为基础。这个工业化一直与东北的老旧毛式工业体被解体并驾齐驱。这或许能给出一部分解释，说明中国为什么不像德国、日本和（二战后初期的）韩国那样，在几十年奇迹般增长率的时候，实际工资却几乎没有增长。

2、中国的增长不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基础。该产业的低工资一直助力一系列行业的竞争力，包括纺织、玩具、汽车和电脑等等。现有的节约劳动创新融入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便在地理扩张出现扩大的情况下，每一组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依然实现了较低峰值

的工业雇用（相对总劳动力来说）。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在旧行业丢失了制造业岗位，而且新行业吸收的劳动相对产出的增长而言有变少的趋势。

十九世纪英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那个世界的 95% 人口是农民。今天，在绝大多数世界人口的生存要依赖全球市场的时候，一个国家为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生产这种能力会带来灾厄。这种灾厄既针对那些为了维系出口价格就必须继续贫穷的国家，也针对绝大多数劳动不再是必要，但是同样不能再依赖自己的资源生存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世界所剩存的农民就不再发挥现代化的武器的作用，也就是说，不再是劳动和消费者需求池，可以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而从中抽取。农民变成了纯粹的过剩。这是印度和下撒哈拉非洲的情况——中国也一样。

## 结论

今天许多人会谈及“失业性复苏”，但是如果“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生效，那所有资本主义复苏都有失业的趋势。“成熟”产业抛出劳动的趋势虽然便捷了扩大再生产，却也往往巩固出一个随后的扩张没有充分吸收的过剩人口。这是因为各行业的节约劳动技术具备适应性，也就是

说，新产品的制造倾向于利用最创新的生产过程。不过，创新过程是永久的，会在新旧资本当中普及开，而产品创新从内在上就受限于产品产生产出与雇用净扩张的能力。在这里，问题不光是各类产品创新要以更快的速度融合，从而吸收被过程创新抛出的过剩，问题还是产品创新的加速本身促进了过程创新的加速。<sup>[46]</sup>

不过，如果这个“一般规律”在二十世纪大半时间被搁置的原因是我们上文所说的那些，那目前全球就业不足的群体壮大就不能归于重新树立这个规律，至少不能简单归于。原因是，过剩劳动的轨迹已由马克思描述了，而过剩资本的轨迹对这种过剩劳动的轨迹的扭曲，不限于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最重要的是，过去三十年过剩资本在国际货币市场累积起来以后，某些通往绝对贫困的趋势通过工人阶级家庭的债务增长而被掩盖了。这个趋势一直让底层不用掉出全球总需求，同样妨碍了任何复苏的可能性。要实现复苏，只能通过“资本价值的屠杀”和“释放劳动”，原因是，虽然资产价格通缩可能增加新投资繁荣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劳动力不参与增殖只会导致消费者违约的程度增长，导致金融进一步崩塌。<sup>[47]</sup> 可见，今天不仅复苏后产生就业的产能，还有复苏的可持续性本身也成了疑问。

未来数十年，如果各国政府没法管理好全球通缩压力，那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井喷，又或者各国会进入长期缓慢的经济下滑。虽然我们没有天灾论的倾向，我们也要警告那些健忘者，有时候历史会出乎意料往前冲。尽管如此，但我们所等待的天灾不是什么未来的事情，而不过是当下沿着差劲的趋势往前继续。我们已经目睹贫穷和失业几十年的上升。那些议论仍是工业化国家的人说，没那么差嘛，大家咬咬牙还能挺，一句话，说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贫苦冷漠的人，随着债务水平退潮和家庭收入继续下行趋势，他们的假想将在未来这些年受到考验。无论如何，对世界一大部分人口来说，天灾的证据充盈得不可能否认了。任何对吸收这些过剩人类的提问都已将息。这些人类存在的目的只有被管控：分拆到监狱里去，边缘化到贫民窟和贫民营里去，受警察的规训，被战争消灭掉。

怀 谷 译

## [注释]

[1] FAO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FAOSTAT> (2009).

[2] Robert Rowthorn and Ken Coutts,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170, May 2004), 第2页。

[3] 我们注意到资本在货品丰富的情况下会产生岗位稀缺（因而使岗位出现人为制造的低于有效需求的稀缺），但这不是使生计符合“多一些岗位”需求的意思。我们将会说明，只要出卖劳动依然是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徒劳无功。

[4] 这不一定通过马克思所描述的暴力手段来实现。二十世纪有许多农民所以丧失土地的直接使用权，不是因为充公没收，而是因为在地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他们持有的那部分被超额划分了。小农由此越来越依赖市场，从而在面对大农的时候处于劣势，最终失去土地。

[5] 马克思有时候将简单再生产处理为抽象的思想试验，也就是不增长的资本主义，但如果止步于此，就会错过概念要告诉我们的积累过程的内在机制。简单再生产一章的结论是：“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

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第五卷，第 667 页。

[6] 《文集》第五卷，第 661-662 页。

[7] 由于认定了新古典主义垄断了这个话题，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避开需求问题，但是马克思没有如此矜持。扩大市场的强制以及为市场份额而斗争，这些是价值规律生效的根本，比如《文集》第五卷，第 496 页。

[8] 饱和不是产品买卖的绝对数量的问题，而是产能的增长率与需求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变化的问题。

[9] 这个过程只应用于消费品产业。资本品产业的趋势，是根据每个周期里“领先”的特殊消费品需求而扩张和收缩。不过这两个“部类”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那么简单。我们会表明，第一部类的节约劳动的“过程创新”可能会导致第二部类的“产品创新”，从而在整体上扩大了市场。

[10] 《文集》第五卷，第 729-730 页。

[11] Joseph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Martino Pub, 2005).

[12] 已出版的第一卷虽然卷数上更前，但写于 1866 - 1867 年，与大部分材料写于 1863 - 1865 年的第三卷相比，第一卷的版本要晚一些。因此，对第一卷 23 章和第三卷 15 章之间惊人的平行进行考量是合理的。这里假设马克思将第三卷的关键要素引入了已出版的第一卷，因

为他料到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第三卷相当困难。

[13]《文集》第五卷，第 742 页。

[14] 这种过剩人口无需完全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外”发现自己。资本可能不需要这些工人，但是工人还是要工作。因此他们被迫献身于最痛苦的工资奴役，这些奴役具备小生产和服务业的形式。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本段引文出自第 674 页、第 675 页、第 679 页。

[16]《文集》第五卷，724 页。

[17] 马克思有时候会将这展望为革命性危机：“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如果实际上能使整个国家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文集》第七卷，第 293 页。

[18]《文集》第五卷，第 513-514 页。

[19] 同上，第 727 页。

[20] 我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世界，在那里节约劳动的创新所减少的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数，而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数。不过，因为资本家的所得利润来自应付给工人的工资之外的剩余价值，所以减少每个工人的单独工时不符合资本家利益（当然了，除非国家或者工人暴动迫使他们这样做）。除非工资相应减少，否则减少工时将直接侵蚀利润。可见，由于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资本家必须裁减个体而不是每个个体的工时，从而减少相对于剩余价值的劳动

成本，将大量个体推上街头。

[21]《文集》第五卷，第709页。

[22]我们在本文倾向用“高GDP / 低GDP”（即人均GDP）来描述世界的分野，一边是富裕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一边是贫穷的多数国家。我们用这些不尽人意的表达，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分野不同，与令人生疑的政治和理论分析之间不存在联系（比如第一 / 第三世界，核心 / 边缘，发达 / 欠发达，帝国主义 / 被压迫）。

[23]我们在下文只会处理后一种现象。关于前一种现象，见下文“论新住宅问题的笔记”。[本文选没有收录。——译注]

[24] 铁路交通向消费者提供的时间经济，和向资本家提供的时间与劳动经济之间的差别，本身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时间观念逐渐统治社会而消失。这种观念认为时间是稀缺资源，要以最大效率来分配。

[25]“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和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文集》第五卷，第726页。

[26] 见贝弗利·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7] 除英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去工业化导致实际工业产出下降

的。1999年，制造业利润依然占美国总利润的46%，但是劳动力则只占14%。

[28]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Deindustrializati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97/42, April 1997).

[29] Jonathan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 (Humanities Press, 1978).

[30] 《文集》第八卷，392—420页。

[31] 《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第11—13章内容。——译注

[32] 许多服务业岗位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工资有差，也就是说，因为大规模的社会不平等。马克思注意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仆役阶级”数超出了产业工人（《文集》第五卷，第513页）。随着实际工资上升，中产阶级家庭（比如马克思自己）也越来越难以雇用仆人。二十世纪大半时期，这些赤贫的劳动力逐渐成为了回忆，最后却成为“服务”工，在现代世界的四面八方重新出现。

[33] “结构调整计划”指的是IMF与世界银行对经济体提供援助贷款时所附带的改革计划，往往包括减少政府和公共部门开支、增加对外开放、货币贬值等要求。——译注

[34] Sukti Dasgupta and Ajit Singh 'Will Services be the New Engine of Indian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6 (2005).

[35] 这不是说世界人口相对食物产量已经太多了。我们已经说明，

离开农村是和农业生产率大幅增长相关联的。即使世界人口增速随着人口分布即将完成过渡而放缓，人均食物产量也在持续增长。如果粮食生产过量没有导致肉产类动物的饲养需要补贴的话，人均产量还会再高。马克思的过剩人口概念只与资本积累有关，别无他物，没有一点马尔萨斯色彩。

[36] 见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中信出版社，2017。

[37] “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文集》第七卷，第 285 页。

[38] Daniel Brill,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John Richard Sargent, Matthijs van den Adel, eds., *Europe and The Dollar in the World-Wide Disequilibrium* (Brill 1981), 第 19 页。

[39] 对这个时期的通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要么归诸爆炸性的美国预算赤字（越战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要么归诸劳动力的抗争力量增强。不过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给出了信服的论据，认为就通胀是超额需求的指数而言，受限制的供应既不是充分就业也不是劳动反抗，而是最大积累程度，或者说最大产能利润率，而这个时期的

利润率下降是滞胀背后的主要因素。Anwar Shaikh, 'Explaining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Andriana Vachlou, ed.,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y* (Macmillan 1999)。

[ 40 ] 见 Michael Hudson ,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

[41] 以下内容大部分仰仗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的分析。特别见该作的西班牙语译本序: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What is Good For Goldman Sachs is Good For America: the Origins of the Current Crisis'* (2009)。

[42] 保罗·沃克尔 (Paul Volcker) 在 1979 - 1987 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 为遏制美国国内通胀, 从 1979 年起两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近 9% 至 20%, 但随后美国发生衰退, 失业率超过 10%。——译注

[43] Josh Bivens and John Irons "A Feeble Recovery: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weaknesses of the 2001-07 expansion", *EPI Briefing Paper* no. 21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8).

[44] 1990 年代日本将偏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下移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首先是东亚四小虎, 然后是东盟国家, 然后是中国。但是中国吸收这些产业后, 地区内部的生产等级结构遭到了损害。

[45] Erin Lett and Judith Banister, "Chines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costs: 2002-2006", *Monthly Labor Review*, no. 132 (April 2009), p. 30.

[46] 见贝弗利·J·西尔弗,《劳工的力量: 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47]见 Paulo Dos Santos, 'At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Household Debt in Contemporary Ba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Research On Money And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no. 11 (2009). Phelps 和 Tilman 在资本侧勾勒了创新因子的潜力在利用危机时的界限: Edmund Phelps and Leo Tilman, 'Wanted: A First National Bank of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Feb 2010)。



性别的逻辑  
论领域的分离与贱斥过程

The Logic of Gender  
The Separation of Spheres and the Process of  
Abjection

2010

---

发表于《尾注》第3期。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内部会用一些二元术语来分析资本主义之下宰制的性别化形式。<sup>[1]</sup> 这其中包括：生产与再生产，有偿与无偿，公共与私人，性（sex）与性别（gender）<sup>[2]</sup>。当思考性别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这些范畴是不准确的，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有时甚至存在误导。本文试图提出一些范畴，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 1970 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年危机后）性别关系的转变。

接下来的叙述受到了系统辩证法（systematic dialectics）的强烈影响，这种方法试图将社会形式理解为某个总体性的诸多互相连接的时刻。<sup>[3]</sup> 我们因此从最抽象的范畴转向最具体的范畴，将性别的表现当作一种“现实的抽象”（real abstraction）来追踪。我们只关注资本主义特有的性别形态，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人们毋须诉诸生物学或史前史便能讨论性别。我们首先将性别界定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分离，然后再确定被配置到这些领域的个人。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将领域做空间意义上的界定，而是像马克思谈论

生产和流通这两个分离的领域一样，将之界定为具备物质性的概念。

以上列举的二元术语有碍我们去把握这两个领域如今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它们缺乏历史特殊性，并推崇一种对性别“宰制”的跨历史理解。这种理解虽然将父权制当成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却并不使之在历史上专属于资本主义。我们希望描画出像“资本”那样专属资本主义的范畴。我们认为，这些二元术语依赖于这样一些范畴谬误：一旦我们试图说明 19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型，它们的错误就毕露无疑。家务活动或所谓“再生产”活动的形式已经日益市场化，并且这些活动虽然或许占据了家庭“领域”，却再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中占据和以前一样的结构性位置（尽管它们表露的具体特征不变）。因此，我们认为自己必须去澄清、改造和重新界定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那里得到的范畴，这不是为了理论的缘故，而是为了去理解人类为何仍然深深印刻着这种或那种性别。

## 一、生产 / 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

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sup>[4]</sup>

当马克思谈到再生产时，他指的不是特定商品的生产 and 再生产，而是社会总体性的再生产。可是，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谈到再生产时，他们通常想表明的却是劳动力商品的生产 and 再生产。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批判中，劳动力再生产和资本主义总体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不完整的。

### **I 当谈到劳动力时，马克思称它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物品**

尽管马克思谈到了劳动力商品的特定性，<sup>[5]</sup>但这个说法的一些方面还需多加注意。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劳动力与其承担者之间的分离。交换劳动力的前提，是这个商品被其承担者带到市场。但在这个特殊情况中，劳动力和它的承担者是同一个人。劳动力是这个人的活的劳动能力，就此来讲，它不能脱离其承担者。这样，劳动力的特殊性便提出了一个本

体论问题。

回到《资本论》，在第一章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商品”，并且仅仅几章之后，它最特异的表现，即劳动力，就会向我们显露无疑。按照马克思的做法，要使商品确实实地变成一种奇特而不自然的事物的话，从仿佛自然而然、不证自明的商品流通王国出发是对的。不过，我们不会只探究是什么组织了这些“物”、这些对象，而是将进一步从性别分析的角度出发，考察这些以自己的“自然”方式盘桓四顾、像拜物教化的商品那样仿佛没有历史的他者身体（other bodies）、人身对象（human objects）。但他们肯定是有历史的。

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是商品形式的核心。相应于此，《资本论》第一章介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马克思批判的始终。商品形式中这不可调和的两方面之间的分裂确实是一条指路线，引导着马克思追寻和揭露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其他矛盾形式。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这个矛盾。一方面，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完全单一的有别于他物的特殊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言，作为交换价值而被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具有一定的用途。此外，因为它是单一的，所以它是一个单独的单

元，而许多这样的单元聚合为一定数目、一定量的个别的物。这不是抽象的同质劳动时间的总和，而是具体、个别和可互相分离的劳动的总和。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商品代表着社会中“社会总劳动”的一定份额——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再生产所需要的平均时间。

这个绝不仅专属于“物”的矛盾是无产者存在于世的根本条件。就此来讲，无产者所对峙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主的商品堆积；而无产者自己也作为一个商品身处其间——所以这种对峙立刻成了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一次偶然碰面，同时又是主体和对象的相遇。

这种本体论上的分裂之所以存在，盖因劳动力既不是一个人，也不只是一件商品。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力是一种特异的、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商品。正是其特异性使劳动力商品在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或称活劳动能力）是其（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此外，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便会有更多内涵。这种特异的“生产”是那样特别，足以值得我们格外留神，因为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劳动力是从流水线上产出的。

那么劳动力是怎样被生产、再生产出来的呢？马克思

发现了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不过，他是否对劳动力的生产与其他商品的生产作了必要的区分？他写道：

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sup>[6]</sup>

当提出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时，马克思的结论是，该价值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等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不过在这里，它被神秘地还原为生产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但一大车“生活资料”并不能将劳动力作为一个现成商品生产出来。

如果将劳动力的生产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劳动力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即生活资料）将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了最终产品那里，而将这些商品转化成一个起作用的劳动力时所需的新劳动并未给该商品增加任何价值。依此进一步类推，我们可以说，就价值而言，劳动力只由死劳动组成。

根据上述引文，马克思将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必要劳动，还原为以实现自身（再）生产为目的而购买的“原材料”。因此对马克思来讲，这些原材料，这一堆货品转化为劳动力商品时所必需的一切劳动都不是活劳动，实际上，这些

原材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根本不被视作必要劳动。这意味着，不论这些活动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多大的必要，它们在结构上都被当成了非劳动。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把它们看成必要劳动，是因为将与工资等价的原材料转化为劳动力的活动发生在与价值生产和流通相分离的领域中。这些必要的非劳动活动之所以没有生产出价值，不是因为它们的具体特征，而是因为它们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不直接以价值形式为中介的领域。

价值要存在，就一定要有外在于价值的东西存在。<sup>[7]</sup> 同样，劳动要存在，要发挥价值尺度的作用，也一定有外在于它的东西存在着（我们将在第二部份回到这个问题）。自治主义女权主义者（autonomist feminist）会总结说，再生产劳动力的一切活动都生产价值，<sup>[8]</sup> 而我们会说，要使劳动力具有价值，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与价值的生产领域切割开或断联（dissociated）。<sup>[9]</sup>

## II 因此，劳动力的再生产以两个不同领域的分离为前提

如上所述，存在一个非劳动或额外必要劳动（extra-necessary labour）的领域，它包裹着死劳动（即以工

资购买的商品)转化为市场上能找到的活劳动能力的进程。我们现在必须来看看这个领域的特定之处。

“再生产领域”这样的术语并不足以指称这个领域，因为我们试图命名的不是一系列按其使用价值或具体特点加以规定的特定活动。像打扫或做饭这样同样具体的活动，其发生领域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它可以是生产价值的劳动；在另外的语境下，则又会是是非劳动。像打扫这样的再生产任务可以是购买来的服务，而购买预制好的饭菜在时间上也可以代替做饭。不过，要完全了解超越劳动力的性别是如何再生产的，我们就必须区分再生产是否商品化、货币化或批量生产。

因为现存的生产和再生产概念有局限性，所以我们需要找寻更精准的术语来划定这两个领域。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用两个富有描述性（因此有点笨拙）的术语来命名它们：**市场直接中介领域**（**directly market-mediated sphere**，简称 **DMM**），和**市场间接中介领域**（**indirectly market-mediated sphere**，简称 **IMM**）。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创造新行话，而是为了填补空白、集中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结构性特征。在行文中（详见第二部分），我们将会增加另一组描述性术语（有工资 / 无工资），以便详细说明这两个领域的细微特征。

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必然需要一整套活动；它们有些发生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那些作为产品或服务而被购买的商品），其余则发生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这些活动的差别不在于它们的具体特征。其中的每一种具体活动，譬如做饭、照顾小孩、洗衣、补衣等，有时会产生价值，有时却不会，这取决于它们发生的“领域”而非实际地点。因此，这里的领域未必是家里。界定着这一领域的，不是其中发生的活动中的一部分是否再生产劳动力，而是这些再生产任务与交换、市场以及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

这种概念区分会产生实际的后果。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中，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再生产任务，都是在直接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即符合所有市场要求）进行的。在资本和市场的制约与指挥下，无论何种商品和服务，都必须生产率、效率和产品统一这三方面进行竞争性生产。生产率的指标是时间，效率的指标涉及投入的经济利用方式。而劳动产品的统一则要求劳动过程的统一、生产者与产品关系的统一。

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内外进行的任务的差别是显然易见的。在领域中，首要的是资本家投资的回报率，因此所有活动（即便就其使用价值而言是“再生产的”）都必须达到或超越当前的剥削率和 / 或利润率。另一方面，在市场

直接中介领域以外，那些通过再生产其承担者来再生产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人，他们利用工资的方式并不受制于同样的要求。即便利用工资的方式一样，它们在对时间、货币和原材料的必要使用上，也还有着极大的不同。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不同，这里的再生产过程各方面都不受市场的直接决定。（对在国家组织的再生产中存在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我们会在第二部分加以讨论。）

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在时间上有一个特点。在该领域，所有活动依然按照一天 24 小时和一星期 7 天<sup>[10]</sup>来组织的，但这其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却并不起到直接作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透过市场的中介才适用这个抽象进程，这个中介将竞争性出售产品或服务所需的劳动过程内的时间量加以平均化。破产和损失利润会影响这一进程，为了减少生产商品所需时间而创新使用机器也是如此。因此，提高利润或市场份额宰制了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当然，机器化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中也是可能出现的，并且已经有了许多这类创新。不过，这里的创新不是为了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更多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缩短一定活动所耗费的时间，以便将更多时间投入其他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像照看小孩这样的活动，即便有些活动可以更快地完成，照看他们仍然要花上一整天，而这一时间量是不变的（我们在

第五部分会回到这个问题)。

此外，不同领域各自有着不同的宰制形式。依赖市场的，或者说无关个人的抽象宰制，是通过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的价值对比机制，来组织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的生产及再生产关系的。该领域的“直接市场中介”属于抽象宰制一类，因而是一种由市场决定（“在生产者背后”）的间接强制（compulsion）。因此，对于分配劳动**本身**来讲，直接暴力或计划在结构上并非必要。

与此相反，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不存在这种将具体活动的各种表现加以对比的机制——也就是说，它们没有被社会地决定。除了通过间接方式之外（即在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外，生产的要求改变了维持劳动力的要求），它们不受抽象的市场支配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客观制约规定。相反，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分工涉及其他机制，从直接宰制和暴力，到等级制合作形式（或曰最优计划分配）不等。<sup>[11]</sup> 这里没有无关个人的机制或方法来客观地量化、强制实现或者“合理地”均分这些活动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它们被分配给谁。当人们试图找寻这些活动“平等且公正的”份额时，就一定会持续不断地协商，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来“合理地”量化和均分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打扫厨房一小时意味着什么，照顾小孩一小时意味着什么：你

照顾小孩的一小时，跟我照顾小孩的一小时是一样的吗？  
这种分配由始至终只能是一个充满冲突的问题。

## 二、有偿 / 无偿

除了生产与再生产之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通常还会区分有偿和无偿劳动。像很多前辈一样，我们认为这些范畴是不准确的，并且倾向于采用有工资 / 无工资（waged / unwaged）的区分。当进一步说明市场直接中介和市场间接中介这两个领域与有工资或无工资的关系时，我们会根据社会确证原则（social validation）来阐明这些领域的重叠。此间我们将会考察这些被探讨的活动何以被称为劳动或非劳动；也就是说，它们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是否具备劳动性质。

有偿 / 无偿和有工资 / 无工资的差别，被工资形式，或者我们必须称为工资拜物教的东西模糊了。工资本身作为货币并不是领工资工人所做的工作的货币等价物，而是工人出卖其劳动力的价格，等价于以各种方式进入其再生产过程（即保证次日他们准备好并能够工作）的价值总和。<sup>[12]</sup> 不过，一旦工作日结束，那些为工资工作的人似乎就完成了他们的社会职责。工资没有覆盖的似乎就属于非

工作的世界（a world of non-work）。因此，一切“工作”似乎成了有偿工作的同义反复，因为人们“工作”之余的活动似乎是无偿的。然而我们必须记得，马克思证明了现实的活劳动从来没有以工资形式得到偿付。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活动是否有工资的问题没有意义。确实，TA 不去工作的话是拿不到工资的。工资劳动<sup>[13]</sup> 是工人为自己及其家庭获取再生产所必需资料的唯一途径。此外，工资给予的确证会影响活动本身的性质。当一个之前无工资的活动变成有工资时，即便它是非生产的活动，也会具有一些与抽象劳动相似的特征。确实，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的事实使劳动力的表现走向合理化和相互对比。相应地，这个劳动力将被预期最起码拥有社会平均表现，包括这种表现的所有特征和强度，而这个表现受该类劳动的社会平均规定并与之对应（显然，如果没有价值，便不可能将某类劳动与其他类劳动相对比）。在必要时间量内无法表现合格的个人是不能在未来出卖其劳动力的。因此，工资确证了这样的事实：某劳动力已被充分雇用，同时也被普遍地承认为社会劳动，无需考虑具体活动本身是什么、是否被“生产性地”消费。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有工资和无工资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差异和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之

间的差异有所重叠。当我们说有工资活动时，我们是在指一些社会活动；<sup>[14]</sup> 而无工资活动则是社会活动中的非社会活动：它们没有得到社会的确证，却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不过重要的是，它们都没有直接投射到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

我们看到，在这四个术语的相互作用中，一部分有工资活动会和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即那些由国家（国家部门）组织的活动重叠。在这些如鱼鳞般相互交集的范畴集合中，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有工资劳动的领域相交。这些有工资活动和市场间接中介活动是国家组织的再生产形式，不受市场的直接中介（见图 1）。这些活动再生产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但又是工资，因此也得到了社会确证。不过，这些活动并不生产价值，也不遵循直接市场中介的标准（见图 1）。它们是社会的，因为它们能通过价值的社会形式结算。因为不生产价值，所以这些再生产形式对资本来说是集体成本，也就是以税收的形式，扣除部分集体工资和剩余价值来间接支付。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过头来，考察一下“工资购买了什么”这个问题；即什么是工资要素，是什么构成了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工资所购买的，既有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也有直接（如聘用私人保姆）或间接（如为国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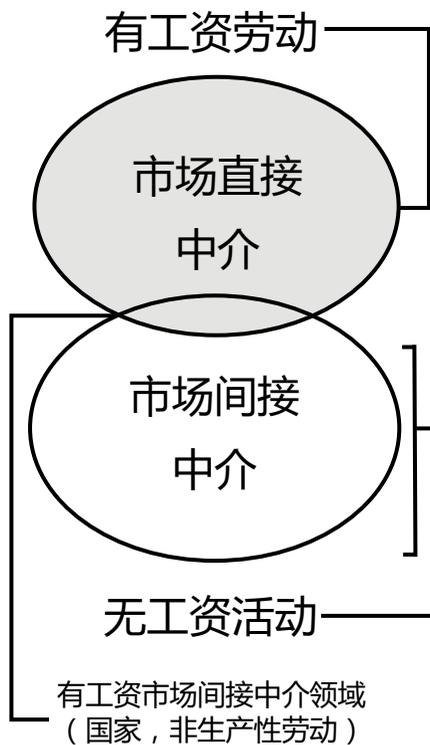


图 1: 市场直接中介 / 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与  
有工资 / 无工资领域关系示意图

教育开支缴税，这也是间接工资的一部分）参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服务。无论是否生产价值，<sup>[15]</sup> 这些服务都有一个反映于劳动力交换价值中的成本，暗示它们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剩余价值扣除的部分。

剩下的就是那些无工资，因而没有增加劳动力交换价值的活动了。这些是社会活动中的非社会活动，是劳动中的非劳动（见附注 1）。它们与社会生产切割开；它们不仅必须显现为，而且必须是非劳动，也就是说它们被自然化了。<sup>[16]</sup> 它们构成了一个其断联（dissociation）是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的领域：性别化的领域。

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讲到被指派到这个领域的个人。不过，我们首先要考虑另一对二元：公共 / 私人。

### 附注 1：关于劳动

我们将劳动界定为与非劳动对立，得到社会确证的如此这般的活动，因为劳动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定的社会性质。以其他因素界定劳动也是可能的，比如：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能量的消耗、快乐与不快活动之间的区别。但我们认为，这些界定中没有一个是能帮助我们理解无工资的市场间接中

介领域的活动的性质。这些界定只考虑到活动的具体属性，而如果用它们描述无工资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就会显得平庸或荒诞。照顾小孩算不算与自然进行交换？睡觉又算不算再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刷牙是劳动吗？给别人刷牙呢？我们认为我们对劳动的界定初看或许平庸，但却是唯一能够跳过那些无意义问题、从正确起点出发、研究这些活动的特定性质的界定。

### 三、公共 / 私人

很多人会用“公共”这个范畴指称国家部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通常会用“私人”领域这个概念指称家庭领域内的一切事物。我们认为，有必要坚持私人 / 公共的传统二分，以区分经济与政治、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个人与公民。<sup>[17]</sup>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私人”这个词指家务（oikos），在当时被认为就是经济领域。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降临，私人领域就超出了家务本身。

我们首先来看看，在“公共领域”之外、包括经济在内的“私人领域”概念，在例如女权主义理论当中是如何地不足。私人并不只存在于家庭领域当中，也不仅关乎家

庭活动。确切来说，它是家庭内外活动的总体。经济和政治（政治经济学）发生了结构性分离（这对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扩散），这导致私人领域也日益弥散，使家庭成为不过诸多“经济”或“私人”瞬间中的其中之一。因此，不同于大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描述，私人领域即家务这种情况，仅存在于经济与政治尚未分离的、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前现代关系语境中。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则相反，私人剥削的范围伸延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果私人是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总体，那么“公共”何在？马克思称，公共是以国家形式存在的源自社会的抽象。这一政治和司法的领域是对权利的<sup>1</sup>现实抽象，与构成市民社会内部的分层和差异是互为分离的。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实现和维持形式平等（这当然伴随着阶级不平等）——这是自私自利的私有者尽情地、不受国家节制或指示地积累资本所必需的——这种抽象或分离是必须的。胜任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现代国家，就是在这一点上区别于对应其他生产方式的其他国家体制（无论君主制还是古代民主制）。

这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而是一个“平等公民”的抽象“共同体”。因此，经济关系领域和政治领域（包括以“抽象平

等公民”之间关系为中介的不平等者的关系)之间的分化,使“公民们”只是根据国家和公民权利而取得了形式平等。结果,这些“个人”即便在“现实生活”(市民社会这个私人领域)中绝不平等,却仍然以平等的面貌出现在市场上。<sup>[18]</sup>“公共”这一抽象必须存在,恰恰是因为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受到了市场的中介。这个市场是私人劳动之间的中介空间,而这些私人劳动是在由私人(自私自利的)个体所有和经营的私人企业中被独立地、一个接一个地生产出来的。

那么,公共/私人、政治/经济、国家/市民社会等领域,它们与直接和间接市场中介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领域的相交点标志了它们在构成上的分离,并且界定了那些固定于其中之一一个领域者有别于固定于另一个领域者。<sup>[19]</sup>决定着这些差别的是:那些被国家界定的个人对于各自人身所承担的、视作自己财产的劳动力商品,是互相直接交换呢,还是经由那些与自己形式平等的人,进行间接、被中介的交换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被配置于各领域的个人了。当我们考察这一生产方式的开端时,我们首先看的是拥有不同权利的个人。他们被法律规定为两类不同的司法存在体(judicial being):男性和女性。之后在分析这对性/性别二

元术语时，我们会看到这种司法差别如何印刻在这些个人的“生理”身体上。现在，我们必须看一看，公共和私人的二分如何首先将作为男性和女性的个人固定在再生产资本主义总体性的不同领域之内。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他们的差异化权利——不仅包括私有财产权，也包括他们的人身中所拥有的财产。

这种独特的财产形式是工资关系普遍化的必要条件，因为价值的前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存在形式平等，因而虽然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之间存在着“真实的”结构性不平等，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交换还是能够实现。可是，只有通过背弃阶级差别，通过诉诸公民和他者这对二元，而且这种二元不是在对立阶级之间，而是各自阶级内部之间，“自由交换”才会发生。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没有必要使所有工人都在“公民”的标志下获得平等。就历史而言，“公民”只是命名了一个特定的、无论有产者还是某些无产者都能够隶属的范畴。因为资本主义司法关系通过重新建构公民与他者的差别来背弃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自身得以构成的历史条件就是各种形式的不自由。因此，我们把公民和他者映射为：男性（白人） / 非（白人）男性。

例如在北美奴隶制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奴隶主对奴隶

的财产权，必须将白人归为一类。我们会看到女性也被归类为他者，但另有原因。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白人 / 有色人 / 女人的这种关系中，保持与“黑人奴隶”相对立的“白人主人”的纯洁，以及在未来的资产阶级世代中严格维护对平等能指的宰制（“白人血统”及从中延伸的“白人母亲”）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在新世界以种植园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加上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混合语境中，白人女性和非白人女性也被严格区分，以保持这个科学分类法（taxonomy）。<sup>[20]</sup>

不过在上述生产方式中，公民 / 他者这对二元的构成，不是基于对奴隶制的负面定义，而是基于那些拥有而绝非没有同一种形式自由的人所组成的“自由”劳动。马克思所称的“自由劳动”（即对工资劳动者拥有的自由的定义）需要我们或许可称之为的“双重自由”：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  
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sup>[21]</sup>

但女性难道一直以来不都是工资劳动者吗？当然，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女性就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并且她们的劳动能力也被资本所利用；但她们直到相当近期才成为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拥有了“双重自由”。1970年代以前，女性确实自由得没有生产资料，但她们没有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自身所有物加以出卖的自由。<sup>[22]</sup> 包括自由择业在内的所有权自由，在历史上曾是一些人通过牺牲他人而拥有的特权。那些为争取政治和“公共”自由（或者说双重自由）而斗争的人，受到了双重束缚。他们被迫为自己的（“但差别着的”）平等申辩，同时又与其他同样为着平等，却在不同方面进行斗争的人存在利益矛盾。<sup>[23]</sup>

这在女性那里尤为如此。她们一方面要求身为理想的、平等的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身为差别者（as different）的自由。这是因为她们在资本主义下的“实际差别”（real difference）不是出自理想或意识形态，而是透过将女性界定为差别者的实践而体现并结构性地再生产出来的。这种“实际差别”缠在一张由各种相互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构成的网中，这些关系必然以公民、国家和公共领域为前提，而女性则在其中一方面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另一方面争取再生产权利。

因此，即便形式自由是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前提，

它所组织起来的由资产阶级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或法律领域可持续再生产的必然条件。无论“平等”的权利还是同等自由的权利，它们本身都不会重新组织财产的分配，更别提资本积累得以可能的各种条件（下文就能看到）。这些领域是协同工作的，否则就可能在国家内部通过法律或“政治”行动，消灭“差别”在历史上特有的实际存在形式。这可以归纳为透过公共领域消灭私人领域，即一场通过改革来实现结构上不可能的革命。

作为双重自由的“平等”是被结构性地剥夺财产的自由。这不是说它不值得。问题在于，它对于资本、国家及其伺候的宰制机器（*apparatus of domination*）是否也值得？正如我们大部分人的切身经历，在大部分女性的差别化自由被消灭之后，性别区分仍然持久地存在着。如果这种差别化的自由就是把女性束缚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东西，那为什么它的消灭没有将女性从“女性”范畴和性别化的再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

### **双重自由和性别盲目的（sex-blind）市场**

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史时就会惊讶地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不平等一旦获得司法机制的保障就会获得自

己的生命，使自己的法律根据变得多余。当很多国家的女性缓慢但确实地在公共领域获得平等权利时，在经济、在劳动市场的“私人领域”加剧女性不平等的机制却已经那样地根深蒂固，仿佛某种神秘的自然规律的作用。

讽刺的是，双重性别领域的再生产和女性被固定于其中一个领域，二者持续不断地被“性别盲目的”劳动市场机制重建着。这种机制的存在，并不直接为了男性 / 女性的区别，而是为了劳动力的价格或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其实，劳动市场如果要继续成为市场就一定是“性别盲目的”。作为等价物交换的场所，市场在对抽象价值进行纯粹对比时理应忽视具体差异。那么，“性别盲目的”市场又如何再生产性别差异？

一旦一群女性个人被定义为“有孩子的人”（见附注 2），并且“有孩子”这个社会活动被结构性地构造为一种缺陷，<sup>[24]</sup> 那女性就被界定为带着一种潜在劣势进入劳动市场的人。这种通过认定怀孕“潜力”具有市场风险而实现的系统性差别化，使所有体现“女性”这个能指的人被固定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这样一来，由于资本是一种“性别盲目”的抽象，因而它以拥有性为理由而具体地惩罚女性，即便这种“性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并且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再生产也是必需的。我们可以设想这

种情况：雇主不过问求职者的性别，而只奖励那些“最具灵活性”和“最可靠、全天候”的员工。即使如此，性别偏见会同样严重。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旦性差别被结构性地界定和再生产，作为社会成本更高的劳动力承担者的女性会向对立面转化，成为更廉价的劳动力商品。

报酬更为优厚的工作（即那些不只偿付单人再生产的工作）实际上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在那些技术性行业里，资本家愿意为工人的技术投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长期来讲会得到回报。因此他们会优待那些长期来讲最为可靠的劳动力。如果工人未来可能要走，那么她对资本家而言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了，就将获得更低的工资。那些看起来会“有孩子”的人被贴上的更低价码，不是由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中形成的技术种类所决定的。尽管女性在其中被贬低的领域充满了各种需要终身培训的活动，但这并不会提高她的劳动力价格，因为没有雇主会有偿购买她的劳动力。结果，资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以低廉的价格利用女性的劳动力。

实际上，“女性化”（feminization）的一般趋势并不等同于将性别盲目的市场性别化，而是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的积累条件下，在工作技术含量日益降低和日益临时化的情况下，资本转向利用廉价短期灵活劳动力的状况。我

们必须首先这样定义女性化，然后再考察作为女性化转向一部分的服务部门的兴起以及照顾和情感劳动重要性的日益提升。这一转向是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展开而产生的（对此过程，我们将在本文最后两部分加以阐述）。但首先，我们必须总结一下我们迄今学到的关于性别的东西，并尝试给出定义。这就要求我们去分析和批判另一对常见的二元：性与性别。

### 附注 2：论女性、生理和孩子

将女性定义为“有孩子的人”以这三个事实的必要关联为前提：（1）拥有子宫这个生理器官；（2）怀上孩子，即怀孕；（3）与怀孕的结果有着特定关系。将这三点结合关联起来模糊了两点：

一方面，防止、促使或迫使某些拥有子宫的人怀孕以及怀孕频率的机制。<sup>[25]</sup> 这些机制包括：婚姻制度、避孕用具的获取、将异性恋强制成规范的机制，以及（起码许多地方在很长时间里并且迄今依然存在的）与无怀孕风险的性形式（口交／肛交等等）相关的禁忌／耻辱。

另一方面，改变对于孩子的定义以及孩子需要多

大程度照顾的观念。曾有一段时期，孩子被视为半动物、半人类的生物，只需要得到清洁和喂食，直至他们长大成小大人（能工作的人）。而现代对童年的看法及其要求则把“养小孩”变成了无穷无尽的事业。

#### 四、性 / 性别

我们现在准备好讨论性别问题了。那么什么是性别？在我们看来，它是将特定个人群体固定于特定社会活动领域。这一固定过程同时造成了对两种相互分离的性别的持续再生产。

这些性别将自身具体化成一个由诸多规定着“男性气概”（masculine）或“女性气质”（feminine）的理想品格所组成的整体。可是，这些品格本身作为一系列行为和心理特质，是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不断转型着的；它们所关联的时期是特定的；它们对应于世界的某些部分；即使在我们所谓的“西方”内部，也未必具有对所有人来讲相同的意义。不过作为成对的二元，无论何时何地，即便各自表现形式不断流变，它们也都是相互依存的。

性是性别的一体两面。我们追随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批评能在 1990 年代前的女权主义文献当

中发现的性别 / 性二元。巴特勒正确地指出，性和性别两者都是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并且正是通过将“性别”“社会化”或与文化相匹配，性被贬低为自然 / 文化这对二元之中的“自然”一端。我们有类似观点，认为它们作为对立的社会范畴，在将性别去自然化的同时也将性自然化了。对我们来讲，性是性别对身体的双重投射的自然化，它将生理差别聚合进离散的自然化表象中。

巴特勒是通过批判身体的存在主义本体论而得出上述结论的，<sup>[26]</sup> 而我们是通过类比另一种社会形式而得出的结论。就像性别那样，价值也必然需要自己的“自然”一端（即价值的具体表现）。性和性别作为一体两面的双重关系，确实可以与商品及其拜物教的二重性类比。正如我们上文所解释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商品，同时既是使用价值也是交换价值。商品之间的关系是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

沿用这个类比，性就是依附于性别的物质身体（material body），就像使用价值依附于（交换）价值。性别拜物教是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它表现于这些身体之上，使它仿佛是这些身体自身的自然属性。性别是性差异在其一切具体属性那里都被抽象掉了的产物，这种抽象转变了并决定了它所依附的身体，就好比价值的现实抽象转变了商品的

物质身体一样。性别和性的结合使它们被赋予的属性具有了自然表象（“幽灵般的对象性”），仿佛性别的社会内容被“书写在”具体个人的“皮肤上”。

把性历史化与对资本进行透视法缩小后的批判可以相提并论，后者主张使用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而是超历史的。在这里，使用价值被认为是革命的积极遗产，这个革命又被认为能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外皮中解放出来。我们对性和性别进行类比时将再进一步，表示性别和性都是历史地被决定的。两者都是完全社会的東西，只能被一道消灭——正如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要在共产化的进程中被消灭一样。就此来讲，我们的女权主义价值理论分析与巴特勒的批判有一点应和，就是我们都将性 / 性别这对二元视为在现代性特有的社会条件下被社会地决定和生产的東西。

### **性别的去自然化**

不过性别并非静态的社会形式。对性别的抽象日益去自然化，使性仿佛更为具体和生理。换句话说，如果性和性别是一体两面，那么性别与其自然化对应物的关系则是不稳定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分歧。这种分歧有人称

为“麻烦”(troubling)，我们则称为“去自然化”。

随着时间的推演，性别被进一步抽象了，对性征的定义变得越来越随意。性别的市场化和商品化似乎使性别日益去自然化、日益脱离自然化的生理关注。人们或许会说，资本主义自身解构并去自然化了性别。自然（在其显得日益多余的同时，性别的必要性持续存在着）仿佛是性别的前提而非结果。用更熟悉的话来讲，就是反映了资本与劳动的“问题”：“自然”（性 / 性别这对二元的“自然”方面）对无产阶级的世代再生产变得越来越多余，同时被加诸“女性”身体的“成本”（或者说，性的对极）和日益女性化的趋势一样，对资本积累来说变得越来越紧要。因此，作为更低成本劳动力的性别的再生产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过剩人口的无产者后备军则越来越显得多余了。

女性性别所指称的东西（即被社会地印刻在“自然化”、“性别化”的身体之上的东西）不仅有一系列“女性气质”或性别化特征，本质上还包括价码。生理再生产要耗费平均（男性）劳动力无需承担的社会成本；它成了那些被配置了这些成本的人的负担，不论她们是否会有孩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化平均这个抽象被重新反映在对身体的组织上，好比交换价值——盲目的市场平均——重新反映在生产上，同时塑造和改造社会生产性质的组织和劳动

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别关系状况的转变发生在它所界定的东西之后。同理，性别持续地被重新强化和再自然化。

## 五、资本主义的性别史：

### 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创造到性别化活动的商品化

要理解去自然化和再自然化的辩证进程，我们首先要重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性别关系的转变，并尝试某种分期法。在这个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有很多切入点可供选择，而我们则选择了按家庭分期，因为家庭是连接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它们规定着无产者再生产的限度）的经济单位。我们必须搞清楚，家庭形式的变化是否与劳动增殖进程中的转变相对应。

#### I 原始累积与大家庭

在原始累积时代，资本家阶级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完美地微调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的关系，使得工人一方面被迫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生存，另一方面又能分得正好维持温饱的个人财产而不

必增加劳动力成本。<sup>[27]</sup> 确实，当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被构造起来时，它必须尽可能多、尽可能大规模地再生产劳动力，但程度又要刚刚好，使工人们维持温饱的部份只够糊口，使劳动力必须恒常地出现于市场。因此，补充着工资领域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成为工资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必要前提及其直接结果，并隶属于市场。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过渡时期，以家宅（home）这一生产单位为核心的家庭（family）成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和市场直接中介领域之间的中介的经济单元。不过在十九世纪前期，只要不存在没有退休福利，只要儿童在青春期前都被认为可以去工作，家庭就都是由几代人同堂而居的。此外，参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的不只有已婚女性，儿童、祖母一辈和其他女性亲属，甚至房客都会一起参加进来。即便只有“双重自由”的成年男性家族成员才是工资的合法所有人，但成年女性和孩童照样会在家宅之外工作。

实际上在工业化的伊始，女性就占了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与儿童一样，她们并不能决定是否受佣工作、在哪里受佣工作、从事什么工作；她们多多少少都是被自己的丈夫或父亲转包来的。（马克思甚至将这种情况与某些奴隶贸易形式相对比：家族的男性首领就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劳动

力价格讨价还价，并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工作。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和德国，女性要等到 1960 年代或 70 年代才获得了不经丈夫授权而工作的权利。）女性在家宅之外工作绝不是女性解放和丈夫现代思想的标志，而是赤裸裸的贫穷标尺。即使家族足够殷实，已婚女性一般被预期能待在家里（这时她们通常从事一些家庭生产，尤其是纺织），但问题是很多女性终身未婚（因为结婚非常昂贵），还有一些人不应该怀孕和组织自己的家庭。小女儿常常被送去当别人家的仆人或帮佣，“明面上”保持独身。因此，就算负责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总是女性，负责工资领域的总是男性（人们可以定义如此认为），这两个性别和两个领域在当时也没有一一对应。

## II 原子家庭与福特主义

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即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渐渐开始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称的原子家庭。首先，在数十年的劳工斗争后，国家开始着手限制雇佣女工和童工，原因之一是国家面临着劳动力再生产危机。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提高了（例如读写能力成了参加工作的必要条件），儿童教育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个新的童年范畴出现了，这个范

畴有特殊的需求和发展阶段。照顾孩子成了一件讲究的事务，不能再假手于较为年长的子女了。<sup>[28]</sup>

这一进程随着福特主义及其新的消费和再生产标准而达到高峰。随着退休福利和养老院的普及，不同世代开始分居到各自的住房。丈夫和妻子家庭责任的分配也受到领域区分的严格界定。过去常常和其他女性一道进行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例如洗衣服），成了每个家庭中单一成年妇女的个人责任。已婚女性的生活最后通常被完全限制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这成了大部分女性的命运，她们的整个生活（包括她们的人格、欲望等等）都被这种命运所塑造。

因此，性别是伴随着在资本主义特定时期和世界上特定区域存在（这点更重要）的原子家庭而变成僵硬的、与各领域一一对应的二元。它成了一种严格的、并非人人都能符合的定式。许多女权主义者在头脑中仍然保持着那个时期的定式，将性别视为一组规定了“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的品格。由此开始，被视为女性的个人生来就有着与被定义为男性的个人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生活在“两颗不同的星球上”（有些住在火星……），并且被社会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这种不同贯穿着所有阶级。

已婚女性再也得不到其他家族成员的帮助，只能被孤

立于四壁之间，独自承担所有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如果没有家用电器的发明，使最累人的体力活变成单人可以独力承担的杂务琐事，上述孤立也就不可能出现。洗衣机、室内水龙头、热水器——这些都大大减少了某些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所耗费的时间。不过，时间的节省却远不能增加家庭主妇的闲暇时间。所有空余时间都被用来提高再生产的标准：衣服洗得更频繁，膳食越发多样和讲究健康，并且最重要的是，照顾小孩成了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从照顾婴儿开始，到协调小孩的闲暇活动。

### III 1970 年代：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的 实际上从属和商品化

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的商品化显然不是新现象。自资本主义伊始，人们就已经可以买到做好的饭菜，而不用自己动手煮；可以购买新衣裳，而不必自己缝补；还可以花钱请仆人来照顾小孩或者做家务。不过，这些在当时都是中间及上层阶级的特权。确实，一项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一旦变成商品，它就必须通过工资来偿付。因此，对这些商品的大规模消费只可能发生在工资稳定增长的时候。

代。因为只要这些服务只是在形式上从属，它在增加必要劳动的交换价值同时也导致剩余价值减少（成反比）。

不过，实际上的从属开启了诸多可能性，使部分上述商品的价值伴随着大规模生产而同时降低。生产率的提高使这些商品越来越实惠，而其中一些商品（尤其是已经做好的饭菜和家用电器），也缓慢但确实在进入工资能负担的范围。尽管如此，某些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即便商品化，其价格还是比较难降低到任何种类的工薪都能负担的水平。事实上，照顾孩子即便可以商品化，其生产率也不可能提高以降低成本。即使护理、洗衣等工作都能更高效地完成，照顾孩子的时间也绝不会缩短。照顾孩子的速度是无法加快的：他们一天 24 小时都需要照顾。

将照顾小孩合理化，这是可能的，例如由国家负责组织，从而减少成人与小孩之间的比例。但是，一个成人可以照顾的小孩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成人必须教授特定标准的社会化、知识和纪律的情况下。这种工作也能由最便宜的劳工（即那些工资低于劳动女性的女性）来承担。但这样的话，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只不过递延给了全体人口中的最低工资阶层。因此，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更有甚者，它的负面效应通常都被重新配置给贫苦移民和有色人种女性。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永远存在一个余数。我们会把这个余数形容为贱斥者（the abject）<sup>[29]</sup>（即不可能使之从属或者不值得从属的）。这些活动所以是贱斥的，显然不是因为本身如此。它们存在而为贱斥，是因为资本，因为它们被资本塑造。总存在着这么一个余数，它不得不停留在市场关系之外，而家庭中该由谁来承担它的问题常常造成冲突，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 6、危机与紧缩措施：贱斥者的兴起

在当前的危机下，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家将越来越不愿意组织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纯成本。幼托、养老和医疗开支将首先被削减，更不用说教育和课后活动了。这些要么变成有能力支付的人的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私有化），或者堕入无工资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从而增加了贱斥者。

这种设想能实现多大程度还有待观察，但是受危机影响国家中的趋势已清晰可见。在美国和大部分欧元区国家（德国是显著的例外），政府都在削减开支，以减少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sup>[30]</sup> 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有英国，都在大幅削减医疗和幼托的开支。在

希腊和葡萄牙，公立幼儿园纷纷关门。在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捷克，有报道称孕妇的产假和福利，以及她们产后复工的权利，都受到了侵害。<sup>[31]</sup> 在英国，国营托儿所接连关闭。对此，参与了哈克尼（Hackney）托儿所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女权主义团体“女权主义者反击”（Feminist Fight Back）其中一名成员这样描述道：

全英国的地方政府都开始宣布大量削减各项社会服务的资金，从图书馆和医疗到游乐场和艺术团体，从性侵危机中心到家暴受害人服务。与女性尤其相关的是将在儿童服务方面感受到的深远影响，比如由地方当局和社区开办的托儿所，还有新工党标榜的、为家长提供各种“一站式”服务的“保障开端中心”（Sure Start Centre）。<sup>[32]</sup>

在一个有着“大社会”（Big Society）的中央政策理念和“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中、在邻里中、在工作场所中……感到有足够的自由和力量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的文化，并且首相在这种理念和文化之下亲自提倡在“志愿基础”上组织社区服务的国家里，反国家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着一个难题：

我们的目标是“既在国家内又反对国家”的供给（provision “in and against the state”）。这对争取公共品和共享资源与劳动的斗争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如何保证，我们再生产自己社区的自主努力不会协助卡梅伦建立这个“大社会”？我们如何才能为这样的逻辑背书：如果国家不提供，我们就自己动手？<sup>[34]</sup>

2012年，在波兰波兹南发生的幼儿园抗争也反映出同样的难题。市政当局为了节省开支，逐渐将所有公立幼儿园转为私立。当其中一所托儿所的工人与家长和活动家一起抗议私有化时，地方当局提出了让员工自行管理托儿所的方案，但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补贴或担保。员工和家长最终拒绝了前景暗淡的方案。<sup>[35]</sup>

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似乎很推崇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由女性自我组织，认为这是创造替代性社会的必要一步。例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在其2010年的文章《原始积累时代的女权主义和共同政治》（*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on in an Era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中写道：

如果经济建筑在作为家务(oikos)的家庭(house)之上,那么历史上成为家庭工人和家庭囚徒的女性必须主动行动,重新夺取家庭并使之成为集体生活的中心,使它贯穿多种群体和各种合作形式,提供没有孤立和固化的安全,促进共同体的财产分享和流通,并且最重要的是,为再生产的集体形式奠定基础。……有一点依然需要澄清。给女性配置共有化(commoning)/集体化再生产的任务,并非要向“女性气质”这一自然主义观念让步。可以理解很多女权主义者会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死还难受的命运”……不过,正如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所言,重新组织再生产的工作以及由此造成的住房和公共空间的结构重构并不是身份问题;它是一个劳动问题,以及力量和安全的问题。<sup>[36]</sup>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是对的:我们确实认为这种可能性比死还难受。她随意引用多洛雷斯·海登来回应这种异议时忽略了一点:劳动问题正是身份问题。<sup>[37]</sup>即便危机中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组织这些再生产活动(尽管大部分贱斥的再生产很可能最终被强加于女性之上),我们也一定要反抗这个巩固性别的进程。我们一定要如其所是地对

待它，它是被贱斥者、是没人愿意从事的事物的自我组织。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算无工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和贱斥者可能指向同一个具体活动，这两个概念还是需要加以区分的。贱斥者这个范畴特指那些在某种情况下变为有工资的活动，但由于对国家或资本而言成本太高，因而正在回归无工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纯粹是一个独立于任何动态之外的结构范畴，而贱斥者的概念则把握住了这些活动的特定之处，以及它们在当前时期的配置进程。我们确实可以说，如果我们母亲和祖母们当中有许多人曾被束缚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那么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只因为我们无法负担，所以要“回归厨房”。我们的命运是不得不对付贱斥者。相对于过去的市场间接中介领域活动，贱斥者已经大幅度地去自然化了。对于它的承担者来说，这似乎并非什么不幸的自然命运，而是要和工资劳动一道处理的额外负担。<sup>[38]</sup> 被留下来处理贱斥者，是当前性别的丑恶面貌，它帮助我们看到了性别之为性别：一种强有力的束缚。<sup>[39]</sup>

去自然化进程确实使性别可能表现为一种外在制约。这并不意味着性别的制约比以前变弱了，而是说它现在可以被视为一种束缚，也就是一种在外在于自身、有可能消

灭的东西。

总结最后一点想法：如果现在我们真能将我们的阶级归属和性别归属视为外在的制约，那这绝不会是单纯的巧合。又或者是巧合吗？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以消灭性别为目标（即通过非性别化的个体实现生活再生产的目标，在这种生活里，所有分离的活动领域都被消灭了）的抗争来讲是关键性的。

吴明译

朱剑校

### [注释]

[1] 从最宽泛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这么一种视角，以社会再生产、特别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安置性别压迫。这种视角常常认为，马克思和往后关于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述对这种主题的处理不充分，而在“不美满联婚”（unhappy marriage）和“二元制”（dual systems）争论方面，该主义一般支持“一元制”的观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意在延续1970年代开始的“家务劳动争论”对话，该对

话转向价值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考量“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不美满联婚”由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海地·哈特曼(Heidi Hartmann)提出，以此形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联合并不完美，并且从1960年代开始出现诸多问题。“二元制”由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艾里斯·杨(Iris Young)提出，认为女性同时受到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分工和父权制的压迫。更详细的介绍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莉丝·沃格尔，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译注]

[2] sex 与 gender 的区别在于，前者多指生理上的性差别，而后者则主要指社会性别，即一定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言行举止等社会特征方面区别的指认，如认定男性是刚强的，女性是柔弱的。本文将 sex 译作“性”，将 gender 译作“性别”，以为区分。——译注

[3] 见《共产化与价值形式理论》一文。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或《资本论》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3页。

[5] 《资本论》第一卷第4章，“劳动力的买和卖”部分。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或《资本论》第一卷，第199页。

[7] 即不是价值或不包含价值的东西。外在于劳动的东西亦同，即后文所谈的非劳动。——译注

[8] 比如 Leopoldina Fortunati，见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Autonomea 1981)。

[9] 在这一点上，我们受到罗斯维塔·舒尔茨（Roswitha Scholz）的价值断联（Scholz's value-dissociation）理论很大影响，即使我们的分析依然有重大区别，特别是在性别动态方面。见 *Das Geschlecht des Kapitalismus*（Horleman 2000）。

[10] 也就是同质时间。见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五章 抽象时间”。

[11] 市场间接中介活动如此分配所经历的性别化内化（我们称之为“自然化”）显然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会在第四部分更详细地考察。

[12] 工资本身没有附带培训手册，这一点很有意思。人们，特别是直接领取工资的人，可以随意使用工资，因此工资的分配并不符合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特定情况，比如家庭规模、生活标准、是否负责/经济地使用某个收入流。这一点需要更多的考察，但目前只需说明，这不是资本家的责任。

[13] 英语中的 wage labour 字面意思是“工资劳动”，但在中文里对应的概念是“雇佣劳动”。为了突出有工资和无工资的区别，我们在这里使用“工资劳动”的翻译，而将 waged / unwaged labour 翻译为有工资 / 无工资劳动。同理，waged labourer 在中文里一般翻译成“雇佣工人”，但在这里我们将翻译成“工资劳动者”。——译注

[14] 显然，一切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活动都是社会活动，但是某些再生产活动被该生产方式的规律排斥为非社会活动，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性的内部之中形成了外部。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对社会 / 非社会这对二元术语（某些女权主义论述会用到）保持谨慎态度。这对术语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暗示“再生产劳动”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部的一个“非社会领域”，这种劳动要么发生在某种家务的生产方式里（见 Christine Delphy,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Hutchinson 1984]），要么成为以往生产方式的残影。有时候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另类的生产方式，因为它缺少合理化，我们需要将这个领域社会化。我们认为，关注社会确证本身会少些疑惑，多点启发。

[15] 以营业收入支付的服务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属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

[16] 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关于自然化过程的有用洞见：“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社会力量叫做自然力。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85页。

[17]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或者被大部分政治理论认为是“自然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立的。

[18] 见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

[19] 例如，仅能存在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与仅能存在于市场间接中介领域的活动相互差别，而不能像一些活动那样，某些情况下存在于市场直接中介领域，某些情况下是间接中介领域。——译注

[20] 见《尾注》第2期 Chris Chen 的 *The Limit Point of Capitalist*

*Equality*。[本文选没有收录。——译注]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或《资本论》第一卷，第 197 页。

[22] 1965 年以前，法国女性未经丈夫授权不得参与工资劳动，在西德则是 1977 年以前。见下文第 5 部分。

[23] 我们认为，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切开阶级之下分歧的迷雾，同时能够处理各种分歧与资本主义宰制之间特殊和差别化的关系。一句话，无产者的身份是基于不自由的某种共同形式而形成的抽象，这种身份即使在最抽象的层面也永远不能代表所有人。我们还需要另一种更精细的分析，可以用来对抗工人身份本身的问题所在。

[24] 因为创造未来的工人一代（他们在生命里一段时期属于非工人）是资本背弃了的成本，并且因为这种活动被安置为从劳动中窃取时间的非劳动。

[25] 见 Paola Tabet, “Natural Fertility, Forced Reproduction”, in Diana Leonard and Lisa Adkins, eds, *Sex in Question: French Materialist Feminism* (Taylor and Francis 1996)。

[26] 见她对波伏娃“不加批判地复制了笛卡尔对自由与身体的区分”的批判。《性别麻烦》，岳麓书社，2024 年，第一章，“生理性别 / 社会性别 / 欲望的主体”。

[27] 见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8] 关于义务教育对工人阶级家庭的影响，见 Wally Seccombe,

*Weathering the Storm: Working-Class Familie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Fertility Decline* (Verso 1993)。

[29] 我们是在词源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ab-ject，指“被投出，被抛开，而脱离的对象是起点的一部分”。[这个术语来自法国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的作品，比如《恐怖的权力》（1980）。我们采用台湾的翻译“贱斥”，突出该概念的特异性。本文的作者解释，与克莉斯蒂娃的用法不同的是：

我们想要用这个概念表达的是通过实际上从属的过程创造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能变成从属，因此也就处于这个过程的外部，但同时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想要从术语“abject”中挖掘的主要意义乃是它的词源意义：ab-jactare，即为被抛弃、扔掉的东西，但是，它仍是这个抛弃它的对象的组成部分。它类似于罗斯维塔·朔尔特（Roswitha Scholtz）的“价值分离”（Wert-Abspaltung）概念，但对于朔尔特而言，价值分离自资本主义开始以来就发生了，所以它是静态的。相比之下，那些通过资本主义内实际上从属的过程而不断发生的活动，它们被排斥与变成从属的动态，才是我们希望在“贱斥”的概念中得以把握的要点。这种动态事关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也事关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断代。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抛弃意味着活动的变性和复

归,对我们与被排斥活动的主观关系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与克里斯蒂瓦用来反映这种影响的概念关联起来,也就是将“贱斥”所产生的拒绝与她的抛弃概念关联起来,是一个好主意。我们非常自由地使用这种类比,我认为它很好地捕捉了这类对内生的外部者的拒绝,这一历史过程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反映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性别化个体的主观上。——译注]

[30] 见我们同一期的《盘旋待降》(*The Holding Pattern*)。

[31] Francesca Bettio, “Crisis and recovery in Europe: the labour market impact on men and women”, 2011.

[32] Feminist Fightback Collective, “Cuts are a Feminist Issue”, *Soundings* 49 (Winter 2011).

[33] 见 David Cameron on “the Big Society”, Liverpool, 19 July 2010。

[34] Feminist Fightback, “Cuts are a Feminist Issue”.

[35] Women with Initiative (from Inicjatywa Pracownicza-Workers’ Initiative), “Women workers fight back against austerity in Poland”, *Industrial Worker* 1743, March 2012.

[36]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Common Notions 2012), 147.

[37] 显然,这不代表我们不重视费代里奇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争论的全部贡献。除了达拉·科斯特(Dalla Costa)和詹姆斯(Selma James)的《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费代里奇的文本肯定是1970年

代“家务劳动争论”里最有趣的。我们这里想批判的是目前在“共有物”(commons)争论里一种很有影响的立场,我们认为该立场很有问题。[“共有物”指的是按其本性(nature)而言不存在所有者的物,比如空气、水和共同语(见 Panagiota Bampatzimopoulou, “Feminist Commons: Decoloniality, Intersectionality and the Commons”, Master's thesis in Linköping University),而费代里奇在她的 *Re-enchanting the World* (PM Press 2018)中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最终目标是日常生活的集体化,而我们要格外警惕“共有物”被资本家挪用,比如养育、城市社区园林等等再生产共有物或共有物的活动。她还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一些活动,如占地扎营尤其重要。2016年美国北达科他州发生反输油管道抗议,当地印第安人扎营示威,印第安女性组织集体厨房和学校支持运动。她认为这些都体现了再生产活动的共有化:“政治以曾经往往专属女权主义组织的方式完成了。我们需要这么一种政治,它拒绝将政治组织行动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相分离……”——译注]

[38]“……一种怪诞大量而又唐突地出现。如果说在昏暗和被以往的生活里,我对这种怪事还能见怪不怪,那么现在它却在骚扰着我,仿佛它是个彻底分离之物,令人作呕之物。它不要我。我也不要它。然而也不是什么都不要。还有一个我不认为是东西的‘某样东西’。有一个无意义的、但绝非毫无意义的重量,它将我碾碎。”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

[39] 显然，当下有一些男性（尽管极少数）构成了相当一部分贱斥者。他们得以理解许多女性的体验：贱斥者是和人连皮带肉在一起的。这些男性当中有许多人，特别是在他们最后要承担大部分养育小孩的任务时，似乎不知怎么地遭受了社会阉割的进程。





# 盘旋待降

当前的危机与 2011—2013 年的阶级斗争

The Holding Pattern

The Ongoing Crisis and the Class Struggles of  
2011-2013

2013

---

发表于《尾注》第3期。

2007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萧条。地产业主深陷泥潭，公司不堪重负，失业率直线上升，世界经济的金融架构几乎崩溃。各政府部长迅速采取协调行动，以防二十世纪30年代的悲剧重演。不久后，他们又被迫以紧缩政策向债券持有人保证这场缓慢发展的灾难仍然可控。大量公职人员被解雇，仍在职的人则被降薪。学校、大学和医院等机构也经历了大规模裁员。同时，尽管发生了危机，粮食和石油价格以及失业率都居高不下，其中青年失业率则尤其高。最终，尽管政治家们尽了最大努力——又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努力——一些国家的经济在短短几年内，陷入了不是一次或两次，而是三次不同的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救济资源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无产者仍被迫依靠这些救济来生存。在正式的工资劳动关系之外，包括非正式劳动及轻微犯罪在内的非正式经济正不断扩张。

尽管如此，无论是工薪阶层还是无薪阶层，对这场数

十年经济衰退导致的危机大多采取了适应态度<sup>[22]</sup>。当然，情况并非普遍如此：许多无产者试图维持并捍卫自己的生活条件。2008—2010年间，示威此起彼伏，其中一些还封锁了道路和炼油厂。这段时间也出现了暴乱和抢劫事件；总罢工行动中，一停工就停一整天。学生们占领大学，公职人员占领政府大楼。面临工厂倒闭，工人们不仅占领了工作场所，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还绑架了老板，烧毁了工厂。

这些行动中，有些是为了回应警察杀戮或工作事故，更多的则是为了阻止紧缩政策及其相应的失业潮，并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腐败。然而，正如科斯莫普罗莱特（Kosmoprolet）<sup>[2]</sup>所指出的，“传统的阶级斗争手段付出了大量的动员努力，但不论在什么地方它们都没能施加足够的压力，而抗争也以各个方面的失败而告终。”接着，在2011年这个伴随着地震、核泄漏和洪水的多事之年，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斗争形式涌上了地中海沿岸。

## 一、广场运动

广场运动（The Movement of Squares）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整个中东和地中海地区，随后以“占领”的名字<sup>[3]</sup>来

到英语世界。这些广场运动之间的差异之处多于相似之处，因此将它们一概而论似乎是鲁莽的。然而，这些运动之间的关联，并非来自我们这些评论者的总结，而是来自运动自身出现的形式及其日常的实践。广场运动将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抗争联系在一起：它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国际主义现象。奥克兰和开罗突然变成了“同一个拳头”。

比起反全球化抗议，广场运动更像是 2003 年的反伊战运动，其中日益加剧的冲突并不局限于一个城市，也不是依次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相反，占领运动在各个城市中心同时扩散，吸引了不稳定的工薪阶层和焦虑的中产阶级，有组织的劳工、贫民窟居民和新的无家可归者。然而，除了将几位年迈的独裁者赶下台之外，广场运动并没有取得持久的胜利。与 2008—2010 年的抗议浪潮一样，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未能改变危机管理的形式，更不用说挑战主导的社会秩序了。

然而，广场运动确实改变了一些事情：它让公民——一个跨阶级的群体——走到一起，讨论危机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北非，广场运动确实起了解放性的作用）。在此之前，这些讨论只存在于私域：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要对失业、无家可归、随机任意的警察暴力和债务等问题承担个体责任；他们从来没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的集体解决

方案。就算只有这一个改变，有关占领的讨论就并非无关紧要。

随着占领活动的展开，公众辩论的主要议题成为了占领者自身的活动。他们应该如何从警察的手中保卫广场？如何将运动扩展到新的领域？即使在占领之外，这类讨论也很受欢迎：这也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无力解决危机，但没有人知道面对危机应当怎么办。占领成为了景观（spectacle）。占领者成为了自己活动的观察者（spectators），等待找到他们占领行动的目的。

占领者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聚集的方式使他们过于弱小，无法对统治秩序构成真正的威胁。占领与每个人都有关，但除了无家可归者之外，占领与任何人没有直接关系。占领者们虽然找到了彼此，但他们放弃了居民区、学校、就业中心、工作场所等可以为他们提供政治筹码的具体场所。因此，除了广场本身，占领者没有控制任何物质资源，要塞或领地。<sup>[4]</sup>人们很少以居民区或工作场所代表的身份参加占领活动，更不用说作为其他社会机体的代表了。除了自己身体的在场，占领者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彼此的东西。他们“愤慨”的呐喊声迄今为止只在荒芜的中央广场上回荡。事实证明，除了某些北非某些城市，占领者的愤怒仅停留在广场上，而未能传递到日常生活中。

比起占领广场，日常生活中的自发活动势必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并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在这种社会语境中，占领者选择提出一系列消极要求：“人民要政权垮台”（ash-sha'b yurid isqat an-nizam）和“他们都应该离开”（que se vayan todos）。然而，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摆脱政府、扭转紧缩政策、降低食品和住房价格这些要求又能实现什么呢？如果他们扭转了紧缩政策，国债的持有者就可能会受惊吓，从而导致国家破产。或许除了美国茶党，即使是最机会主义的政党，都不可能接受主动跳入深渊的政策呼吁。

然而，如果抗争者没有能力要求通货再膨胀或经济再工业化，那么除了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内部的各个局部利益之外，抗争的内核还剩下什么呢？如果他们只能接受经济现状，那么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如何才能在不相互对立的情况下，瓜分政府施舍和私有经济就业的有限资源呢？说“除了革命，别无他法”很容易，但我们究竟要的是哪种革命呢？

在二十世纪，无产阶级能在工人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以合作共同体为目标重建社会。这种旧式解放的坐标已被彻底打乱。以前，产业工人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世界；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工作的目的并非仅是再生产阶

级关系。现在看来，这一切都荒谬至极。工业劳动力的萎缩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石油—汽车—工业复合体不是在建设而是在毁灭世界。无数无产者从事没有前途的服务业工作，他们看不到自己工作除了“勉强度日”还有什么意义。当今多数无产者的劳动不过是制造自身被统治的条件。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还能提出什么纲领呢？在无产阶级（class）内部，没有一个阶层（section）能自称其利益具有普遍性。因此，任何积极的纲领只能在各阶层利益的嘈杂声中寻找出路。

广场运动取代了过去的工人运动，成为了一种新的阵线主义。所有因经济危机，以及救市政策后的紧缩政策受害的阶级和阶层团体，都聚集在广场运动里。因此，摇摇欲坠的中产阶级、虽有就业保障但仍然惶恐不安的人、朝不保夕的人、新近失业者、城市贫民——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人能接受危机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这些群体中的个人就聚集起来，成为了一个群情激愤的跨派别社会群体。然而，他们不接受这些选择的原因并不总是相同。在北非，这些阵线可以动员起来推翻政府，但在这里，阵线内部的派别化恰恰是它们成功的表现。

我们认为，广场运动采取这种形式并非没有原因。这一点并非在广场运动所有表现形式中都看得出来，但这种

运动的本质是反紧缩政策的斗争。这一点原来应该让我们感到奇怪。2008年的每一个评论员似乎都知道，紧缩政策不是应对大萧条级别的深度经济衰退的办法；恰恰相反，政府应当以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回应危机。某些低收入国家（中国、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等）采取了这一做法——通常以有限度的方式，有时只在经历了深度衰退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支出。但至关紧要的是，高收入国家并没有采取这一做法。绿色资本主义原本备受推崇，似乎就要开辟全球经济的新路线，它在危机中去哪里了？过去几年似乎给资本提供了将其重新打造为人类救世主的机会，但这并没有实现。我们认为，正因为危机之深，高收入国家才被迫削减预算；他们陷入了死亡之舞。

我们将在下文中指出，这些国家是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压力下被迫“起舞”的。一方面，它们不得不借贷并支出，以避免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它们又不得不实施紧缩政策，以减缓（伴随着数十年的经济增长乏力）庞大公共债务的增长。这种绕弯子的做法并没有解决危机，但它减弱了其影响，并将其从整个社会的危机转变为某些个人或社会阶层的危机。

国家在危机中实施紧缩政策，让人觉得它似乎也有扭转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此类斗争令人感觉奇怪。国

家的行为似乎是非理性的。各地的占领运动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国家的政策是非理性的，这一定是因为它被金钱利益所俘虏，换言之，是腐败的后果。但事实上，国家的弱点恰恰在于它看似有力的地方。紧缩是国家无力的一种表征。面对数十年的缓慢增长和周期性危机，在危机面前，国家只能继续临时抱佛脚。起码在当下，国家的临时应对政策似乎还管用。秩序依然稳定。

## 二、高度逐渐下降的盘旋待降

当前的经济萎靡当然始于金融危机<sup>[5]</sup>。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信用违约掉期突然成了无休止的电视话题。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倒闭了。AIG 获得 850 亿美元贷款。储备原始基金净值跌破 1 美元，导致商业票据市场崩溃。中央银行通过担任最后贷款人阻止了资金流动完全冻结，因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在“大衰退”结束四年后的今天，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危机？它仅仅是通往中国世纪的高速公路上的一时挫折吗？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并非如此。

尽管 2010 年从之前两年的严重衰退中有所复苏，但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开始减速<sup>[6]</sup>。2012年的增速仅有0.7%。复苏十分疲软，而且还在进一步弱化，就经济衰退的时间长度和严重程度而言，历史上唯一可与之匹敌的是大萧条。事实上，在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整体中，2012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2007年的峰值。这使得降低失业率极为困难（尤其是考虑到在此期间，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达到峰值，分别达到10%和超过12%，而且至今几乎没有下降<sup>[7]</sup>。2013年年中，失业率继续增长：塞浦路斯的失业率达到17.3%；葡萄牙为17.4%；西班牙为26.3%，希腊为27.6%。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更是天文数字：分别为37.8%、41%、56.1%和62.9%。<sup>[8]</sup>

更具有潜在爆炸性的是所谓新兴市场最近的发展，因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市场看起来似乎能拉动整个世界向前发展。现在，所有市场都在放缓。在土耳其和巴西，2012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骤降至0.9%和0%。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无霸也在减速。尽管中国实施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之一，但按人均计算，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9.9%降至2012年的7.3%。印度的增长率下跌得更多，从2010年的9.1%降至2012年的1.9%（后者是印度过去二十年来最低的人均增长率）。

然而，尽管经济复苏极其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高

收入国家仍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政府需要削减开支。

随着危机初始阶段过去，人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金融监管的失败。如果要讲金融，现在的银行甚至可以说过于谨慎、过于不愿承担风险了。真正的问题是**过剩人口**和**过剩资本**的增长。<sup>[9]</sup>苦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趋势，但苦难是以**债务**为中介的。二十世纪60年代形成了巨大的资本剩余池，而且自那时以来只有不断扩大。在国际上，这些资本池主要表现为美元过剩：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持有的美元、二十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本持有的美元以及2000年代中国持有的美元。由于这些美元在地球上四处寻找回报（因为它们不是用来购买商品的），它们造成了货币价格的迅速下降，因此反过来又吹起了一系列泡沫，其中最大的泡沫，在上个世纪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拉丁美洲、80年代中期的日本和90年代中期的东亚。作为2008年危机的前奏，则出现了1998—2007年美国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sup>[10]</sup>。

随着美国股票市场指数和房价不断攀升，拥有资产的个人感到自己更加富有。他们的资产价值一飞冲天。资产价值的上升导致储蓄率长期下降。就这样，尽管投资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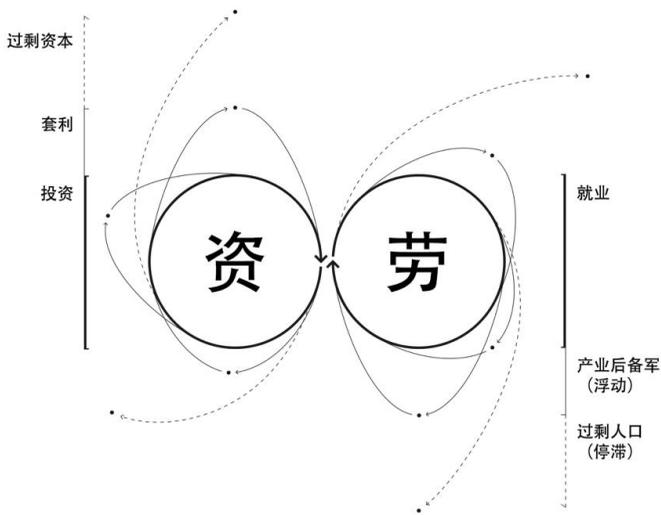


图 1：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作为资本和劳动的解体性循环

降、经济增长率长期放缓、工人阶级严重贫穷化，但泡沫驱动的消费使经济继续运转，而且不只是在美国。2007 年，美国经济吸收了世界其他国家 17.8% 的出口。2007 年，美国进口额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 GDP 总量的 7%。可以说，这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刺激。但是，美国基于债务的消费并没有在美国人口中平等分配。无产者越来越发现，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是过剩的；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一直很低。因此，工人的实际工资已有四十年停滞不前。这

导致美国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巨大转变。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超级富豪们不断变化的口味：全美收入最高的 5% 的人占消费的 37%；收入最高的 20% 的人的消费额则占整体消费的多数，有 60.5%。<sup>[11]</sup>

现在，随着住房和股票市场价格的下跌，财富带来了反向的效应<sup>[12]</sup>。家庭正努力偿还积累的债务，试图降低资产负债率。因此，无论利率降到多低，企业都不会进行投资。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美国，国家、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总额约占 GDP 的 350%。在英国、日本、西班牙、韩国和法国，债务总额甚至更高，高达 GDP 的 500%<sup>[13]</sup>。去杠杆才刚刚开始。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和欧盟进口停滞或下降，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放缓被传导至低收入国家。其结果是，政府支出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

一、政府为防止经济衰退卷土重来而被迫增加支出。如果无法通过大型刺激计划，就只能依靠自动增加支出（或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维持支出）。G7 国家的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83% 上升到 2013 年的 124%。美国政府仅仅为了防止经济失速，它在过去六年中的债务就已经超过了该国 1990 年的全年产出。为什么各经济体要如此努力才能保持原地不动？

从本质上讲，尽管短期利率为零，长期利率也处于历

史低位，但私人借贷却很少。在整个私营经济中，人们继续储蓄而不是借贷，形成了所谓的“支出缺口”。如果政府不介入填补这一缺口，私营经济就会萎缩。如今，财政刺激的目的并不是重启经济增长——只有当人们把刺激政策带来的钱花掉时，才会有经济增长。但很多家庭要用这些钱偿还债务。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支出的意义在于争取时间——在避免通缩的前提下，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降低资产负债率。<sup>[14]</sup> 通缩会降低资产价格，从而使得资产负债率更加恶化，引起负债与通缩的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高峰期时，某些国家曾试图用提高资产价值，而非降低债务的方法来恢复私人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以及其他央行都运用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购买本国政府的长期债券，从而降低这些债券的利率。投资者因此被挤出收益率下降的债券市场，转而投向风险较高的资产。股票价格恢复上涨，政策似乎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人们希望通过价格上涨降低企业和富裕家庭的债务资产比——不是通过偿还或注销债务，而是通过重新使其资产价值膨胀。问题是，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似乎仅限宽松政策持续的时间。股市上涨并不是因为经济正在复苏。突然出现的坏消息——这其中最糟糕的是央行将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的新闻——会导致这些微型股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加拿大	-0.5	-3.9	-2.0	-1.5	-0.6
法国	-0.6	-3.6	-1.2	-1.5	-0.5
德国	-1.3	-4.9	-4.3	-3.0	-0.6
希腊	-0.6	-3.5	-5.2	-7.0	-6.2
日本	-1.0	-5.4	-4.7	-0.9	-2.1
英国	-1.6	-4.6	-1.0	-0.2	-0.5
美国	-1.3	-4.0	-1.5	-1.1	-1.5
西班牙	-0.6	-4.5	-0.7	-0.2	-1.5
巴西	-4.2	-1.2	-6.6	-1.8	-0.0
埃及	-5.4	-2.9	-3.4	-0.1	-0.5
中国	-9.0	-8.7	-9.9	-8.8	-7.3
印度	-2.5	-7.1	-9.1	-5.0	-1.9
墨西哥	-0.1	-7.1	-4.0	-2.6	-2.6
土耳其	-0.6	-6.0	-7.8	-7.4	-0.9
俄罗斯联邦	-5.4	-7.8	-4.2	-3.9	-3.0
世界	-0.2	-3.3	-2.8	-1.6	-1.0
高收入	-0.4	-4.2	-2.3	-1.2	-0.7
中低收入	-4.2	-1.8	-6.3	-4.9	-3.6

表 1: 2008-2013 年部分国家人均 GDP 百分比增长率

	2007	2013	变化
爱尔兰	25	122	+97
希腊	107	179	+72
冰岛	29	92	+63
日本	183	245	+62
西班牙	36	92	+56
葡萄牙	68	122	+54
英国	44	94	+50
美国	66	108	+42
荷兰	45	74	+29
法国	64	93	+29
意大利	103	131	+27
丹麦	28	52	+24
芬兰	35	57	+22
新西兰	17	38	+21
加拿大	67	87	+21
澳大利亚	10	28	+18
捷克共和国	28	45	+17
比利时	84	100	+16
德国	65	80	+15
奥地利	60	74	+14

表 2：2007-2013 年部分经合组织国家政府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

市泡沫破裂。

不只是这些：直到现在人们才逐渐明了，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 and 英国之外的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最重要的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大宗商品（如食品和燃料）价格大幅上涨，使全世界的穷人陷入更深的贫困，并诱发了“阿拉伯之春”前的粮食骚乱<sup>[15]</sup>。与此同时，量化宽松还催生了大规模的外汇套利交易：全球投资者在美国以极低的利率借贷，以便投资“新兴市场”。这导致一些低收入国家的货币增值，严重削弱了这些国家此前活跃的出口贸易。为了抵消这种疲软，低收入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这些计划部分依靠外国资本的流入）。比起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从大衰退中复苏，正是因为这些刺激政策。然而，它们的复苏并不是基于经济活动中的实际增长，而是通过 2000 年代曾拉动富裕国家的那种由泡沫推动的建筑业繁荣。现在，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结束的可能，面临危险的不仅是美国疲弱的复苏，显然还有新兴市场泡沫下的复苏。各国将不得不继续支出，以防止他们所采取的临时补救措施土崩瓦解。

二、但政府还面临第二种压力：在美国和欧盟，为了安抚债券持有者，刺激政策让位于紧缩政策。在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相对于德国十年期债券，

长期利率迅速上升。希腊不得不部分违约。在其他国家，为了防止利率进一步上升，紧缩政策变得必要。问题在于，2007 年危机爆发之初，政府债务就已十分庞大。凯恩斯主义者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经济萧条时期趋于上升，但在经济繁荣时期却并没有下降，甚至进一步上升。因为周期性出现的经济繁荣期越来越疲弱，各国也就无法利用经济繁荣时期的增长来偿还债务。任何偿还债务的尝试都有可能破坏日益脆弱的增长期。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间，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国家债务呈现出缓慢而持续的增长。但债务的增长只是缓解了增长率的严重放缓。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逐年下降，从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 4.3%，到 70 年代的 2.9%，到 80 年代的 2.2%，到 90 年代的 1.8%，再到千禧年代的 1.1%。

因此，在这场危机开始时，债务水平已经远远高于 1929 年。例如，在大萧条前夕，美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 16%；10 年后，到 1939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44%。相比之下，在当前危机爆发前夕的 2007 年，美国公共债务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2%。仅仅四年后，这个数字就达到了 100%。<sup>[16]</sup> 因此，在所有高收入国家，债务水平的不断上升就会唤醒违约的幽灵。

过去几十年遗留下来的高额国债限制了各国当下举债的能力。它们需要未雨绸缪——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使用廉价信贷额的能力。在试图渡过即将到来的金融动荡浪潮时，各国都需要信贷。在危机中实行紧缩政策也就成为了这个情况中自相矛盾的结果。各国需要让债券持有者相信它们有能力在现在控制债务，以预留日后举债的能力。一些国家（爱尔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似乎已经穷尽了它们的信贷限额。

这两种压力——为避免通货紧缩而支出，以及为避免违约而削减支出——都是不可阻挡的。因此，紧缩不仅是资产阶级对穷人的攻击。紧缩政策的基础是国家债务的过度增长，而这种增长目前已陷入僵局（正如 1980 年代初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一样）。

希腊处在由此引发的紧缩风暴的中心，曾两次得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第一个救助方案 2010 年 5 月出台，第二个 2011 年 7 月出台。2014 年需要第三个救助计划似乎几乎不可避免。为了争取这些救助，希腊被迫实施至少五个独立的紧缩方案，其中最严重的方案 2011 年 6 月投票通过。政府将公共部门职工的工资削减了 15%。2015 年之前，15 万名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将被裁员。政府也将提高退休年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了

36%。许多公用事业（电话、水和电）以及国有港口、矿山和机场被部分私有化。所得税和销售税被提高。尽管私营部门失业率居高不下，在 2013 年 7 月，政府再次大幅削减开支，25000 名公职人员被裁员。因紧缩政策，希腊人的收入在 2007 年至 2012 年间缩水了五分之一。由于收入缩水也意味着政府收入的减少，紧缩措施只会使希腊的财政状况更加危险。与 1980 年代的许多低收入国家一样，结构调整使希腊更加依赖外部资金。

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类似的紧缩措施的力度相对较小。但即使在美国，也出现了学校关闭、学费和医疗费用上涨、退休福利消失等问题。公共部门的职员被大规模解雇，留下来的人则面临工资削减。

各国中央银行的协调行动、对金融公司的大规模援助、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以及现在为了防止债券市场的恐慌而转向紧缩：所有这些都防止了大衰退演变成第二次大萧条。因为采取这些行动的方式意味着美国和德国的政府部长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最后支出和借贷者，控制权也就进一步集中在其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许多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非常高，经济增长缓慢甚至持续负增长，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极高，动荡远未结束。

我们把目前的阶段看作是一种盘旋待降（holding

pattern)。但我们注意到，经济的高度一直在下降。因此，盘旋只能是暂时的。也许世界经济会因为奇迹而获得足够增速，加大油门，在天空中翱翔。但这其中存在“巨大的下行风险”。转向紧缩政策正在危及它所要支撑的稳定局面，因为紧缩政策意味着政府在弥补私营部门支出不足方面做得更少。这再次引发了通货紧缩的幽灵；无限期的量化宽松计划成了抵御通货紧缩压力的唯一动力。然而，即使没有通货紧缩，目前的经济动荡也有可能以崩溃告终。毕竟，从全球范围来看，主权违约其实并不罕见：它们一波接一波，在不断出现的全球危机中扮演了重要部分。

各国能否以某种方式违背价值规律，在不降低其经济未来预期增长率的情况下大规模举债？那些相信自己能够这样做的人，将在即将到来的阶段验证他们的观点。他们也有可能是对的：毕竟，几十年来，企业、家庭和国家总是以新的方式大量积累债务，一次又一次地推迟了新一轮萧条的到来。谁又能断言，目前的模式是只能再维持几个星期，又或者几年呢？

然而，如果要维持这种状况，就必须确保世界经济的某个角落不会爆发危机，继而再次考验世界金融的结构。AIG也许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但意大利则大到不能救（too big to save）。欧元区曾多次从崩溃边缘被拉回

来，但欧元区危机尚未得到彻底解决。金砖国家目前的经济放缓有可能导致所谓“硬着陆”，这可能带来更大的动荡。印度和巴西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但真正令人担忧的仍然是中国危机的爆发。自 2007 年以来，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加剧了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银行在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中隐藏着大量不良贷款。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房价增长极为迅速，比美国刚刚破裂的不动产泡沫还要大上数倍。中国政府向我们保证“这次不一样”，但美国政府在 2000 年代中期也说过同样的话……

### 三、社会问题的回归

目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深陷危机之中；然而，我们不能将这种生产方式的危机误认为资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处于弱势。事实上，危机往往会加强资本的力量。因为在危机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的同时，劳动力的供应却由于大量裁员上升。仅这一点就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虽然资本在衰退过程中确实会遭受损失，但个体资本家很少会因为这些损失而面临生存威胁。恰恰相反，在经济衰退时，工人们面临着失去工作、从而失去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威胁。危机削弱了工人作为工人的地

位。

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中，资本家可以提出必须把恢复利润率放在首位，这从许多工人的角度来看甚至是正确的。一旦工人接受阶级关系的条件，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取决于制度的健康，其程度甚至更甚于资本家。恢复利润率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唯一途径。在阶级社会的存在没有受到大规模攻击的情况下，个体无产者不得不努力寻找工作或保住工作。因此，许多工人通过接受紧缩措施来应对危机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因为工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资本家及其代表才会对工人利益施加压力，才会用使直接有利自己的方式来定义如何使这套系统恢复健康。

这就是为什么紧缩从来都不仅仅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期短暂削减社会开支。恰恰相反，社会支出项目不只是被削减，有些时候这些项目被完全取消。在许多国家，危机正被用作摧毁长期拥有的权利和应有待遇（包括组织权）的杠杆。在任何地方，危机都成为了技术官僚进一步集中权力的借口，并最终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德国）服务。这些举措不仅仅是应对经济衰退的周期性调整。它们是为了以最直接的方式恢复利润：压低工资。有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国家理性行事，就能以某种方式说服资本不要

在经济衰退时利用其自身优势”：这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

矛盾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危机不是与正常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而是与“危机活动”相联系。<sup>[17]</sup>自发组织的斗争更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示威和总罢工、骚乱和抢劫、占领工作场所和政府大楼。在危机中，工人们发现，继续按照资本的游戏规则行事是没办法取胜的。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遵守这套规则，并开始挑战劳资关系的条件（但不一定挑战其存在）的斗争。

那么问题来了：无产者在当下有哪些具体的自发斗争？在《尾注》第2期中，我们重点讨论了过剩人口的出现和扩大，这些过剩人口是资本矛盾在人类身上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毕竟，过剩人口对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微乎其微；他们缺乏传统生产工人的影响力，因为传统生产工人可以通过退出劳动使系统停摆。此外，过剩人口可以被边缘化、监禁和贫民窟化。他们可以被恩惠收买；他们的暴动被允许自行燃尽。过剩人口怎么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呢？

2010年末，过剩人口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12月17日，穆罕默德·布瓦齐兹（Mohamed Bouazizi）在 Sidi Bouzid 的一个警察局外自焚。两天后，侯赛因·纳吉·费利（Hussein Nagi Felhi）爬上同一城市的电线杆，高喊“拒

绝苦难，拒绝失业”，然后触电自杀。几天之内，骚乱几乎蔓延到了每一个城市，几周之内，总统就逃之夭夭。在随后的一个月里，自焚行为像信号弹一样照亮了北非的贫民窟：在阿尔及利亚，在摩洛哥，在毛里塔尼亚，在埃及。

2011年1月17日，埃及面包师阿卜杜·阿卜杜勒—穆奈姆（Abdou Abdel-Moneim）在申请面粉补贴遭拒后自焚身亡。<sup>[18]</sup> 传统的补贴关系正在瓦解，这是压迫埃及穷人的恶的其中一面。在另一个方面是警察愈发紧绷的镇压机器：一年之前，哈立德·萨义德（Khaled Said）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惨遭杀害。在这个情景下，埃及的年轻活动家们从突尼斯的本·阿里被推翻的事件中获得灵感，决定采取反对穆巴拉克的立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1月25日（传统上是庆祝警察的日子）从开罗最贫穷的居民区开始游行，并在已经提出的“自由”和“社会正义”的要求上加上了“面包”。作为回应，这些街区的人们涌上街头。在突尼斯的榜样鼓舞下，这种将以前各自为战的阶级派别聚集在一起的新的联合斗争，迅速蔓延到各大城市（与2008年马尔哈拉失败的罢工兼面包暴动不同）。

因此，如果说自焚是这场斗争的开端，那么随后发生的反政府抗议则是其高潮。这波斗争的策略得到了巩固：

1、大规模骚乱能够广泛扩散，但往往集中在一个地区；2、

将该地区转变为一个占领区，一个辩论和展示（以及与警察对抗）的中心；3、通过疯狂示威、邻里集会、声援罢工和封锁等手段，将抗争从中心向周边地区延伸。

当然，贫民窟居民并不是这股新浪潮的全部，甚至不是其主要参与者。广场上还有哪些人？到过大部分运动现场的 BBC 记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指出，有三个阶层在 2011 年的广场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没有前途的毕业生、底层青年和有组织的工人。<sup>[19]</sup> 在梅森的叙述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其中第一类人，即负债累累的平面设计师、贫困的行政助理、无薪实习生，以及在北非等待官僚职位的毕业生。然而，回顾 2011 年，这些心怀不满的毕业生的抗争显然只是在被穷苦百姓侵入和压倒时才具有爆炸性。在埃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月份的抗议活动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年轻的活动家们在贫民窟开始了他们的游行。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2010 年学生抗议活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年轻、不安分人群的入场，他们为了抗议停止发放教育维持津贴而加入示威<sup>[20]</sup>。

这里的观点更具普遍性：随着 2011 年抗议活动的普遍化，它们往往以一种动摇其核心要求的方式进行。尽管存在一种朝向普遍化抗争的压力，但它仍未能将阶级团结起来。毕竟，在开罗贫民窟的汪洋大海中要求自由意味着

什么？无论埃及是自由还是专制政体，贫民窟居民都不可能像普通工人 / 消费者一样融入经济体。同样的道理，与住在公租房的年轻人一起抗议学费上涨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很可能是被排除在大学生所寻求进入的经济之外的。正因如此，大学生与贫困青年之间的联盟并不稳定。不过，我们应该清楚：这种紧张关系与上世纪 60 年代撕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青年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

这是因为自 1968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里，高等教育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在富裕国家，上大学的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子女，还有一一（而且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子女。这些学生通常靠自己的努力读完大学。即便如此，为了获得学位，他们还是债台高筑。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不仅是苦难的全球化，也是希望的全球化。在这里，教育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私营企业实现自由的美国梦——通过扩大大学教育的获取途径得以普及。“去上个大学”取代了基佐（François Guizot，法国政治家和学者）所说的“变得有钱吧！”（Enrichissez-vous）

响应这一号召，各地的家庭都在努力送至少一个孩子上学（甚至穆罕默德·布瓦齐兹也在为他妹妹的学位投入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人口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与以往相比，学生能将动荡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结构。这既

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全球南方国家。自 2000 年以来，全球高等教育的参与率从 19% 增长到 26%；在欧洲和北美，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 70%。”<sup>[21]</sup> 因此，二十世纪 90 年代和 2000 年代不仅是阶级失败的时代，也是阶级妥协的时代。现在，这种妥协被危机动摇了。孩子们确实完蛋了：总得有人付出代价，而一键删除他们的未来比剥夺老工人的实际工作更容易。如今在埃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几乎是小学学历人口的十倍。这场危机成为了一场代际冲突。<sup>[22]</sup>

在梅森看来，正是由于这两类年轻人的斗争与有组织工人的斗争之间“缺乏整合”，才削弱了抗议运动的力量：因此，破坏牛津街的“黑块”（black bloc）抗议者与聚集在海德公园的英国工会联合会示威者之间的脱节，也造就了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却但效果最差的工会示威。<sup>[23]</sup> 我们还可以说，美国西海岸的 ILWU 码头工人工会与占领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从 11 月 2 日针对“占领奥克兰”的镇压而进行的第一次港口封锁，到 12 月 12 日为捍卫朗维尤工会而进行的第二次封锁，由于双方都担心被收编，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希腊的情况也类似。希腊工会宣布举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部分原因是为了响应宪法广场的占领者和其他社会运动。但是，尽管这些罢工的投票率很高，

却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作为回应，工会增加了总罢工的频率，有时将罢工时间从通常的 24 小时延长至 48 小时；但罢工仍然是同日发生的大规模示威和骚乱的辅助手段，在这些示威和骚乱中，工会工作人员沦为旁观者。<sup>[24]</sup>

工人与更广泛的抗议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在埃及才得以克服——即使在那里，也只是暂时的。在穆巴拉克政权的最后日子里，工人们开始组建独立于腐败的国营工会的自治组织。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罢工，反对政权。梅森用在他开罗采访的一位精神病医生的话描述了这一“传染”过程：他看到的是“无形之墙的倒塌”<sup>[25]</sup>。这位精神科医生指的是工人团体之间的隔阂。在医院里，医生、护士和搬运工都开始平等对话，共同提出要求：这座墙倒塌了。

梅森的中心论点是，在其他地方围墙没有倒塌是因为组织形式之间的冲突：没有前途的毕业生和底层城市青年都形成了网络，而工人们则继续组织起来，形成了等级制度。然而，这里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限制，它不仅关系到斗争的形式，还关系到斗争的内容。广场运动中存在着真正的利益冲突。

在抗议者中，有些人对危机的体验是无法获得稳定就

业：学生，年轻、“脆弱不安”（precarious）的工人，被种族化的少数群体等。但在那些已得到就业保障的人群中，危机又被视为对他们行业的威胁。简而言之，“青年”被一个辜负了他们的制度拒之门外；而有组织的工人则致力于维护他们已经知道非常脆弱的原状。这种原状必须得到维护——不仅要抵御紧缩国家的冲击，也要抵御试图进入这个制度的成群学生和穷人。在抗议活动之后，继续早前的趋势，“青年”很容易就被重新定义为偷走了本地公民应得工作的“移民”。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斗争的内容问题。但是，2011年的抗议者为何而战？

#### 四、摆脱腐败的束缚

开罗和突尼斯、伊斯坦布尔和里约热内卢、马德里和雅典、纽约和特拉维夫——在这些城市被占领的空间里，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如果说在众多要求中最突出的一个，那就是终结“裙带资本主义”。占领者所反对的是“腐败”，他们的目标是让金钱退出政治。在每个广场上，人们都能看到写满厌恶的标语：腐败的商人和政客摧毁了经济。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他们官商勾结，分赃不均。由此或许可以看见运动中一些宽泛的要求中更清晰

的具体要求：对“民主”和“平等”的要求恰恰是要求人人平等，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些人显然比其他人“更平等”。

在反对腐败的过程中，占领者采取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立场。（1）他们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想出发对其进行批判：他们希望根除腐败（对亲信的分赃）为市场力量的发挥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2）他们呼吁以一种更加平等的资助（patronage）形式取代新自由主义：他们希望将政府的资助从精英转向大众（以救助民众取代救助银行）。我们要厘清这些诉求背后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它们在全球广场运动中具有如此普遍的号召力——停下来思考这些诉求是值得的。

左派通常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巩固阶级权力的阴谋。<sup>[26]</sup>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表述中，作为一项技术官僚议程，它首先关注的是反对腐败，即“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取代“寻租”的则应当是承诺公平结果的市场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要将权力的平衡从国家转移到市场，不如说是要塑造一个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悖论在于他们的改革不管在哪里都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同时也导致了集中在金融、保险、房地产、军事和石油开

采行业的极富阶级对国家权力的攫取。通过不正当的交易和救助，这个阶级自身就代表了腐败的缩影。新自由主义给反对其自身结果的立场提供了框架。

但腐败究竟是什么？要精确定义它相当困难。在许多方面，腐败只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旧制度的结合。因此，腐败就是资助（patronage）的同义词。非资本主义精英和新贵竞相攫取国家的部分权力。他们争夺收入来源的所有权，例如，精英可能控制面粉进口，或指挥国营纺织企业。然后，精英们用国家创造的收入来资助随从，而随从则用他们的忠诚来换取一杯羹。在产权仍由政治构成的地方，从最低阶的收票员到最高层的政客，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贿赂和回扣游戏。

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消除资助安排为己命。通过集中国家权力、提高税收效率、以基础设施投资和有针对性的补贴取代对选民的直接转移支付，现代化理应迫使人们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通过国家攫取来获取收入。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进程仍不完全。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则正是意图改变这一现代化的不完整性。但是，披上了新自由主义外衣的国家现代化，不仅没能终结腐败，反而还加剧了腐败。在世界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改革几乎不可能扩大市场参与，也不可能实现增长的良

性循环（这一点尤其如此，因为新自由主义与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减少有关，而没有基础设施，现代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成果是使腐败更加隐蔽，同时将腐败引向社会上层。现在，腐败不再无处不在，但涉及的金额却大得多。对官员的小规模贿赂已被私有化交易和公共投资项目中的大规模贿赂所取代——这些交易和项目都流向了最富有的客户。独裁者的家人，尤其是贾迈勒·穆巴拉克，因此成为民众仇恨的主要目标。在（1）国家本应根除腐败，（2）下层不再遵守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他们获得的巨额贿赂显得更加令人发指。这就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是不公的：当旧的资助形式被废除，并承诺会有新的财富来源取而代之时，这一承诺的失败揭示了新的资助形式只是旧形式更恶劣、更不公的翻版。

在高收入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然而，富裕国家的改革目标并非旧制度下的资助安排，而是社会民主的公司主义——后者在二十世纪取代了前者；现在，它本身也将被解体。被大肆吹嘘的市场自由化本应造福所有人，但当经济没有增长时，新自由主义只意味着救助金汇集到了社会上层。

这一过程在地中海北岸和东岸也许最为明显，在那里，

国家资金（和流动热钱）被投入基础设施投资。从1980年代末到2008年经济危机前，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规模的建筑业繁荣来维持的。就其本质而言，建筑业是一种临时刺激：建设道路网络可以雇佣很多人，但一旦建成，就不需要那么多人进行维护或保养。因此，城市发展项目只能暂时抵消盈利能力的下降。基建带来的繁荣只是通过将过剩资本投入到建筑环境的扩张中来推迟危机。

当这台增长机器耗尽燃料时，它有时会留下壮观但无用的废墟。如今，腐败表现为西班牙偏远角落的空置机场、俯瞰雅典港口的半建成塔楼，以及伊斯坦布尔贫困街区的商场计划。这些项目的腐败，并不是引导政府机构浪费资金在愚蠢项目上的内幕交易的后果。事实上，这些交易在事后才显现出腐败的一面：当游客不再到来、房地产市场崩溃、消费者支出下降的时候。在那一刻，内幕交易不再被视为相对无害的经济增长的伴生物。相反，它们开始变得像以前的资助，但现在，由于危机前国家借贷能力的增强，涉及的金额要大得多，受益人的范围也小得多。<sup>[27]</sup>

在英国和美国，腐败也是 UK Uncut 和 OWS 的共同主题。<sup>[28]</sup> 然而，在这两个国家，结束腐败的诉求的关注点不在黑心建筑项目和政治回扣。相反，这一要求针对的是雷

曼兄弟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倒闭后，政府精心策划的巨额企业救助计划。但这里的规则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些救助之所以“腐败”，与其说它们是在不光彩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如说是它们似乎与恢复经济增长（即创造就业等）无关。

在反对这些不同的腐败表现形式时，广场占领者似乎在宣扬两种有所区别的观点。

1、应该让富人感受到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的痛苦。毕竟，新自由主义者声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应该立志成为小资产阶级。这种言论针对的是工会以及所有领取国家福利的人。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最大的施舍不是给了工会或极端贫困者，而很明显是给了极端富裕者。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其他人则因经济危机和财政紧缩而承受苦难。让金钱退出政治意味着令超级富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同时，由于贪婪的政客们削减了对穷人的支持、却向富人派发钱财，占领者们要求的不是公平的政策，而是对他们更有利的政策。国家的赞助应从“肥猫”身上转移到大众选民（“国家”）身上。因此，占领者要求大规模纾困，这既是出于一种常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意识，也是因为，像优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一样，他们希望大规

模纾困能使经济恢复健康。

在第二项要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在过去几十年，很大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经济增长外，而且没有计划让他们重新加入这一增长。在低收入国家，国家对穷人的直接资助——这是庇护主义国家（clientelist state）的重要基础——逐渐被侵蚀，而私有化交易却只惠及少数精英阶层。一度能让穷人能够享受到民族主义项目部分收益的有限度合作关系也正在瓦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瓦解涉及到代际问题——这在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政治家们知道，全面削减民粹主义措施，必然激起群情激愤，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反叛。因此，国家改为逐个部门进行削减。首先是剥夺下一代尚未实现的特权。这一过程明显体现在埃及不断萎缩的城市正式部门——目前约占劳动力的 10%（包括食品加工、纺织、运输、水泥、建筑和钢铁）。年轻人发现自己被“好”工作拒之门外，而被限制在非农业的非正式部门，这些部门吸收了 2 / 3 以上的劳动力。

然而，国家不仅退缩了。当国家不再有能力维持其在世袭制（patrimonial）交易中的地位时，就会以警察镇压来取代对穷人的施舍。于是，资助的链条被收缩重组：警察和军队因获得更多恩惠而受益，而许多其他部门却失去了

这种机会。警察和军队雇用了一部分原本会被排除在新的庇护体系之外的人，但他们雇用这部分人只是维持其他人的秩序。因此，布瓦齐齐和阿卜杜勒·穆奈姆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一具尸体的被烧是警察镇压的信号，另一具尸体被烧则是民粹国家庇护瓦解的信号。这两种经历是直接交织的。<sup>[29]</sup>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警察已成为腐败最有力的体现和最令人痛恨的象征。警察的扩张和军事化似乎是这个时代最坏的征兆。各国都在表明，它们愿意在削减学校和医院经费的同时花费巨额资金来支付警察的工资、建造监狱等。国家不再将民众视为（哪怕是表面上的）服务对象。相反，国家现在将其人口视为安全威胁，并愿意花钱来遏制他们。

尤其对无产阶级的边缘群体而言，这种遏制是一种日常现实。由于警察的工资通常很低，他们往往通过从穷人那里收取贿赂和回扣来补贴收入。因此，与警察的日常交往中显示出，警察是旧式腐败的最后一批受益者。与此同时，在压榨最弱势人群的同时，警察也在推行新的腐败：他们镇压对日益富裕的新世袭精英的任何反抗。

警察不仅从穷人那里榨取钱财，他们还嗜血成性。伴随着警力过度扩张的，是警察的任意暴力和杀戮的增加，这往往又成为暴乱的导火索。每当又一具尸体倒在地上，

人群的一部份就会收到这样响亮而清晰的讯号：“你们对我们什么都不是，滚蛋吧”。在反财政紧缩的抗议活动中，同样的讯号则更加明显。警察站在冲突的最前线，确保民众保持秩序，确保他们不过多地抱怨这一切的不公正。

因此，对腐败的反对在抗议者的切身经历中有着真实的基础。反对腐败的抗争反映了一种被双重排斥的痛苦经历。一方面，个人无法享受全球化新经济中不断增长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就体现在新富阶层的炫目消费中。另一方面，同一批人发现自己同样被旧的庇护制度排斥在外——而旧的庇护制度同样是一种基于承认的系统（无论是旧体制还是工人制度）。因此，抱怨腐败不仅是为了记录不平等已经去到什么样的极端程度，或者合法性可疑的合同将财富向上再分配的不公。对腐败的抗议体现出对缺乏认可的谴责，或对失去认可的恐惧。腐败猖獗意味着，从根本上讲，一个人并不算是（或处于不算是在的风险中）国家的一员。取代社群的是作为动荡仲裁者的警察。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局面并疗愈社群？占领本身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

## 五、构成问题

2011 年的抗议者在广场上用他们的身体和痛苦揭示了无休止的社会危机对人类造成的后果。但他们并没有在这一概念空间久留。占领者们自发地选择了直接民主和互助，向当权者展示另一种社会形式的可能性：在话语权和被倾听权方面，人类可以被平等对待。

在占领过程中，横向组织模式本身往往成为目的。面对无情和 / 或无能的国家权力，占领者转向内部，从其自我活动为出发点，建立起一个人类社区——一个不再需要等级制、领导或地位区分的社区。只要出现在广场上，就是社区的一部份。占领者不需要其他隶属关系或效忠对象；事实上，其他隶属关系往往会受到怀疑。这样一来，目标是将财阀赶下台的反政府抗议，就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反政府抗议：反政治的反政府抗议。当然，这种转变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进步：它标志着抗议者的取向的摇摆，从向外到向内，再到向外。

事实证明，要寻找广场运动中这种特征的先驱非常困难。早在 2001 年，运动的横向主义就在阿根廷出现了。这场运动还复现了反全球化抗议（以及在此之前的反核能抗议）的形式，特别是基于共识的决策方式。但因为广场

运动持续时间较长，其特性也就有别于这些其他的抗争活动。<sup>[30]</sup> 因此，占领者不得不把其自身的再生产看作一个客体。占领者需要决定如何共同生活。他们在广场上坚持的能力——持续占领直到能产生影响——是他们唯一的优势；他们的筹码是拒绝离开。他们采用的治理形式，正是他们声称比这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所提供的治理形式更好的治理形式。

广场运动的这一特征最相关的先驱也许可以在以前的广场占领中找到，尽管 2011 年的抗议者似乎并没有直接参考过这一占领。那就是天安门广场的占领。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尽管将此运动简单化了，但他捕捉到了广场的某些精神，而这正是 2011 年抗议运动的先声。在《即将到来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一书中，阿甘本在谈到“来自北京的先驱”时，认为该运动中，对自由和民主的一般要求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场运动的真正目标是自我构成（*compose itself*）。<sup>[31]</sup> 在广场聚集在一起的社区，“不是通过任何归属条件”或“没有条件”来调节的，而是“通过归属本身”来调节的。示威者的目标是“在不申明身份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人相互归属，而没有任何存在具体表征的归属条件”。<sup>[33]</sup>

阿甘本声称，由于脱离了所有身份标记，广场占领者拥有了“任意的独体”（whatever singularities）<sup>[34]</sup>。这种任意的独体意味着，无论他们在任何特定时刻碰巧拥有什么身份，这恰恰保持了占领者的本质。阿甘本认为，占领者以这种方式展现自己时，就能点破国家的表征逻辑：国家试图给占领者固定一个特定的身份，然后将该特定身份纳入或排除。因此，阿甘本得出结论：“只要这些任一独特性能和平地表现出它们的共同点，就会有天安门，而坦克也迟早会出现。”<sup>[35]</sup>

在阿甘本的逻辑里，形成一个以归属感本身为中介的共同体意味着：（1）共同体是由所有碰巧在那里的人构成的；没有其他归属条件。（2）在联合政治中，社区不会对先前已经存在的身份进行调解；相反，它是从无到有地诞生的。（3）这一社群不寻求得到国家的承认。在极限情况下，它呈现出来的是对国家的一种替代：即真正的民主，甚至是对民主的超越。（4）这样一个社区的任务是鼓励其他人放弃他们在社会中的职位，并以“任意的独体”的身份加入社区。这个描述符合2011年占领者的自我概念。他们也想成为任意的独体，即使他们自我表述的方式没有那么哲学化。

但我们应该清楚：对阿甘本而言，那次广场运动已经

拥有了任意的独体。尽管广场上充斥着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分离，甚至具体到一个人可以坐在哪里的细节，但这些都完全不在他的叙述范围之内。然而，虽然阿甘本的描述存在缺陷，他还是捕捉到了运动中的某种规范性取向。因为在天安门——就像在太阳广场、新塔格玛广场和祖科蒂公园一样——参与者似乎认为自己超越了所处社会的决定。2011年的抗议者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与裙带资本主义斗争”。

然而事实是，抗议者仍然牢固地根植于他们身处的社会之中——甚至广场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更为“中产阶级”的参与者和穷人之间的分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还不仅如此：有各种已存在的关系的个人，往往聚集在广场的这个或那个角落。他们的帐篷形成一个个圆圈，帐篷敞开的帘子朝内。更隐蔽的分歧与性别有关。参与占领行动的女性面临着被某些男性强奸的威胁；妇女被迫组织起来进行自卫<sup>[36]</sup>。这些分裂无法在仅由共识决策和集体烹饪所形成的统一体中得到解决。

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的运动把自己呈现得已经统一，已经超越了这个可怕的社会决定范畴；这也意味着它们通常不会承认自己的内部分歧。由于不被承认，所以这些分歧只能被视为对运动的威胁。这并不是说内部分歧

被简单地压制：而是说分歧只能在广场的范围内，通过成立另一个委员会或颁布新的行动规则来解决。<sup>[37]</sup>

以这种方式，这场运动被迫向内看，因为它被禁止向外看。如果没有能力走出广场，进入社会——如果不开始解构社会——就不可能消除阶级关系，而这些阶级关系是无产阶级内部分裂的基础。占领者因此被限制在广场内，就如同被限制在一个高压锅中。通常彼此保持距离的阶级派别被迫相互承认，有时甚至生活在一起。在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中，运动遇到了我们所谓的“**构成的问题**”（problem of composition）。<sup>[38]</sup>

构成问题指的是在斗争过程中，组合、协调或统一无产阶级分裂的问题。与过去不同的是——或至少与过去的理想典型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把阶级分化理解为一种可以自我愈合的现象，仿佛统一在某程度上也是“天然存在的”（如手工业者、大众或“社会”工人的统一）。今天，这样的统一并不存在，也不能期望统一会随着生产技术构成的进一步变化而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已经预先定义出的革命主体。不存在“为自己”的阶级意识，也不存在对于所有工人共同利益的意识。或者说，这种普遍利益的意识只会是资本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对工人的分化，造就了工人的团结。

因此，阶级的构成问题在今天看来不是阶级内部的一个吸引点，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在分裂的情况下，采取反资本主义的阶级行动？广场运动暂时搁置了这个问题。占领运动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可能的阶级斗争和不温不火的民粹主义之间创造了一个空间，让抗议者尽管存在分歧，但可以暂时团结起来。这使得斗争的激烈程度有了质的飞跃。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当抗议者遇到构成问题时，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占领者通过回避构成问题走到了一起。他们用最抽象的方式来命名他们的团结：他们是“愤怒的公民”或“99%”。如果称他们是劳工阶级或无产阶级，那也是不合时宜的，但这和其他的那些称号并没有什么区别：每一个普遍性都是抽象的，因为它所命名的统一体没有具体的存在。由于这些原因，占领者的团结必然是一个弱团结。只有当占领者能够遏制占领营内重新出现的分歧——也就是日常社会关系中已经存在的分歧：种族、性别、民族、年龄等，它才能团结在一起。<sup>[39]</sup> 是否有可能从相反的角度解决构成问题：从无产阶级内部的分裂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团结问题？

也许只有通过推迟统一，让分裂显现出来，无产阶级才会被迫提出他们真正统一的问题，反对他们基于资本逻

辑的分裂中的统一（unity-in-separation）。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真正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必须超越这个社会——不是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关系之外人与人的联系。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无产阶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决绝的分裂？这个问题更准确的提法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内部分裂在社会表面上也表现得如此明显？身份政治是如何取代阶级政治的？

过去，我们似乎可以在包罗万象的阶级身份基础上否定非阶级身份。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为这种否认提供了支持：资本创造了产业工人阶级；它似乎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进入工厂（或者说，所有工作都将按照工厂的方式进行改造）。随着产业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力量不断壮大，他们似乎会变得更加同质化。与阶级归属相比，工厂将使种族、性别和宗教的划分变得无关紧要——至少在工人运动看来，阶级归属是唯一重要的身份。

我们认为，只有在工业对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情况中，这种未来愿景才有可能实现。当然，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规特征（在资本的历史上，长期繁荣实际上是少之又少的）。不过，可以说工业部门过去对劳动力的需求通常高于1970年代以来的水平。因为，在过去，工人是被吸引进入工业部门的，虽然不是完全如此，

但在趋势上是如此。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当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较高时，资本就不得不雇用那些通常因性别、种族、宗教等原因而被排除在高附加值生产部门之外的工人。对劳动力的高需求打破了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偏见，随之而来的本应是工人利益的实质性融合。

这种融合确实发生了，至少某种程度上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了。<sup>[40]</sup> 例如，在美国，南方的农业机械化取代了黑人佃农，推动他们移居到蓬勃发展的北方城市。在那里，黑人被吸收进工厂和工会。黑人工人融入工会并非没有经过斗争，也从未彻底完成。然而，这个过程在19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接着，这种融合遇到了外部限制。融合之门在即将打开的时候却被突然关上了。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首先出现在1960年代末，然后又出现在1970年代初的危机时期。裁员实行后进先出政策：最后被雇佣的工人是最先被炒鱿鱼的。对于美国黑人来说，监狱取代了工作。监狱人口的增长与工业就业的下降密切相关。

世界范围内也在发生类似的事件。在战后繁荣时期，低收入国家倾向于融入工业化国家俱乐部。但这些国家只是在战后繁荣达到极限时才被整合。事实上，它们之所以被整合，正是因为繁荣已经达到极限：随着竞争加剧，企

业被迫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一旦繁荣结束，经济进入长期衰退，这种整合就会崩溃。

自 1970 年代以来，过剩人口持续增长。从本质上讲，过剩人口的增长使阶级融合发生了逆转；融合变成了分裂。这是因为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很低。由于每份工作都有很多人申请，管理者的偏见（例如某些“种族”比较懒惰）在决定谁能得到或不能得到一份“好”工作时产生了实际影响。因此，部分阶层的人被挤压在劳动力池的最底层。使这些人对某些雇主失去吸引力的因素，又使他们对其他雇主极具吸引力——特别是在雇员流动率高而雇主并不真正为此付出代价的工作中。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为分离出一个极度受剥削的阶层创造了条件，马克思称之为停滞的过剩人口（*stagnant surplus population*）。这种分离强化了享有特权的工人的偏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的“好”工作是基于雇主的偏见。这也强化了被排斥者的非阶级身份，因为正是这些身份构成了他们被排斥的基础。

然而，虽然资本不再能够克服分裂，但新分裂的混乱性质似乎在某些方面削弱了它们。由于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或许可以说，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展开往往会破坏劳动力市场各个部分的稳定身份形成。越来越多的人沦为过剩人口；并且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过剩人口。稳定与不

稳定的区别日益成为统御工人阶级内部所有其他区别的标准。这导致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感受，即所有身份从根本上都无关紧要，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

1、即使是阶级中最边缘化的群体，也并非每个人都被排除在稳定的工作和公共认可之外。当今的时代见证了个人从社会边缘崛起到权力巅峰，我们有许多女性 CEO 和一位黑人美国总统。这带给人们的印象是，没有任何社会耻辱化、任何被贱弃的标志是完全不可克服的。

2、但同时，不稳定性的本质是消解固定地位。很少有无产者将自己的资质或能力视为自己的本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界不存在一种常态，也无法假装身份可以恒久不变。相反，生活是拼凑起来的，没有明确的发展意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商品化的，其组成部分可以互换。广场上正是存在着这些支离破碎的无产阶级特征。

## 六、结论：不归路

我们现在还无法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所知道的是，至少在目前，我们在一种盘旋待降状态中生活和战斗。危机停滞了；为了使危机停滞，国家不得不采取非常行动。很难否认，在过去几年里，国家干预似乎是最后

的努力。利率触底反弹至零利率。政府每月花费数十亿美元，只是为了说服资本投资涓涓细流。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然而，至少在这段时间里，国家干预取得了成效。危机僵化了，而这也意味着斗争的僵化。

事实上，由于危机已经停滞，阶级斗争就只剩最急切和最贫困者的斗争。其他人都希望，只要低头，就能熬到真正的复苏开始。与此同时，那些参与斗争的人自己也大多迷失在自己的虚假希望中：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国家理性行事，采取更激进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措施。抗议者希望资本主义能够在摆脱裙带、优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运转。反紧缩斗争不可能放弃这一观点——只要它看起来还有可信之处——反紧缩斗争本身就陷入了一种盘旋待降。他们只有在国家对他们的要求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才能正视危机的客观性。

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三种情况：

- 1、盘旋待降可能会再维持一段时间，以便在其范围内出现第二波类似 2011—2013 的斗争。第二波斗争可能会像前一波斗争一样不温不火，但它也有可能在过去几年建立的真实纽带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强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会看到激进民主运动的复苏，它会比反全球化的运动更受欢迎。这场运动不一定会聚焦于广场占领；它可

能会通过其他一些无法预见的策略来宣布其存在。这样的运动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支点，就有可能重新协商当下的危机管理条件。例如，抗议者可以将危机的后果强加给超级富豪：征收新的托宾税<sup>[41]</sup>、累进所得税或限制 CEO 的薪酬。也许骚乱者会成立实质性组织，从而向警察施压，令其停止随机施暴，并使部分警察部队去军事化。或许可以要求阿拉伯国家提高公共部门的就业，以吸纳积压的失业大学毕业生。无论如何，即使所有这些要求实现了，也无异于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成立工人委员会。他们将自我管理一艘正在沉没的船（当然，由于冰山正在融化，这艘船会撞上什么还不得而知）。

2、这种盘旋待降可能会维持更长的一段时间，但在其范围内，第二波斗争可能会与第一波斗争截然不同。也许，受广场运动中的启示，无产者会看到一种新的、或多或少非正式的基层工会主义。这种工会主义如果能触及大量无组织的私营企业服务业工人，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危机管理的语境和条件。如果可能的话，以此为基础，或许可以反过来解决构成问题。目前，美国的快餐业工人正在罢工，他们要求工资翻番。他们要是成功了，而这一成功又成为无产阶级中其他人涌上街头的信号呢？重要的是要记住，阶级斗争条件的巨大变化并不总是与危机强度的上升相对

应。阶级关系的主客观方面并不一定同步发展。

3、最后，危机可能加剧，全球经济触底反弹，首先是印度或中国的经济深度下滑。或者，量化宽松政策的收尾可能会失控。维持现状模式的结束将颠覆我们所描述的时代的所有条件。我们的危机将不再是紧缩危机，而是完全不同的、影响更广泛人群的危机。把危机怪罪到腐败的政客将不再可能（至少不再有用），因为这个情况已经意味着国家不可能能够管理危机。这并不是说革命的可能性会突然出现，或是革命会成为唯一的选择。情况恶化以后不一定会好转。无产阶级内部的分歧很深，而且只会随着过剩人口的进一步增加而加深。完全可以想象，各阶级派别之间会反目成仇，互相仇视，确保谁也不比谁好一点，这些都会先于革命。

三 水 译

鹿 米 校

## [注释]

[1] 关于长期衰退的讨论，见下文及《苦难与债务》。

[2] Kosmoprolet,《资本衰落中的危机、占领和其他怪事》(The Crisis, Occupy, and Other Oddities in the Autumn of Capital), *Kosmoprolet* 3 (2011)。

[3] 原文 Occupy, 或指占领华尔街。——译注

[4] 坚守广场在一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有意义。在突尼斯和开罗, 警察不仅被赶出了广场, 他们在数周或数月内都无法进入周边地区。相比之下, 在曼哈顿下城, 只有 100×330 英尺的区域(或多或少)被“解放”了。

[5] 本章节更早的版本曾作为《尾注》网站上的一则消息发布。

[6] 除非另外说明, 所有统计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 年版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 年版。

[7] 在美国, 失业率已降至 7.3% (2013 年秋); 然而, 这一下降是通过劳动力参与率(LFPR)的大幅下降才实现的。后者从 2007 年的 66% 降至 2013 年的 63%。这是美国自 1978 年以来的最低劳动参与率。事实上, 自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女性大规模加入劳动力队伍以来, 2000—2013 年的劳动参与率首次出现持续下降。

[8] 统计数据摘自《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2013 年 8 月 11 日的报道《欧元区失业情况》。

[9] 关于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见术语表、《苦难与债务》和本文图 1。

[10] 见 Richard Duncan, 《美元危机》(Wiley 2005) 第 7 章, 《资产泡沫与银行危机》。

[11] 见 Robert Frank 的《美国经济日益与富人挂钩》，刊《华尔街日报》2010 年 8 月 5 日。

[12] 见 Robert Brenner 《对高盛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2009 年 (sscnet.ucla.edu), 34—40 页。

[13] Charles Roxburgh 等, 《债务与去杠杆化：增长道路上的不均衡发展》，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2 年 (mckinsey.com)。

[14] 见 Richard Koo, 《QE2 已将商品市场转变为流动性驱动型市场》，《证券研究》2011 年 5 月 17 日。

[15] M. Lagi、K.Z. Bertrand、Y. Bar-Yam, 《北非和中东的粮食危机与政治不稳定》，2011 年 (arXiv.org)。

[16] 我们在这里使用美国的统计数据，因为只有这些数据可以与 1929 年和 2007 年进行比较。但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几乎不可能因过度借贷而陷入破产境地。

[17] Bruno Astarian, 《危机活动与传播》，Hic Salta (hicsalta-communication.com)。

[18] 由于埃及大部分小麦靠进口，2010 年底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破坏了向埃及穷人提供面包的补贴政策。政府以折扣价出售的面粉大量流

入黑市，价格居高不下，掺假现象猖獗。

[19] Paul Mason, 《为何各地仍在掀起热潮》(Verso 2012), 61 页。

[20] 见《水涨船高：危机时代的英国斗争》。[本文集未收录。——译注]

[21] Paul Mason, 《为何各地仍在掀起热潮》(Verso 2012), 70 页。

[22]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贬低运动中表现出的代际团结。所有的广场占领活动至少都暗含了这一点，而支持魁北克学生罢课的“砂锅”运动则明确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团结的前提是物质上的分离。

[23] 同上，第 57 页和《水涨船高：危机时代的英国斗争》。

[24]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总罢工产生了更大的声势，这似乎正是因为组织不是由工会主导，而是采取了涉及众多阶级派别的封锁形式。

[25] 见《水涨船高：危机时代的英国斗争》。

[26] 新自由主义也已成为一个涵盖整个时代的通用术语，它很容易将国家政策与经济动荡混为一谈，从而分散了人们对真正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倾向的关注。

[27] 不仅在地中海沿岸，反腐败的呼声也在流传。与土耳其一样，巴西也见证了建筑业的繁荣，即使在城市贫民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体育场馆建设者手中的资金仍在不断增加。此外，一系列政治丑闻使谴责腐败政客不可避免地成为 2013 年 6 月席卷全国的骚乱的主题。

[28] Adbusters 最初提议，OWS 的“一个要求”是让奥巴马成立“总

统委员会，负责结束金钱对我们在华盛顿的代表的的影响”，最终这一要求没有被采纳，但 OWS 大会通过的一项要求是支持“公民联合”运动，反对企业人格，其核心也是企业对政府的不当影响。这种情绪在占领现场时常可见，如“我负担自己的政客，所以我做了这个标语”。

[29] L.S.《悬而未决：突尼斯的阶级、腐败与岌岌可危》，《Mute》2012年1月。

[30] 见 Rust Bunnies & Co.,《在防暴装备下》(Under the Riot Gear), 载 SIC 2, 即将出版。

[31] 乔治·阿甘本,《即将到来的共同体》(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3年), 第85页。

[32] 同上, 第85页。

[33] 同上, 第86页。

[34] 同上, 第85页。本书开篇对该术语进行了解释。

[35] 同上, 第87页。

[36] 埃及反性骚扰组织的最佳叙述可以在 Mosireen 集体制作的视频以及 OPANTISH (反性骚扰行动) Facebook 主页翻译的证词中找到。

[37] 因为它比所有其他运动走得更远, 所以埃及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外。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圣大屠杀之后, 穆兄会与其他人之间的分歧变得明显, 并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结果。

[38] 关于“无产阶构成”“阶级分解”和“构成问题”, 见术语表。据《尾注》分析, 全球1970年代以来的构成问题源于马克思称为“资

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导致的全球范围长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去工业化、过剩资本和过剩人口等趋势，该分析在下文展开，背景和细节可见《贫苦与债务》。——译注

[39]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有许多分歧没有被这些术语所捕捉，或者只是在具体斗争过程中才被发明出来。无产阶级的分裂方式是无法预先命名的。因此，重点不是命名构成问题的术语，而在于指出这一问题是我们时代的关键战略问题。

[40] 然而，这一统一过程始终是不完整的。工人运动将其自身构建为一种强迫其完成的尝试（见《分离的历史》，即将在《尾注》第4期发表）。

[41] 托宾税（Tobin Tax）指针对外汇买卖的全球统一税，旨在抑制过度的资本跨境流动，1972年由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提出。——译注

